

## 目 录

### 专 论

- 3 Г. 巴甫洛夫斯基 / 两场危机还是一场双重危机? ——危机与安全

### 专题文稿

#### 中亚市场经济

- 5 J. 阿伦斯 / 中亚国家经济转型的政治—制度基础: 来自中国的经验
- 27 M. 斯达克 / 作为中亚转型经济参考模式的发展型政权
- 44 A. 利布曼 Д. 乌什卡洛娃 / 全球与地区竞争中的后苏联国家: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 能源经济

- 63 刘旭 / 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价格分析的角度
- 74 戚文海 / 俄罗斯战略性主导产业增长方式: 能源工业的实证分析

### 中俄关系

- 87 李承红 /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 现状、问题与对策
- 117 杜岩岩 张男星 / 博洛尼亚进程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空间
- 96 于 璐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封面设计: 王 洪

####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9 年 2 月 23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9 年第 1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Г. Павловский**

Два кризиса или один, двойной глубины? Кризис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 (3)

**Дж. Арен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ба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ранзycji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пыт Китая ..... (5)

**М. Старк**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тимулирующи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стран как пример для  
переходных экономик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27)

**А. Либман Д. Ушкалова**

Стран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Казахстана ..... (44)

**Лю Сюй**

Торговля нефтесырьем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транам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ценовой анализ  
..... (63)

**Чи Вэньхай**

Способ рост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доминирующей отрасли в Росси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 (74)

**Ли Чэнхун**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ответные меры ..... (87)

**Ду Яньянь Чжан Наньсин**

Боло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117)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1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G. Pavlovsky***

Two Crises or One, of a Double Depth? Crisis and Security ..... (3)

***J. Ahrens***

The Politico-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Lessons from China ..... (5)

***M. Stark***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s a Reference Model For Transition Economies in Central Asia ..... (27)

***A. Libman D. Ushkalova***

Post-Soviet Countries in Glob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Kazakhstan ..... (44)

***Liu Xu***

Raw Crude Oil Trade Between Russia and Eastern Asia Countries ..... (63)

***Qi Wenhai***

Growth Method of Strategically Dominating Industry in Russia: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 (74)

***Li Chenghong***

Chinese-Russia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 (87)

***Du Yanyan Zhang Nanxing***

Bologna Process and Space for Chinese-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 (117)

专 论

## 两场危机，还是一场双重危机？ ——危机与安全

Г. 巴甫洛夫斯基\*

国际安全，是各方在制订了某种战略，并保留未来行动权利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领域。上述三种因素同时具备的情况十分少见，也极不稳定。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安全则充斥着“泡沫”，应有的手段被霸权、野蛮和惰性所替代，致使对外政策中的泡沫甚至多于金融领域。

危机的产生总是伴随着若干个全球性泡沫的膨胀，其中最突出的当数美国的领导地位、欧盟东扩和“金砖四国”的兴起。<sup>①</sup> 国际安全领域的全球危机虽早于金融危机，但至今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布什下台，欧盟衰落，以及俄罗斯因遭受金融危机打击而无暇善加利用的南奥塞梯，最终使这些泡沫破灭了。

国际安全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危机，更是尚未被现实重视的危机。甚至从时事评论中可以发现，一些作者试图分清全球危机和全球安全两个概念，但涉及到后者却从未触及关于“危机前”的议题。各国政府也有这样的倾向。危机已经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而仅被视为一种背景、旁注和局部现象。但全球安全危机已成为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乌克兰，金融危机的国际化使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面临崩溃的危险。

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拥有的手段虽然有限，但依然分量十足。例如，俄所拥有的最新手段之一正是奥巴马本人，准确地说，是美国新政府扭转当前对俄关系僵局的迫切需要。然而缺乏战略思维使我们无法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充分评估。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战略上的模糊不清<sup>②</sup>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有权无所作为或仅仅作出一些战术上的反应。这样只会增加我们面临的风险，比如在处理对乌克兰关系问题上。

\* Г. 巴甫洛夫斯基，俄罗斯有效政策基金会主席，俄罗斯当局著名智囊。

① 还有一些泡沫规模较小，属于地区范围，如巴以冲突或南奥塞梯问题。

② 我们总喜欢在这一点上指责外交部。

俄罗斯当局并不比民众聪明得多。在关于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国家被民众的病态心理——精英阶层的岛国心态所局限。这种心态出于对俄罗斯所有灾难根源的教条式思维，却完全无视国家安全考虑。这种不正常的心态确实奇怪，尤其是对于一个国界线刚刚划定的大陆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军事冒险行动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最近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去年夏天，之前一次也不过刚刚结束几年，更是动用了所有类型的武器。俄罗斯独立以来的 18 年中，和平时期不超过七、八年！在资金短缺、财力匮乏的同时，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不同于经济危机的是，在摆脱安全危机的同时，俄罗斯所采取的冒险行动并未减少，反而正以军事怂恿和危机输出的形式不断增长。

（冯海明 译）

（责任编辑 常喆）

专题文稿·中亚市场经济

## 中亚国家经济转型的政治—制度基础： 来自中国的经验\*

J·阿伦斯\*\*

**【内容提要】**中亚地区由于地理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其尚未完成的转型进程，日益成为国际上高度关注的焦点。本文的目的是详细说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牢靠的政治—制度基础（politico-institutional foundation）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还要探讨中亚国家建立这样一个基础的方法。出于相似政治方面的条件，本文把表现出色的中国作为中亚国家发展方向的范例。

**【关键词】**中亚 政治—制度基础 经济转型 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F13/17.3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1-0005-(22)

### 一、引言

中亚地区由于地理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其尚未完成的转型进程，日益成为国际上高度关注的焦点。中亚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前苏联解体后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总的来说，它们在向国际社会开放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创造了市场体制，构筑了更有包容性的、民主的政治进程。但令人担忧的挑战仍然存在——反映在该地区相对较低的

\* 该文系《中亚地区正在出现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制度性支持》项目成果之一，衷心感谢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资助。（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in Central Asia: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Reform Processes; financial support by the Volkswagen Foundation is greatly acknowledged）.

\*\* J·阿伦斯（Joachim Ahrens），德国私立哥廷根应用科学大学，欧洲商业学院国际大学。

经济和人道发展指数上<sup>①</sup>。其他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外，在实行经济的稳定、开放和私有化改革的同时，制度环境的改革基本上被忽视了。有证据显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与执法，成为转型过程中的主要弱点和阻力。因此，建立足够的市场制度将是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sup>②</sup>。

鉴于当地和外国的商业精英所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中都分析过这种制度缺陷，本文的目的是详细说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牢靠的政治—制度基础（*politico-institutional foundation*）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还要探讨中亚国家建立这样一个基础的方法。由于这些国家转型的起始条件、资源禀赋、财政限制和政治取向上的差别很大，我们不能期望找到一种类似“使用说明书”或“最佳办法”那样的方法。我们能做的，是找出现有的政治—制度环境中适合于指导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的宽泛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效率不是唯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政治的适合度，比如，符合统治阶层利益的措施，是经济改革和发展成功的关键。出于相似政治方面的条件，本文把表现出色的中国作为中亚国家发展方向的范例；随着本地区大多数政府最近都开始更强调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本文这样做就更有必要了。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下一部分从理论角度阐述经济转型政策所需的政治—制度基础；第三部分详细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作为中亚国家的参考模式；紧跟着第四部分是结论。

## 二、经济转型需要政治—制度基础

对制度的分析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各经济体发展的认识<sup>③</sup>。我们认为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的演进，这种演进决定了不同代理者之间的交互运动。如果制度为非人力操控的市场提供相对低廉的交易成本，降低生产和贸易的潜在风险，并且有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流动，同时允许估测和分散风险，以及鼓励合作时，那么经济就增长。因此，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不同，最终并不是由于自然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归根结底，这种差异来源于已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及政府的政策。而这两个因素的能效最重要地是由两者背后的经济、政治制度的

---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5), *Central Asi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② Zeitler, A. (2005),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 Central Asia's transition experience." Osteuropa-Institut Working Paper No. 258, Munich.

③本章主要摘自 Ahrens, Joachim (2002),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4.4 节。

规范和限制，特别是它们之间的互动决定的。制度被认为是向个人行为提供动机结构的正式规范和非正式限制（包括执行制度的特征）。政治制度包括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那些制度安排。它们包括确定一个政体等级结构的规则，政策的基本决策规则，以及公开的程序控制机制。因此，这些制度被认为是分配政治权力和地位的方式，由此可以影响政治领导者追求他们的利益偏好和实现他们目标的能力<sup>①</sup>。

不发达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清楚地表明，我们有必要考虑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转型和政策改革的重要性。专注于经济转型的智囊们经常急切地要求政府让价格变得合理。虽然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这一建议还不足以保证经济的成功转型。许多政府面临着阻碍它们实施连贯的市场导向的改革的政治及社会制约。如果私人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有很强的影响力，经济政策就会体现出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重大倾斜，而非惠及整个社会。即使政府在发动政策改革时运用一套建立在有足够针对性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合适的政策组合，政府未来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仍会阻碍经济发展。欠发达国家政策改革的失败经验表明，形成政策改革的恰当建议还是要考虑到经济和政治形态之间的关系。新兴市场不仅仅需要运作良好的经济制度，如私有财产权、理性的价格体系和定义明确的合同法。它们还需要安全的政治基础，以使得经济和社会所必需的改革得以成型和推行。

然而，制度既不会自动建立，也不会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制度变迁达到某一条至善的路径。合适的、高效的经济制度的出现，最终取决于功能良好的政治干预下的市场的存在，因为政体能制订、实施和执行经济变革的正式规则。但政治干预的市场通常既非充分竞争的市场，也非高效率的市场。国家推动制度变革以惠及整个经济的能力主要依赖于政体的制度性结构。这是因为，不同的政治一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政治交易成本，因此对政策制订者的激励也不一样。政治交易成本影响着政府不同部门间的互动，以及政治权力拥有者、商界精英和社会上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最终，它们决定了政治的选择。所以，经济结果不仅是市场状况的产物，

---

<sup>①</sup> 参见 North, Douglass C. (1989),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5(4), pp. 661–668., 以及 Dixit, Avinash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iewiet, D. Roderick and Mathew D. McCubbins (1991), *The Logic of Deleg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ehbiel, Keith (1991), *Information and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cNollgast (1989), Structure and Process, Politics and Polic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75, pp. 431 – 482 和 North, Douglass C. (1990b),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4), pp. 355– 367, 等著作。



还是那些制度关系的产物<sup>①</sup>。

因此，如果说由国家发起和推进制度变迁是政治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和保证其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我们需要使得国家能有效实施和执行制度性的和其他的政策。这就需要对国家机器进行透彻分析，对它进行多种观念的研究，以避免把国家过分简单地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机构。马克斯·韦伯（1972/1921）定义的国家，是一个在某个确定的社会中成功获得合法使用有形力量的垄断权的强制性组织。当代学者通常以韦伯式的传统看待国家，但都试图通过降低对国家的作为和作用的分析的复杂性，来对该定义作有用的修正。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达到诸如内外安全、有效税收或维护控制和自治等目标时，政府的能力受到社会动员程度、经济条件、政府的凝聚力和合法性等因素的巨大影响。另外，追求公众利益可能与政策制定者的私人利益相矛盾；不同层次的政府、政府各部门、公众代理机构和官僚们的各种各样利益的分歧通常会导致划定国家权力边界的斗争，或与这种争斗紧密相关。

本文所提到的国家的定义，基本上遵循Evans等<sup>②</sup>和Grindle<sup>③</sup>的文章里给出的定义。这样，国家被看作是从从事社会控制、制定和实施权威政策的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者进行互动，以影响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路径。这种发展又反过来塑造了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一般来说，国家制度帮助协调相互矛盾的社会需求，并产生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来指导政治领域内外的社会互动。国家制度的一个中心任务是减少政治变动的不确定性。首先就是政府更替。确定选择政府之机制的制度安排，主要能让人预期谁来继承权力，以及会发生何种制度改革。第二，政治变化能够与政体的结构基础的重大变化联系起来。这既是指引导政治互动的一般规则的变化，也指决定政体长期演变的那些规则的变化。决定此类政治变化的制度，特别是宪法，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形成了利益集团和个人为将来达到政治目标而追求的战略。

由于国家本身被认为是制度的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结构性动力，并决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因此，作为政策改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的制度建设就有两个维度：（1）创造指导私有部门发展和协作的正式的经济制度；以及（2）创建允许经济制度和政策适当和圆满实施及执行的政治制度。

---

① Dixit, Avinash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Evans, Peter,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Grindle, Merilee S. (1996), *Challenging the state. Crisis and innov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然而，与第二个维度相关的任务又会陷入Weingast<sup>①</sup>所称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政治困境——即，一个被期望来保护和强化财产权的强势政府也能够侵犯产权所有者和其他公民的权利，来剥夺私人财富，因而削弱私人进行长期投资和提供信息的热情。这样，反过来又将阻碍市场繁荣，并最终使发展停滞。就如North<sup>②</sup>明白指出的，如果国家拥有强制的权力，那么当权者将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使用这种权力而牺牲社会上其他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限制国家侵越私有财产者权益的能力的、安全的政治体制基础，对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维持来说必不可少的原因。Weingast<sup>③</sup>说，政策改革中政治基础的缺乏会导致一个以即使有足够的经济政策选择、改革仍会失败为特征的平衡陷阱。造成这个陷阱是由于政府未能公开保证它实际上要实施并长期坚持公开宣布的改革。Mckinnon<sup>④</sup>说，如果政府面对（未曾预料的）财政困难，并且要它尽快解决问题的压力相对较高时，平衡陷阱特别容易产生。这时政府为了增加净收入，会特别倾向于干涉经济运行。由于私人投资者可能预测到政府的干预，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产生政治风险，由此阻碍长期的经济表现。

更一般而言，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们单独行动的话不能成功，而是需要和其他政策制订者、商界精英、以及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团体就规则和权利进行谈判。例如，为了便利私有部门的协调以促进经济增长，政客和官吏们必须依赖私营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能够提供可靠信息和提高私人投资。由于政治选择在未来的回报事先无法确定，只有达成指导未来决定的协议，政策才能在今天被有效推行。为了减少政治谈判、立法交锋和政策实施的成本，制度安排必须到位，以便今后时间和空间转换而政策不变。制度安排需要在不同的政策制定者当中、在政策制定者和私人经营者以及重要的社会团体之间进行合作的事先约定<sup>⑤</sup>。但对于制度和交易成本的研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组织和个人都有很多谈判动机时，如何在事后遵守协议，通常是个关键问题<sup>⑥</sup>。当然，这类问题大多可由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来基本解决。然而

---

① Weingast, Barry R. (1993),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1), pp. 286–311; Weingast, Barry (1995),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11, No.1, pp.1–31.

② North, Douglass C. (1990a),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9..

③ Weingast, Barry R. (1993),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1), pp. 286–311.

④ McKinnon, Ronald I. (1991),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lassical Socialism to a Market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4), pp. 107–22.

⑤ North, Douglass C. (1990a),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 North, Douglass C. and Barry R.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X(4), pp. 803–32.

人们也都知道，许多情况下单靠这一机制还不足以防止背信弃义。

上述讨论表明，同样的政策和法规，可被政策制定者随意修改与不可被修改、或修改起来交易成本过大，对经济表现会产生很重要的不同意义。因此，为了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建立有效约束政治权力、使之坚守先前的协议并使政治权力为公众服务的政治体制。这个问题实质上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政策制定者那一方做到“承诺是可信的”，以克服时过境迁的行为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随意性、机会主义和独断专行所带来的潜在的有害后果。这里要详细讨论的观点就是政治制度可以提供使得承诺变得可信的适当手段，

根据Shepsle<sup>①</sup>的定义（斜体字照原文），*承诺*是一个担保、誓约、发誓、盟约、保证或契约以某种方式行事。一项承诺在下面任何一个意义上都是*可信的*——动机使然或必要性使然。如果在某个行动的时间点上各方仍想兑现他们的承诺，那么在这个自发施行的意义上说，一个承诺在动机层面上是可信的。在制定政策的范畴里，更重要的是必要性使然的层面。这意味着各方不得不这样做[在行动的时候]，不论他愿意不愿意；在这个意义上说，该承诺是可信的，但并非因为各个方面都正好喜欢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被强制的，或根本没有能力不这样做。由于政策制订者通常掌握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人们通常不相信他们会自觉自愿地守信，因此尽管他们真诚地表示事后不会机会主义地行事，人们仍不会相信。只有当他们愿意并能够让人们捆住手脚时，人们才信任他们。于是，在必须的层面让人相信政策制定者会坚持政策改革的承诺，才是政治制度为何重要的关键。

要让政治上随心所欲的企图无法实施，需要使一种不对称的状况受到制度约束。那就是，要让制定新政策和达成协议变得相对容易，并让不遵守协议变得相对困难。这可以通过政治上的分工来达到。许多制度安排能提升改革政策的信誉度。它们包括，比如，禁止没收私有财产的宪法条款和职责、独立的司法体系、独立的监督机构、以及对有能力强制不同的政治实体——比如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分支——保持一致的否决机构的授权。类似地，制度性的程序能够强化政治结构，并能提高决策和政策的信用度和持久性。例如，像在某个现状被改变前会使一些审议因超时而失效的强制迟延之类的程序安排，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政治上的随心所欲行为。

至此，本文特别从公共政策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的角度讨论了怎样使政治承诺

---

① Shepsle, Kenneth A. (1991), Discre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Government Commitment, in: Pierre Bourdieu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245 – 263.

取信于民的问题。而从Lupia和McCubbins<sup>①</sup>的观点来看，对这个问题还有更多内容可谈。从“取信于民的政府承诺不一定建立在声誉、观念、对党派忠诚、个人背景或反复实践的基础上”这一前提出发，他们发现政治信用度需要三个条件，而要达到这三个条件，特殊的制度基础显得十分重要。这三个决定政治信用度的条件是真诚（或真诚地公开性的）条件，能力条件以及持久的条件。所有这三个都是构建政治承诺信用度的必要条件。第一，想一下“行胜于言”。即使真的有能力实施改革政策，但只在口头上而非行动上支持改革的缺乏真诚和诚实的政策制定者就足以使改革失败。第二，即使政策制定者们确实真诚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思，但如果政府缺乏实施政策和组建恰当的立法及执法同盟的技术能力，改革仍必然失败，其承诺也会被认为没有公信力。第三，即使关键的政治人物既真诚又有能力，但如果由于政府变更或外部冲击使他们不能长期当政，政策改革也将失败。这意味着三个条件中每个条件都必不可少，三者同时具备才足以使政治承诺有公信力。

在特殊的制度安排框架下，关键政治人物向其公民所作的或与国际组织谈判时所作的政策声明，能够代替他在真诚方面的个人品质。合适的制度系统将会增加放弃、修改、背叛承诺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比如，通过建立约束机制和信号机制）。此外，为了满足能力条件，需要特殊的制度来保证实施改革的技术能力（例如，一个胜任的由精英组成的公共管理机构、按部就班的程序、规定代议者条件的行政法律等）以及保证立法和执行同盟的有效性（比如适当的议程控制机制和创建行政岗位和委员会的制度安排等）。最后，为了保证改革的延续性，确保政策改革能够在现政府变换后或现任政治领导人交权后仍能持续下去的制度必须到位（比如对政府施政过程的否决机制以及设立审议委员会等）。

政府承诺的良好信誉是政策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广泛共识。此外，人们普遍赞同恰当设计的制度（它能促进建立信誉）能够有效限制政策制定者们的**事后**行为，并且是提高政府坚持它的主张及落实它对公民所作承

---

<sup>①</sup> Lupia, Arthur and Mathew D. McCubbins (1998a), Political Credibility and Economic Reform, Part 1: Do Politicians Intend to Keep the Promises They Make? A Report for the World Bank, Internet Website: <http://mmccubbins.ucsd.edu/credibility.htm>; Lupia, Arthur and Mathew D. McCubbins (1998b), Conditions for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Agreemen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诺的能力的重要手段<sup>①</sup>。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的宪法，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人物的行为动机，因此也就决定了构建经济法规和政策的政治结果。

政治制度如果要有利于提高政府承诺的信用度，必须考虑两个标准。首先，一个社会是否是法制社会并不仅仅依赖其政治制度。由于宪法、法律和法规能够从政治上被忽视、改变或取消，所以防止政府偏离上述法律法规的机制一定要到位。Weingast<sup>②</sup>的分析显示，设定国家合法边界的政治制度若要有有效和维持下去，主要依靠公民对限制政府权力的共识。反过来，这种共识又依赖于非正式的制度（公民的意见和态度）与正式的制度之间的互动。为了在发展或转型过程中形成社会共识，最重要的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正式的制度将成为协调和整合公民的非正式态度的关键，从而使政策制定和代表制（新的）这些正式制度能持续下去。然后，选民们能更好地控制政府行为，而且一旦政府被认为要侵越其合法权利的边界时，他们会采取一致的反对行为。

第二，通过不对称的制度化来提高政府的信用度，会产生令政策失去灵活性的成本。如果一种政治制度被建立起来，在今天和未来都有效束缚了政策制定者的手脚，那么一旦外部环境和选民的偏好改变了，要想修正政策改革的进程将变得十分困难。Cox和McCubbins<sup>③</sup>令人信服地提出，不同利益取向的政治人物控制了太多的否决机会的话，就会让政府无法决策和形成政治僵局。

学者们的上述这些警告意味着，单有制度的独特性，虽可以解决政府的信用度

---

①参见North, Douglass C. and Barry R.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X(4), pp. 803–32; North, Douglass C. (1990a),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rner, Silvio, Brunetti, Aymo and Weder, Beatrice (1995), *Political Credi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Weingast, Barry (1995),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11, No.1, pp.1–31; World Bank (1995), *Bureaucrats in Busines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以及Lupia, Arthur and Mathew D. McCubbins (1998a), *Political Credibility and Economic Reform, Part 1: Do Politicians Intend to Keep the Promises They Make? A Report for the World Bank*, Internet Website: <http://mmccubbins.ucsd.edu/credibility.htm>。关于在宏观经济政策范畴里制度达到有信誉的承诺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参见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E. Tabellini (1990), *Macroeconomic Policy, Credibility and Politics*, Chur: Harwood.

② Weingast, Barry R. (1993),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1), pp. 286–311; Weingast, Barry (1995),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11, No.1, pp.1–31.

③ Cox, Gary W. and Mathew D. McCubbins (1997),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Policy Outcom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和行为动机问题，但还不足以保证政策改革的成功。唯有包含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约的一整套紧凑的和连续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才能奠定恰当的结构性和程序性基础，以保证市场繁荣、政策的适用和政策改革的有效实施。这一发现揭示了建立一个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的全方位治理结构的必要性。由此，就一些重要方面来说，政治组织背后的逻辑和经济组织背后的逻辑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针对后者，Williamson<sup>①</sup>曾写道：

“如果事先能设计出恰当的保护措施，事后的机会主义式的交易也是有益的。与其用同样手段对付机会主义，聪明的(...)[谈判方；J.A]是既提出又接受‘有信用的承诺’的人。激励机制将被调整，用来组织交易的更优化的治理结构会被设计出来。”

当制度和经济政策被视为发展问题的焦点时，我们就要集中关注如下问题：（1）什么是作为政策改革的政治—制度基础的不可分割的组成因素；（2）什么条件有助于有效治理结构的产生。

接下来，我们以中国转型过程的经验为背景，来讨论中亚国家遇到上述问题的细节。

###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非正统的制度基础

制度性休克疗法的概念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和发展进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该区域的经济转型是以权威主义的形式发生的。1960和197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非民主的背景下实现了令人瞩目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越南、老挝的共产党享有对权力的垄断，并且尚未有放弃权力或与其他政治势力分享领导地位的意愿。尽管如此，该地区大多数政府启动了真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使东亚地区在过去四十年里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意识到只有取得不但惠及政治贵族，而且惠及社会各阶层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政治权力才能得以维持，那么市场化和经济增长就成了该地区的政府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政策目标。这些国家的当政者都令人信服地投身于市场改革，鼓励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活动，以及建立兼顾政策制定者利益和经济持续发展需求的激励机制<sup>②</sup>。

提升市场功能的治理结构（MEGS）意味着建立一个为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安全、可持续的政治—制度基础。今天大家的共识是该治理结构的设计、演进或应包

---

<sup>①</sup>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48-49.

<sup>②</sup> 参见 Root(1996), Campos 和 Root(1996), 以及 Ahrens 和 Mengerlinghaus (2006)。

含哪些因素，事先都没有蓝图可循。一个有效的、为社会接受的治理结构需要考虑各国的具体特征<sup>①</sup>。然而许多研究认为，能引导政策制定者、顾问和学者们穿越制度建设的复杂地带的宽泛原则还是存在的：除了需要一个强势的但有限的政府，以及培育公共管理机构的市场导向的治理能力外，还需设计和建立关键的经济制度以确保市场机制和私有部门之间的协调功能运行良好<sup>②</sup>。

根据Rodrik的说法，关键的经济制度关系到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的规则，关系到法律的、监管的、教育的、金融的和基础设施以及冲突管理的规则。这些制度具有很大的供解释的和适用的空间。用Rodrik<sup>③</sup>的话来说：

“起初的经济原则（... ..）并不指明独特的政策组合的路向。改革者有很大的空间把这些原则创造性地组合进适合本地机遇和局限的制度设计中去。”

具体而言，表现甚佳的东亚国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实用主义的（而非最优的）制度能够在非民主的背景下孕育出持续的经济增长。东亚“小龙”们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更近阶段的越南和中国都是例子。这些事例说明，非正统的转型制度在经济转型阶段要比所谓的最佳实践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特别是对威权体制来说，它们使市场导向的改革成为有效力的政策选择，因为这种改革有助于政治当局维持权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并开辟了使政治贵族们成为改革赢家的道路。最后，为各个国家的需求、生产力和能力度身定制的独特转型制度能够在各国比最优的制度更快发育——后者通常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来制定和实施，而且许多欠发达的专制的转型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还缺乏人力资本来运作它们（比如立法和执法）。有证据显示转型制度在功能上能替换最优的制度，比如说，在激励做生意上，在引入竞争上，或在建立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上<sup>④</sup>。

比如，中国的经济特区代表了一种对外逐步开放策略的转型制度。它所表达的意义是，在理论上，自由贸易区或与其他国家的海关联盟可能更有效率，但在特定的时期它们无法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于是，经济特区就可作为一条次优的开放经

---

① Rodrik, Dani (2007),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对这些研究的概述以及对促进市场化的治理结构的深度介绍，参见 Ahrens, Joachim (2002),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③ Rodrik, Dani (2007),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6.

④ Qian, Yingyi (2003),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in Rodrik, Dani (ed.),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97-335.

济、并且显示政府致力于市场导向改革的路径。这一方法通过经济特区里的基础设施投资、低税率、宽松的制度和市场化的规则得以实施<sup>①</sup>。

就国内经济改革而言，转型的制度能渐进地、但显著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改革的起点应该是构建一个强势政府，使当局能首先致力于市场导向的改革及实施新的游戏规则。关键的任务是保护经济部门和重要的政府机构之类的政策制订单位不受改革反对者的掣肘。公共治理的改革和政府能力的建设对加强国家机器的力量非常重要。这些就要求（1）通过一个中央的经济规划部门——可能还得聘请外国专家为之工作——来增强经济政策的制订、协调和实施；（2）改革公共财政的管理；（3）改革公共服务。此外，招聘精英人士以及制订他们的升迁标准，能够为公务员提供长期的职业回报，从而减少对腐败行为的鼓励<sup>②</sup>。

由于按工作表现聘用的政策、缩减冗员、机构调整等措施是提高表现较差的行政人员施政能力的关键，因此，有必要让部门层面的施政能力建设与促进整个公共管理机构能力提高的措施结合起来<sup>③</sup>。这样的公共管理部门的改革将不会威胁到政权本身。要取得效果，制度和机构的改革通常要和促进人力资源发展相互促进，缺乏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管理技术的（欠发达）转型国家更应该这样做。

在发达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通过一种微妙的监督和平衡机制来限制国家权力和提高政府的政治信用度。在专制的转型国家，这种安排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下，一个（远非完美但）可行的选择是，通过外部迂回推进各国的改革，以及与国际接轨过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渐进开放经济，增加来自国外的竞争以及参加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之类的国际组织，使得中国政府逐步地和令人信服地增强了其对改革的承诺。长此以往，威权的却可能是具有改革意识的政府，至少会在某些特殊的政策领域内收住自己的手（比如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等）。

进行经济改革，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它包括一个市场指向的定价系统、一个（可能的话）独立的中央银行、审慎的财政管理体系和至少是初步的市场指向的税收体系。然而，中国的例子显示，在鲜明的因国而异的条件

---

① Khan, Mushtaq H. (2002), "State Fail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trategie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BCDE Conference Europe, Oslo 2002.

②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里，独特的制度如何提高政府的能量和治理能力的深度研究，参见 Root, Hilton L. (1996), *Small Countries, Big Lessons. 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pos, Jose Edgardo and Hilton L. Root (1996), *The Key to the Asian Miracle: 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hrens (2002) 以及 Ahrens, Joachim and Mengerlinghaus, Philipp (2006),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arket-Enhancing Governance, Chinese-Styl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 No. 1, pp. 75-102.。

③参见 Ahrens (2002) 对接下去各方面的进一步阐释。



下，完全放开价格会与政治领导层的利益相抵触。大规模的私有化也是这样。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支持这样的观点：培育业已存在的小规模私有产品交易并让它们合法化——比如开放农产品市场、零售市场、小工业品市场和正在形成的服务市场——将更容易成功。由下而上扶持新兴的中小企业及逐步创造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私有部门，能够促进部分价格放开，激励经济中的供给方，培育工作机会。

中国的改革经验表明，废除农业集体生产和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改革能够极大极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改革增强了市场力量的信心，并能加强对以后阶段深化改革的支持<sup>①</sup>。工业结构重组方面，中国采取双轨制办法，允许在一段转型时期保留部分计划经济，直到新兴的私有部门取得足够的能够吸收从重工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富裕劳动力的经济能力<sup>②</sup>。这个方法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弱事先反对改革的力量（因为这暂时保护了现存的寻租权），并且增加了事后反对改革走回头路的力量（因为越来越多的群众从改革中获益了）。在其他国家，这一方法能使工业改革与起初流行的、潜在的怀疑市场功能的政治意识相包容。更进一步，它与渐进的向世界开放的战略相一致。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只要经济中还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私有部门存在，促进增长的改革就需要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利益相一致。只有这些政界人士能够保持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成为改革的赢家，经济转型在政治上才是可行的。中国再一次提供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例子：通过下放对经济中活跃的生产部门的管理权来放开民众的商业活动；在财政状况紧张的情况下允许办乡镇企业以调动地方政策制定者和官员的积极性，让他们能支配市场化进程中的剩余产出。还有，乡镇企业的经验昭示，即使产权未被明确界定，对财产的控制权也能建立起来并能培育企业家行为。<sup>③</sup>因此，正式立法既不是保证有效控制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实践中，Rodrik<sup>④</sup>总结道，在控制权的功效上，立法、执法、以及习惯和传统等非正规的形式都不是必须的。为避免地方政府被可能正在兴起的拥有土地等不可

---

① Lee, D. (1997), Lessons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Reform for North Korea, in: Lee, D. (ed.),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Europe, Asia and North Korea*,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pp. 183–232.

② Qian, Yingyi (2003),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in Rodrik, Dani (ed.),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97–335.

③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Institutions, State Activ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State-Owned and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Masahiko Aoki, Hyung-Ki Kim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 (eds) (1997),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254–75.

④ Rodrik, Dani (1999),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MF Conference on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 Washington, DC, 8–9 November, 1999, Internet Websit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eminar/1999/reforms/rodrik.htm>

移动生产资料的地方实力集团绑架，在经济改革开始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应该与土地使用权的更公平分配相配套。

总之，中国逐步提高了其市场导向的治理结构的质量<sup>①</sup>。此举明显地增强了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政治—制度基础。这种渐进转型培育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逐渐将国内公司放到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鼓励了生产企业转型，让愿意承担经济风险的企业得到回报。中国提升市场经济治理的模式，既非遵循直截了当的理论上必须这样做的说教，也没有为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清晰的经验（见图 1）。但中国的例子强有力地支持了“制度和治理非常有用”的观点。基本的原理，诸如责任、参与、可预测和透明度等，也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些原理在中国和在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实施方法还是不同的。比如，群众很难观察到政治领导层的责任。但相对有效的监督机制促使公共管理机构对中央政府负责，全国统一的保护市场的制度与拥有相对自主权的经济官僚部门的结合，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责任心，调动公共部门的积极性，并让低层的政府参与经济决策。还有，国家一级和地方上的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政策选择相对透明和可预测。由于这样的制度符合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负责制定培育全面增长和发展的经济政策的政治官员的利益，加上全国统一的保护市场的制度的内在竞争性，以及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私营经济业主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决策过程有着相对稳定的预期，尽管当局仍会选择性地干预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比如金融业<sup>②</sup>。

---

① 下面的讨论节选自 Ahrens(2007)。

② Ahrens, Joachim and Mengerlinghaus, Philipp (2006),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arket-Enhancing Governance, Chinese-Style*.



为质量需要由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其他与该竞争可移动生产要素的国家的治理质量来衡量；说它是动态的，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变化着的国际环境、以及改变中的政治条件会使至今有效的治理结构变得过时，然后需要产生适合对付决策中那些新挑战的新的制度安排。

虽然，根据关键的治理维度衡量，中国的治理结构相对来说运作良好，但组成这一治理结构的过渡性制度，像双轨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等，却很难充当未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能够持续改进以促进市场化为特征的中国治理结构的方法是复杂的和紧迫的。尤其是为了在未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促进发展的治理结构，许多问题诸如中央政府的责任缺失、仍较弱的法治、脆弱的金融体系、如何重建国有企业结构等，都要被考虑进去。

#### 四、对中亚国家的启示

怎样设计一个提高市场功能的治理结构，使它成为有效经济转型的政治—制度基础呢？上面的思考表明，治理结构的基本因素能够被政治方法所操控和设计。然而，影响治理结构设计的政策制定者、官员或其他活动者，都不能完全预测未来的所有可能性。再者，无数的活动者要么通过综合的改革比如重构一个国家的健康保险体系，要么通过小改革比如因公司而异的劳动市场监管，来影响治理结构。保证所有活动者之间适当合作通常非常困难，实际上活动者们有时对合作根本不感兴趣。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治理结构的某些变革虽可以被精心计划，但治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却需要逐步演进。随之而来的结论是，寻找最佳治理的努力或从另一个国家照搬治理结构是注定要失败的；当这样的照搬没有考虑现有的文化禀赋和社会资本积累时，会更失败。

即使成功转型的国家，治理结构也并不完美。但在每个国家，治理结构各自显示出一些有助于提高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承诺的关键特征。所有这些国家中，治理结构背后的无数制度都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分数。这是根据对四个治理维度——责任、参与、可预测性和透明度——进行判断后得出的结论。之所以获得高分，要么是因为像欧盟新成员国那样的国家试图施行西方的最优实践制度（在它们的例子中是成功的），要么是因为像中国和东亚国家那样，设计出了有效的转型制度，能具备正统的市场制度一样的功能。

建立公平执行的制度是政府的关键任务，这和导入及提升市场发展机制以及保护长期的市场功能性一样重要。因此，国家机器需保持有效，以实施市场导向的政策，执行维护市场持续的制度，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合作。

然而，Weingast<sup>①</sup>的“经济体制的基本困境”在任何一个中亚国家里都未被克服。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还是基本上能保护财产权和执行其他市场规则的强势政府当政。但因为这些政府的权力无一被足够地限制，它们也能够侵犯私有企业和公民的权利。即使当局不想侵越这些权利，难保政策制定者们能够让人放心地事先承诺遵守各种规则。这一事实会挫伤国内外私营业主进行长期投资和提供信息的积极性。最终，这会窒息市场的繁荣和阻碍经济发展。

为了获得一个对中亚国家政治—制度形势的广泛但相对的印象，我们要考虑贝塔斯曼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分析<sup>②</sup>。贝塔斯曼改革指数（BTI）考察了 125 个国家，并根据两个成分指数为他们排名——衡量一个国家向市场经济和民主转型的状况指数以及反映决策者治理质量的管理指数。图 2—6 提供了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相对图景。图 2 将哈萨克斯坦，该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蓝线），与中国（红线）进行比较。图 3—6 将哈萨克斯坦（蓝线）与每个其他中亚国家（红线）进行比较。

（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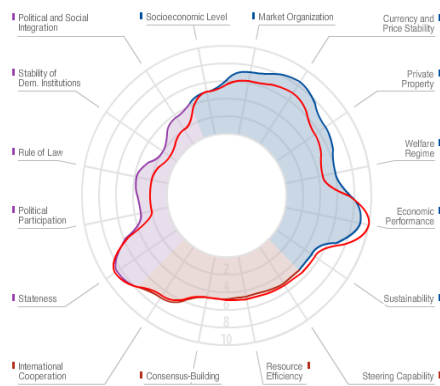


Figure 2 Transformation in Kazakhsta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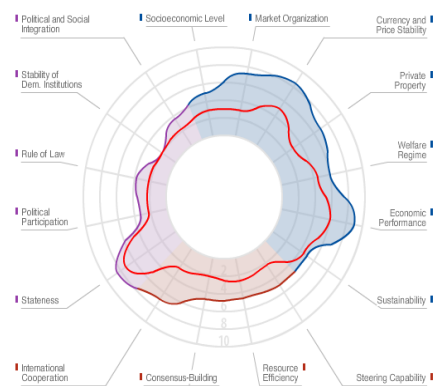


Figure 3 Transformation in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① Weingast, Barry R. (1993),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1), pp. 286–311.

② 贝塔斯曼基金会提供了许多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发展信息。若需更多信息，参见 <http://www.bertelsmann-transformation-index.de/> 世界银行提供了它编制的智力指数在下列网址 <http://www.qovindicators.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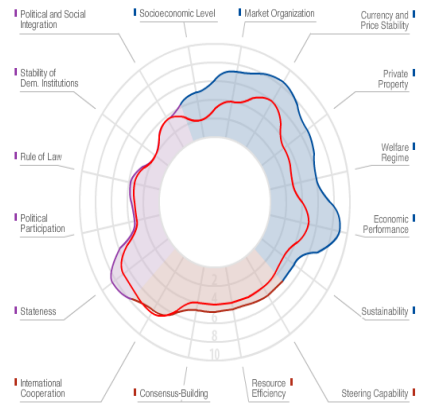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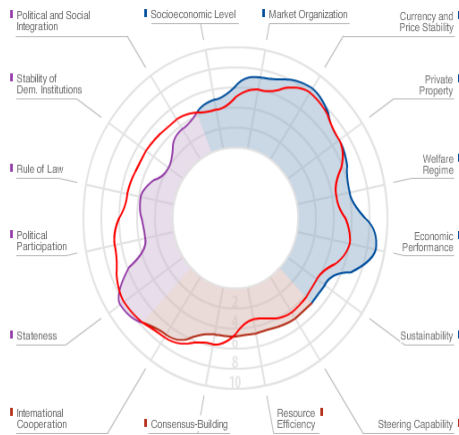


Figure 4 Transformation in Kazakhstan and Kyrgyzstan Figure 5 in Kazakhstan and Tajikist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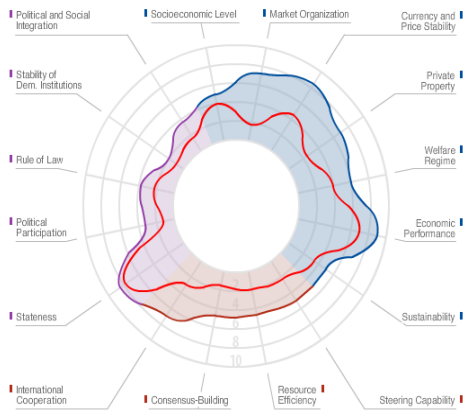


Figure 6 Transformation in 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

Source: Bertelsmann Foundation (2009), *Shaping Change –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http://www.bertelsmann-transformation-index.de/11.0.html?&L=1>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情况的相似程度令人吃惊。虽然两国在民主化转型方面都乏善可陈<sup>①</sup>，鉴于两国政治的历史和权力集中的情况，这并不令人吃惊，但在经济转型方面，哈萨克斯坦名列独联体国家第二名，说明它的表现比政治方面好多了<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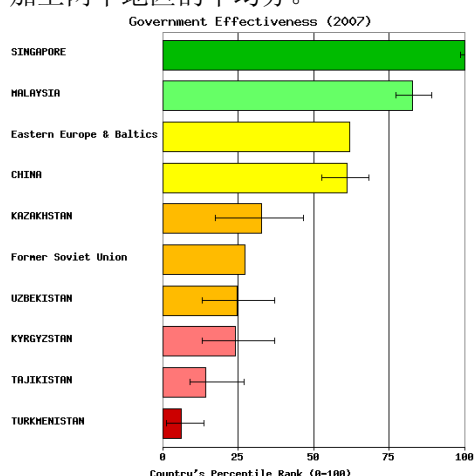
两个国家的管理指数都位列中游，表明了引导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的改革决

① 参见指数的说明，政治参与度、法治、民主制度的稳固程度、以及政治和社会的融合程度。在 0 到 10 分中，哈萨克斯坦得 4.2 分；对指数如何计算的说明，参见贝塔斯曼基金会报告（2009）。

② 所谓市场经济的状况包括社会经济水平、市场组织、货币和物价稳定、私有财产、福利制度、经济表现和可持续性指数。在 0 到 10 的打分中，哈萨克斯坦得 6.8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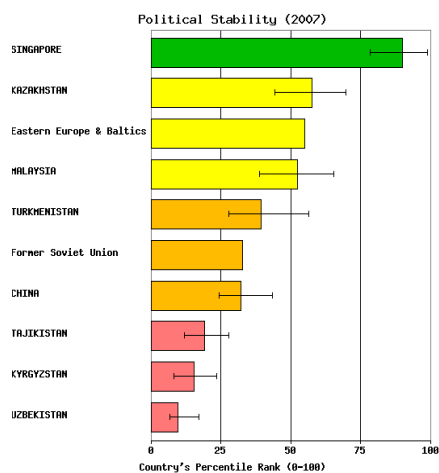
心和管理方面，还有许多提高效率的潜力可挖<sup>①</sup>。哈萨克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除了政治状况尚不如吉尔吉斯斯坦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胜过其他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与外国合作方面亏欠较大。主要表现在它们在地区合作、有效利用外国支持和成为第三方或国际组织中可信赖的伙伴方面做得不够。与这两个国家相似，其他中亚国家在冲突管理制度、政治共识的达成和政治参与、以及有效运用公共资产、反腐败和协调改革政策等方面落在后面（贝塔斯曼基金会报告 2009）。哈萨克斯坦在几乎所有的经济转型和经济表现方面在该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比较结果清楚地表明哈萨克斯坦在建立关键的经济制度方面的进步。这些制度支撑起市场经济及鼓励市场交易。

世界银行治理指数（WBI）也支持上述评估结论（图 7—12）。世界银行<sup>②</sup>将治理定义为“权力运行的传统和制度。它包括选择、监督和替换政府，政府有效制定和实施好的政策的能力，公民和国家对管理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制度的尊重。”治理指数是通过在六个方面对专家咨询的结论来计算的：即公开表达意见和责任、政治稳定、政府施政的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对腐败的控制。图 7—12 描绘了在所有治理维度中所有中亚国家以及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三个比较对象国的得分，加上两个地区的平均分。



Source: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2008: Governance Matters V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7  
 Note: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presented here aggregate the views on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provi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 citizen and expert survey respondents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data are gathered from a number of survey institutes, think tank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ggregate indicators do not reflect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World Bank, its Executive Directors, or the countries they represent. The WGI are not us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allocate resources or for any other official purpose.

Figure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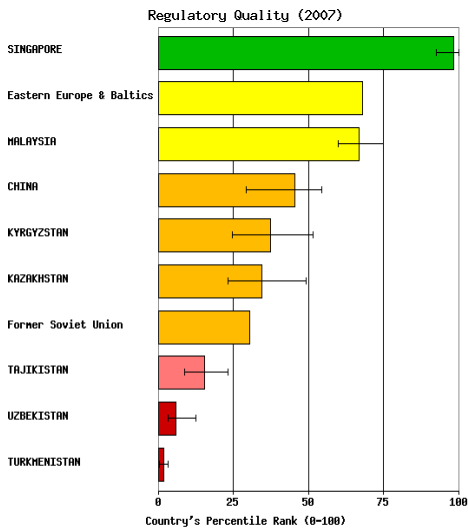


Source: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2008: Governance Matters V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7  
 Note: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presented here aggregate the views on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provi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 citizen and expert survey respondents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data are gathered from a number of survey institutes, think tank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ggregate indicators do not reflect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World Bank, its Executive Directors, or the countries they represent. The WGI are not us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allocate resources or for any other official purpose.

Figur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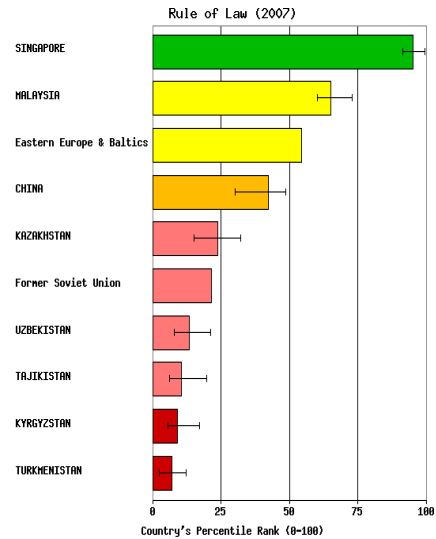
①管理指数包括引导能力、资源使用效率、共识的构 10 分的打分中，哈萨克斯坦得 4.7 分。

② World Bank (2009), Governance Matters 2008.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 - 2007,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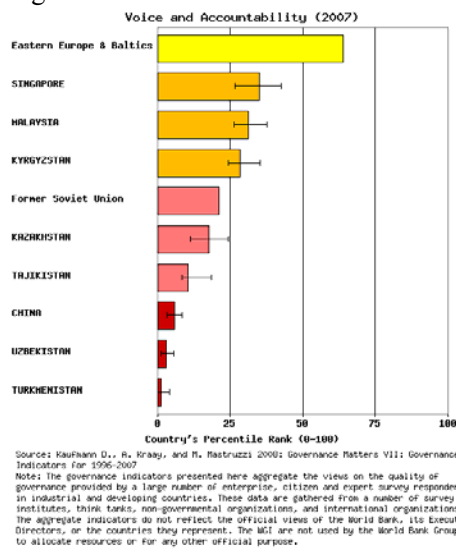
Source: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2008: Governance Matters V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7  
 Note: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presented here aggregate the views on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provi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 citizen and expert survey respondents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data are gathered from a number of survey institutes, think tank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ggregate indicators do not reflect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World Bank, its Executive Directors, or the countries they represent. The WGI are not us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allocate resources or for any other official purpose.

Figure 9



Source: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2008: Governance Matters V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7  
 Note: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presented here aggregate the views on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provi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 citizen and expert survey respondents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data are gathered from a number of survey institutes, think tank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ggregate indicators do not reflect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World Bank, its Executive Directors, or the countries they represent. The WGI are not us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allocate resources or for any other official purp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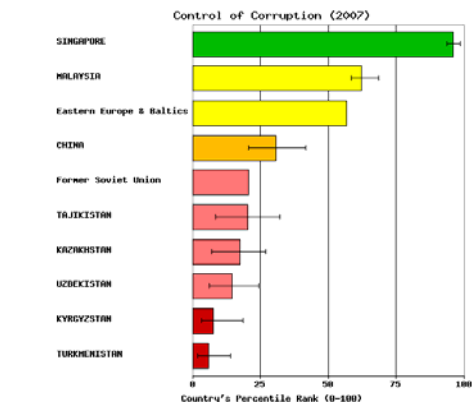
Figure 10



Source: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2008: Governance Matters V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7  
 Note: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presented here aggregate the views on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provi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 citizen and expert survey respondents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data are gathered from a number of survey institutes, think tank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ggregate indicators do not reflect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World Bank, its Executive Directors, or the countries they represent. The WGI are not us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allocate resources or for any other official purpose.

Figure 11

Source: World Bank (2009)



Source: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2008: Governance Matters V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7  
 Note: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presented here aggregate the views on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provid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 citizen and expert survey respondents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data are gathered from a number of survey institutes, think tank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ggregate indicators do not reflect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World Bank, its Executive Directors, or the countries they represent. The WGI are not us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allocate resources or for any other official purpose.

Figure 12

选择这三个东亚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因为它们（至今为止）成功地在非民主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转型，政府积极地并经常有效地干预和指导了经济改革的进程。所有这三个国家都采取了非正统的、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一个非



常称职的经济官僚班子以及相对有效的政府—企业互动界面<sup>①</sup>。另外，这三个国家代表着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见表 1）。

表 1 中亚国家和比较对象国：经济指数；2008

国家	人均 GDP (PPP), 2008	EBRD 放松管制指数
哈萨克斯坦	11.563	3.04
吉尔吉斯斯坦	2.174	3.08
塔吉克斯坦	1984	2.50
土库曼斯坦	5.765	1.50
乌兹别克斯坦	2.606	2.21
<b>比较对象国</b>		
中国	5.943	n.a.
马来西亚	14.225	n.a.
新加坡	51.649	n.a.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08)，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 EBRO (2008)，自己的计算  
PPP: 购买力平价；IMF 的估计

EBRD 转型指数建立在专家们的判断上，变动范围从“1”（尚未改革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到 4.33（有代表性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衡量）。

中亚国家明显地在各方面都落后的同时，一些特别的现象还是值得关注。考虑到所有国家的专制统治和有限的民主水平，它们在**意见表达和责任**方面的差劲表现就不足为奇了。中欧和东欧国家追随欧盟的民主模式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政策制订过程中的责任机制和公众参与原则在非民主的背景下也基本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接受。这一点被中国的例子所证实，也得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数据的支持。因此，中亚国家需要找到方法，以特别在公共管理领域发现更包容各界观点的、可靠的制订和实施政策的办法。中国和表现良好的亚洲国家的经验显示了可能的方法：构筑更紧密的政府—企业交流界面的审议委员会、培育商业中介机构、提高竞争程度等，有助于该地区的进步<sup>②</sup>。

类似的，改善**法治和反腐败**看上去基本独立于政治统治方式。甚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这些方面都得到相当的高分。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哈萨克斯坦在公共部门管理和决策质量方面表现相对较好。长期封闭的土库曼斯坦和贫穷的塔吉克斯坦则欠债较多。

哈萨克斯坦已为改善治理结构采取了重要措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

① Campos, Jose Edgardo and Hilton L. Root (1996), *The Key to the Asian Miracle: Making Shared Growth Credibl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hrens, Joachim and Mengerlinghaus, Philipp (2006),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arket-Enhancing Governance, Chinese-Styl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 No. 1, pp. 75-102.

② Root, Hilton L. (1996), *Small Countries, Big Lessons. 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hrens, Joachim (2002),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塔吉克斯坦则任重道远。关键的挑战是如何提高政治当局的信用度、改进公共部门的管理和创造市场激励机制。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为怎样找到束缚政治家手脚和提高他们的信用度的机制提供了经验。创建强大的和有管制力的公众管理组织不会削弱统治精英们的权力，反而会增强政府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和竞争，有利于建立对强势政府的约束机制。中亚国家不能想着依赖于欧盟或北约那样的强大外国靠山，而应像中国那样，争取加入 WTO，或像哈萨克斯坦那样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中寻求重要地位。最后，但并非不重要，要将企业置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

其次，通过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地方上的（公有）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即使在大规模的私有化未发生前，也能对经济起飞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双轨制下创造竞争也是可行的，比如，依据中国的模式，在农业、零售业、轻工制造业等部门培育私有企业，加强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对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引入硬性预算约束，竞争就会展开。在后续阶段，放松对工业的控制和私有化能够进一步开展。

最后，上述讨论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治理可被看作是动态的过程，政策制定者需要注意，让政策符合制度，或让制度符合政策。促进市场发展的治理结构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他们需要不时地微调以让制度及政策措施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第二，对于有效治理而言，设计和采纳因国而异和因时而异的制度结构的能力与制订政策的能力同样重要。哪些制度是合适的，要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还要看持久的非正式制度。

第三，政治合法性对于形成有利于不断变化的转型策略的社会共识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第四，公信度、独立却负责任的管制部门、以及社会共识，有利于一个能保证政治稳定和有较强治理能力的强势的但有限的政府的产生。

第五，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发展的普适模式或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有效治理并不依赖于政府的形式。

第六，虽然政策和制度改革之初，保护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制度安排的自由裁量权，以使决策不受既得利益干扰，才有利于改革，但改革的巩固还是需要以支持市场机制的新的政治模型的可预测性为前提。必须让私营业主确信，这些制度不能被政府和它的代理人随意更改或违反。

最末一点，上述主张要得到贯彻，就要实行 *增长成果分享战略*，提供给老百姓公共产品和 *实际的* 财富。这种财富分享机制能够调动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性，以及增

强人们对政治当局的忠诚。实际的财富包括给予群众住房的私有产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提供免费教育和健康保障。另外，对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扶持，对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财富。总之，增长成果分享的战略能令人信服地表明政治领导层对经济发展的承诺。与双轨制结合，它有助于创造双赢的局面，也就是没有失败者的改革。这些做法将提高政治领导层的合法性，减少潜在的对改革的抵制，也减少人们移居外国的企图。

上面这些分析再次说明，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促进市场化改革的治理模式。但构筑灵活的治理模式的最终目的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一个能够为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牢固的政治—制度基础的制度上，建立一个根植于该制度结构中的强势却有限的政府。

（王时芬译，译者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

**【Abstract】** Central Asia is increasingly the focus of intens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as well as its unsettled transition processes. Due to the institutional weaknesses document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laborate the need for a secure politico-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o explore a way of how to achieve such a foundation for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onsidering similar political side conditions, high-performing China is taken as a model of orientation fo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this essay; the more so as most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have recently begun to place a stronger emphasis on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Key Words】** Central Asia, Politico-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China's Experience

---

（责任编辑 常喆）

## 作为中亚转型国家参考模式的发展型政权\*

M. 斯达克\*\*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20年后，几乎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仍然有些转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落在后面，其中就有前苏联的5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对于这些既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更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来说，实现转型没有明显的参照模式。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在东亚地区取得成功的“发展型政权”是否也能够为中亚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关键词】**中亚 转型模式 东亚经验 发展型政权

**【中图分类号】**D73/77.36.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1-0027-(17)

### 一、导言

#### （一）即将开展经济改革的中亚

苏联解体20年后，几乎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仍然有些转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落在后面，其中就有前苏联的5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然从改革取得的进步来说，它们各不相同，但以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无一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sup>①</sup>。从独立以来就统治着这些国家的威权政府仍然面临着为这些前苏联中最贫穷、最不工业化的国家

\* 本文为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国际课题“中亚地区正在出现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制度性支持”的阶段成果。

译者注：本文的核心概念“the developmental state”中的“state”不是指国际层面的主权国家，而是指在国内层面与社会相对政府或政权机构，因此，本文未采用国内的通行译法“发展型国家”，而将其译为“发展型政权”。

\*\* M. 斯达克（Stark），欧洲商学院，奥斯特利希温克尔和哥廷根私立应用科学大学。

①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50: 30.

找到合适的转型战略的问题。

俄罗斯和中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显然是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当作了改革的主要参考模式。对于想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欧洲小国来说，改革的路径和目标都清楚地按照“所有的欧盟法律”的定义，同时也确保了政治决策者对改革的承诺<sup>①</sup>。甚至现在被认为越来越与西方保持距离的俄罗斯，在开始转型时也实施了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西方模式相一致的政治经济改革。

5个中亚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整个地区与东欧和俄罗斯有重大差别。与前东欧集团的大多数国家相比，中亚国家的转型将在缺乏民主的条件下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展开<sup>②</sup>。该地区在地理上和文化上与欧洲都有相当的距离。中亚国家坐落在俄罗斯、里海、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远离欧洲市场，都是内陆国家，无法接触潜在的出口市场。中亚的文化混合了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又拥有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遗产和旧的伊斯兰教传统，在某些方面，既有转型国家，又有“普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因此，对中亚国家来说，没有明显的参照模式，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不但分析西欧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背景，而且也要分析其他成功的经济体的制度。

## （二）东亚经验对中亚国家的适用性

非西方国家能够取得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例子极少。寻找西欧和北美以外能够作为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参考模式的国家，人们的眼睛无一例外地转向东亚，那儿有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的例子：例如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下半叶“亚洲小龙”的经济奇迹和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

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鼎盛时代，日本差点沦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sup>③</sup>。迫在眉睫的威胁，构成了1868年“明治维新”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接下去几年，新的政治当局对日本古老的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在赶超西方列强的目标指导下，在经济领域快速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sup>④</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后，日本经济在战后阶段实现了又一次被称为“日本奇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20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① Ahrens, Joachim. 2002,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② Spechler, Martin C. “Central Asia on the Edge of Globalization”, 《Challenge》, 2004/47, 3: 6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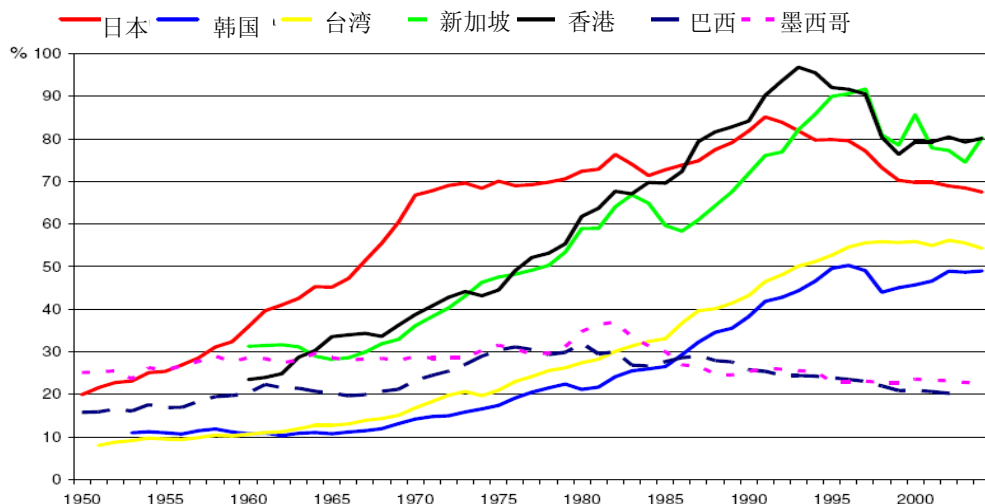
③ Kohli, Atul. 1999, “Where Do High-Growth Policies Come From? The Japanese Lineage of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Woo-Cumings, Meredith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00.

④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50-192.

在日本取得除西方国家之外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地位的同时<sup>①</sup>，其它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在最近几十年中成就了相似的经济“奇迹”。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城市国家新加坡、香港组成了新一波挑战成熟的西方经济体和日本的国家和地区。这“四小龙”中，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新加坡，都遵循了日本的发展路径<sup>②</sup>。

图1显示了上述东亚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人均GDP的比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看到，东亚国家不但在绝对值上增长快速，它们还能够在几十年里持续地追赶美国的人均收入。日本的追赶过程持续到1990年，其它四小龙一直持续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将东亚经济体和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的表现相比较可以看出，东亚的快速增长并非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追赶过程的结果，东亚国家显然做了一些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对的事情。

图1：1950-2004年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Heston, Alan/Summers, Robert/Aten, Bettina (2006)

东亚经济的成功吸引了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的注意，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文章。许多早期文章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采取了类似放任主义的市场导向政策<sup>③</sup>。这一观点在1982年首先遭到Chalmers Johnson的质疑，他曾对日本政府

①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p.6

② Akyuz, Yilmaz/Chang, Ha-Joon/Kozul-Wright, Richard. “ New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34: 6.

③ Akyuz, Yilmaz/Chang, Ha-Joon/Kozul-Wright, Richard. “ New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34: 54.

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广泛研究<sup>①</sup>。随后其他学者如Robert Wade<sup>②</sup>和Alice Amsden<sup>③</sup>等人也提出了挑战，他们曾分别发表了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相似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指出，正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才创造了这些经济体的持续的快速增长。为此，Johnson提出了“发展型政权”的概念，意思是政府充当经济发展的主要促进者。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在东亚地区取得成功的“发展型政权”是否也能够为中亚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为了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尽管“发展型政权”的概念被经济和政治领域广泛使用，但至今没有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模式来为这个概念提供清晰的、理由充分的定义。部分原因是大多数讨论“发展型政权”的主要文献缺乏明确的理论框架，也未将此概念纳入宽泛的经济理论范畴。本文受Kang<sup>④</sup>的启发，希望通过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内讨论“发展型政权”以缩小这一差距。因此，在下一章我将通过梳理出人们对“发展型政权”的普遍理解，概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为后文的分析奠定基础。随后，我将对东亚“发展型政权”的制度环境进行比较，以日本、韩国和台湾为分析的焦点，讨论这些经济体在高速发展时面临的政治情况、私营部门状况和国际环境。在非常简单地概括五个中亚国家当前在转型中取得的进步之后，本文将对这些国家的制度背景进行模拟分析。最后，我将提出初步的结论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安排。

## 二、分析的框架：在文献和理论中的“发展型政权”

### （一）文献中的“发展型政权”：一个简短的回顾

政府的角色是经济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经济学家们通常都认可政府的监管功能，比如它有责任建立和实施法治，而对于它是否应该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经济学家们有着很大分歧<sup>⑤</sup>。

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宗旨之一是广泛的市场乐观主义。这一宗旨用在发展中国家，就导致这种说法：为了让资源配置到它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

---

① Johnson, Chalmers .1982, 《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Wade, Robert. 1990, 《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③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 Kang, David C. “South Korean and Taiwanese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5/49,3:587.

⑤ Chang, Ha-Joon. 1999, “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Woo-Cumings, Meredith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82-183.

中去，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将经济从政府所强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相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特别是通过补贴、保护或类似的方式来提升经济中某些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将引起价格扭曲和低效的资源配置，结果会导致经济失败。

在《大藏省和日本的奇迹》一书中，Chalmers Johnson得出结论：日本政府的角色同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日本政府并非仅仅承担监管责任，它还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指导者，比如，通过鼓励技术转让，规划日本产业结构的发展以及推出激励机制来取得渴望获得的转变<sup>①</sup>。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伟大目标没有通过市场力量或由私营企业利用比较优势自行完成；相反，日本政府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过程。根据Johnson的说法，最好把日本的“发展型政权”描述为计划—理性的政府，而东方集团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计划—意识形态的政府，西方监管政府是市场—理性的政府<sup>②</sup>。

在Johnson的分析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通过详细阐释“发展型政权”概念来分析其他新兴经济体政策的文献。人们普遍认为另外三个表现出色的“亚洲小龙”，即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日本政府有相似的表现，虽然新加坡有时不包括在这个名单中——因为它作为一个仓库式的城市国家有着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起始条件、限制和机会<sup>③</sup>④。另外，新兴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通常被认为拥有“发展型政权”，即使它们有些特征和表现出色的东北亚国家不一样<sup>⑤</sup>。有些文章还试图为最近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式，以将不太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纳入“发展型政权”的概念内<sup>⑥</sup>。然而，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研究方法。本文集中分析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三个最明显的“发展型政权”，它们有许多共同特征。

当然，关于“发展型政权”的文献的不同之处还不限于此，它们还讨论到与计

---

① Johnson, Chalmers .1982, 《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9.

② Johnson, Chalmers .1982, 《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

③ Kang, David C. “South Korean and Taiwanese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5/49,3:587.

④ 1987年Johnson自己也将他的概念延伸到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Johnson 1987）。

⑤ Doner, Richard F./Ritchie, Bryan K./Slater, Dan . “Syste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50:327-361; Vu, Tuong ,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7/41, 4:27-56.

⑥ Amsden, Alice H., “Like the Rest: Southeast Asia’s ‘late’ industrializatio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5/ 7, 5:791;Schneider, Ben Ross .1999:, “The Desarrrollista State in Brazil and Mexico” Woo-Cumings, Meredith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划—理性的资本主义政府有关的各种不同的问题。根据Vu<sup>①</sup>论述，该领域的文献还关注三个不同的、但相互有关联的问题：

(1) 在各自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型政权”起什么作用？

(2) 各国“发展型政权”有什么共同点和一般性特征？

(3) 为什么“发展型政权”在这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地方产生？

简而言之，研究的目标是要回答“发展型政权”干了些什么，它们如何能做到这些，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第一个问题指的是“发展型政权”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使用的策略。而就“发展型政权”能否作为中亚国家的可能的参考模式来说，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更有意义。有必要判断哪些制度结构必须引入中亚国家以有利于政府充分扮演其促进发展的角色。还有，有必要判断哪些外部条件导致了东亚国家出现成功的促进发展的政府，中亚国家今天是否也具备相似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能够从理论的角度回答这两个问题。

## (二)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型政权”的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不是一种单一紧凑的理论，而是意在克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某些缺点的研究的集合。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最致命缺点是，它只关心在高度的理论和抽象假设下的市场运作，忽略了现实中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限制条件。再者，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现存市场的运行，而几乎没有对功能性市场的出现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sup>②</sup>。

被新制度经济学修改和放宽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见但相当不现实的假设，如充分信息假说和无交易成本假说。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部分著作采用了以个人理性行为为基础、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被看作不是要代替新古典经济学，而是修改和扩展它的一种方法<sup>③</sup>。过去几十年，大量的科学研究文章属于新制度经济学范畴，今天又有几个研究的流派被归类于它。两个主要的分支分别建立在Oliver E. Williamson和Douglass C. North的著作基础之上。Williamson和后来阐述他著作的学者们主要关注交易成本及其对建立公司的影响<sup>④</sup>。

---

① Vu, Tuong .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7/ 41, 4:27-56.

② North, Douglass C.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 1994/3,84: 359.

③ Ahrens, Joachim 2002,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④ Williamson, Oliver 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71/61:112-123;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另一支的研究由Douglass North发起，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贴切，主要集中在两个不同但互相关联的方向：（1）制度如何影响社会的经济表现，（2）哪些机制导致制度的出现及随着时间而演变<sup>①</sup>。

“制度”这个术语在不同文献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定义。今天最常用的定义是由Douglass North提出的。据他的理解，制度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以规范人类活动的限制条件”，或不太正规地说，是“社会游戏的规则”<sup>②</sup>。注意到这点很重要：这一定义不但包括正式的规则比如法律和法规，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比如文化规范。每个有效的规则限制了经济活动者们在做某个特别的决定时可以拥有多少个可能的选择，因为有些在理论上可行的选择可能是非法的或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这样一来，制度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行为动机的结构，并且影响着制度怎样在增长、停滞和衰退中演变<sup>③</sup>。

除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明显区别，个人或组织在做决定时所面临的限制还能被进一步分成几个领域。表 1 列出了一种可能的分类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内部制度是那些通过各种机制在私营领域层面贯彻的制度。相反，外部制度则是由政府从上到下推行，因为政府有强制性的垄断权力将法律上有约束性的规则强行施加于私营领域。

表 1：制度的分类

规 则 类 型	实 施	制 度 种 类	
习俗 道德准则 习惯	自我实施 通过活动者自我承诺 通过非正式社会控制	第 1 类—内部 第 2 类—内部 第 3 类—内部	非正规制度
正式的私域规则	有组织的私域实施	第 4 类—内部	
宪法、法律、法规	政府组织实施	外部	正规制度

来源：Voigt 和 Kiwit (1995)，有修改

显然，不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成文入典的正式规则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比起非正式的角度更容易分析。然而，没人怀疑非正式的制度，如文化或意识形态之类也会对经济活动者的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并由此最终影响经济表现<sup>④</sup>。对我们这里所分析的问题来说，非正式的制度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比正式的制度改变

①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991/1,5: 97-112;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deolo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to Journal》, Vol. 11. No. 3.1992/11,3:477-488.

②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

③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5 No. 1.1991/5,1:97.

④ North, Douglass C. “Ideology and Political/Economic Institutions”, 《Cato Journal》, 1989/8, 1:15-28.

起来更慢<sup>①</sup>。在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环境中，比如在今天的中亚和起飞之前的东亚，新实施的正式制度可能无法被充分实行。

### 三、东亚“发展型政权”成功的关键因素

#### （一）政治领域

“发展型政权”概念的中心，显然是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因此政治领域可作为分析这个概念的很好的切入点。首先，必须意识到，并非单个的政府在做有效的决定，而是一个集中了无数政府、部门和其他代理机构的庞大集合体在做出决策。这些成员之间权力的划分是由国家的正式制度，特别是宪法决定的，但也会受到难以预测结果的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简单而言，政府可被视为由政府机构和官僚体制组成，后者负责实施政府机构的决定。

#### 1. 东亚国家的政体

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故事中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该地区新兴经济体在实现高速增长的时期，都是由威权的或至少是半威权的政府在统治<sup>②</sup>。

从 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到 1987 年实现民主化，韩国总是由具有不同程度的合法性的各届政府统治着。相对宽松的统治时期比较短，大部分时期由李承晚和朴正熙的独裁政权统治着，前者从 1950 年统治到 1960 年，后者在 1962 年通过政变上台。朴正熙的统治标志着高速经济增长的开始，并通常被认为是韩国“发展型政权”执政的关键时期<sup>③</sup>，而李承晚时期则被认为是腐败、效率低下和社会动荡的时代<sup>④</sup>。无论怎样，李承晚为后来朴正熙能够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创造了条件，这些政策包括将政治权力集中于行政部门、打压共产主义思潮及削弱劳工运动<sup>⑤</sup>。

在台湾，1949 年在中国内战中被共产党打败的国民党，在 1980 年代以前一直实

---

① Roland, Gérard.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Fast Moving and Slow Moving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38, 4:109-131.

② Thompson, Mark. “Late industrialisers, late democratisers: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6/17, 4:637..

③ Minns, “John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1/22, 6:1026.

④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3-44; Kohli, Atul .1999, “Where Do High-Growth Policies Come From? The Japanese Lineage of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Woo-Cumings, Meredith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u, Tuong,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inter 2007/41, 4: 36.

⑤ Vu, Tuong,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inter 2007/41, 4:38.

行一党专制。直到 1975 年去世，蒋介石都控制着国民党和整个台湾。此后最显赫的政治人物是 1988 年在任上去世的他的儿子蒋经国<sup>①</sup>。和韩国一样，工会和劳工运动都遭到政府的压制<sup>②</sup>。

台湾地区 and 韩国在 1980 年代末都实现了民主化，而其他大多数有良好表现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目前仍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sup>③</sup>。比较而言，作为“发展型政权”原型的日本，在许多方面表现突出。从 1868 年开始工业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都实行威权统治，而从它取得久负盛名的“日本经济奇迹”的战后时期开始，它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我们还得注意，除了 1993—1996 年的短暂时期，日本的历届首相都是成立于 1955 年的自民党的成员。

在经济表现良好的阶段这些国家都流行威权统治，激发了人们讨论统治方式和增长之间关系的兴趣<sup>④</sup>。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不过，人们普遍认可一个“发展型政权”必须“强势”，以避免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权力寻租压力<sup>⑤</sup>。还有，人们提出，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工业政策上，政府坚守可信赖的承诺的能力，是新兴的东亚经济体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⑥</sup>。在政府经常被更换的环境中，这种长期的承诺几乎是不可可能的。在日本的民主政体中，不但一党独大，而且强大的官僚体系保证了经济政策的连贯性。日本的官员是各个部的雇员，所以任职不直接受大选结果的影响。在“发展型政权”中，官僚体系的重要作用在本文下一章里将作深入分析。

## 2. 经济官僚体制

除政府本身之外，国家的官僚体制是一个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Chalmer Johnson在《大藏省和日本奇迹》一书中讨论了官僚体制问题，因此它在“发展型政权”的语境中得到了特别重视。在不同的官僚体制中有些东西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按严格的精英化团体原则组织的，能够提供极其受人尊敬的职位和诱人的收入以吸

---

①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70-71.

② Thompson, Mark .“Late industrialisers, late democratisers: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6/17,4:632-633.

③ Haggard, Stephan .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East A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38,4:60; Thompson, Mark. “Late industrialisers, late democratisers: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he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6/17,4: 627.

④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参见 Thompson, 1996。

⑤ Cheng, Tun-Jen/Haggard, Stephan/Kang, David .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Korea and Taiwan: the Bureaucra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34,6:88.

⑥ Haggard, Stephan .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East A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38,4:60; Thompson, Mark. “Late industrialisers, late democratisers: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he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6/17,4:60.

引到最好大学的高才生<sup>①</sup>。

根据Johnson的研究，日本的官僚制度与英、美和大部分西方国家相比，有着一些鲜明的不同特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僚们对基本的政治决策的有力影响——因为每个部的官员既非选举产生，一般也不由大选获胜的政治家任命。Chalmers Johnson指出，在1925—1975年间，这些官僚们起草了几乎所有的法律，还控制着预算<sup>②</sup>。而在西方国家，这些明显是胜选的政治家和/或议会的任务。重要的是我们应注意到，这一对政治决策的关键影响不一定是宪法对决策权清楚规定的结果，反而有时是其他规则——甚至是非正式规则——的结果。

官僚体制之所以有影响力，一个原因是它的成员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这一点关于日本大藏省的例子描述得特别真切——Johnson认为，大藏省是日本政府中的领衔机构。在日本，人们认为一份公务员的工作是很受尊敬的，这使得各部能够吸引到最著名大学的大批最好的毕业生。一旦被录用，这些大有潜力的雇员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就在部里度过，一级级升迁，同时掌握该部活动的详细知识。一个部将由被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的一个政府阁员正式执掌，而副大臣——在部里能成功地升迁到仕途中最高官阶的公务员——通常既拥有来自下级官员的支持，也拥有更详细的专业知识。结果，一个胜选的和它的大臣们想要进行重大的政策改变，没有长期在部里工作的高级官僚的合作，是很困难的，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这种安排虽冲淡了对政策的民主控制，但它允许政府坚定追求一贯的、长远的政策目标，否则在战后日本这样的民主背景下，很难达到长远目标。

台湾地区 and 韩国的情况（与日本）有所不同，因为那里的威权统治者当然不愿意与一个高度独立的官僚体系分享权力。然而，类似于大藏省的强大的经济管理机构在台湾和韩国也有<sup>③</sup>。台湾的经济规划与发展委员会及其前身，虽不如日本大藏省权力大，却也担负着制订宏观经济发展规划和管理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初从美国获得的大量财政援助的重任<sup>④</sup>。朴正熙统治时期韩国最重要的机构是经济规划局，它在集中管理经济的过程中拥有超过其他部的可观权力<sup>⑤</sup>。经济规划局对韩国“发展型政权”

---

① Akyuz, Yilmaz/Chang, Ha-Joon/Kozul-Wright, Richard . “ New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ume 34, 1998/34,6:28.

②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20-21.

③ Cheng, Tun-Jen/Haggard, Stephan/Kang, David .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Korea and Taiwan: the Bureaucracy”,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34,6:88- 89.

④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97-199.

⑤ Cheng, Tun-Jen/Haggard, Stephan/Kang, David .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Korea and Taiwan: the Bureaucracy”,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34,6:101-103.

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的局长被授予副总理职位，这是政府中的第二高职位<sup>①</sup>。

## （二）商业部门

尽管东亚各国有相似的发展战略和政治状况，但各经济体里私营商业部门的结构并不相同。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相似之处较多，两国的私营部门都由巨型的、多种经营的商业集团主导，称为日本财团和韩国财阀。而台湾经济一方面有大量类似于德国中小企业的小型私营公司<sup>②</sup>，另一方面有非共产主义世界里最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sup>③</sup>。城市国家新加坡和上述“发展型政权”不同，其经济主要并不依赖国内公司，而是以跨国公司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为特征的。

在不同经济体中，政府影响和引导公司发展道路的制度安排的不同比商业部门的实际结构差异更加重要。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政府控制私营企业的程度因时而异，最终发展成为Johnson所称的“管理性指导”模式<sup>④</sup>，意思是政府对私营公司策略只能协调不能强制。由于高级官僚退休后普遍到私营企业担任高级职务，官僚体系对企业的管理性指导往往得以成功<sup>⑤</sup>。日本经济的特征是每个大企业集团都围绕着一家银行组建，官僚们只需影响数量有限的决策者就能对经济施加重要影响。

在韩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结构与大型的、多种经营的商业集团相结合，政府能够比日本和台湾对工商业部门实施更多控制，能够推行更加雄心勃勃的政策<sup>⑥</sup>。政府控制私营部门的一个关键机制是银行系统的国有化。朴正熙当权后不久就将银行国有化了<sup>⑦</sup>。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指导银行向它指定的目标行业投资。人们有理由认为，高度独裁的朴的统治造成了私营公司对政府指导的高度顺从。

台湾地区的情形与日本和韩国不同，当局与私营企业只有很少的联系。1980年代晚期民主化之前的台湾当局由国民党员组成，他们是在同共产党的内战中失败后从大陆逃到台湾的。相反，工商界则由台湾本土人士掌控。两大集团中缺乏联系和

---

① Minns, John.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1/22,6:1026.

② Thompson, Mark. “Late industrialisers, late democratisers: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6/17,4:636.

③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320.

④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 p.318.

⑤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 p.21.

⑥ Akyuz, Yilmaz/Chang, Ha-Joon/Kozul-Wright, Richard. “New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34,6:7.

⑦ Minns, John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1/22,6: 1026.

信任使得国民党当局比韩国和日本政府更依赖于公营企业<sup>①</sup>。台湾不用补贴特定目标行业的办法引导私营企业，也不以投资私营企业来提高其积极性，而是依靠国有企业来进入新的行业。

### （三）外生的成功因素和制约因素

前文的主要目的是概括出东亚国家是如何实施其发展战略的。结论是这些政府的统治方式和官僚体制非常强大，足以实行广泛的控制及做出可能不受欢迎的决策。本节我们改变一下焦点，尝试回答下面的问题：这些国家为什么对经济增长这么专注。同上面一样，简单而言，答案是它们太弱势，无法采取另一种策略。

日本废除幕府将军的封建统治开始快速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或经济剥削的反抗。对一个自我封闭几个世纪的国家来说，这一迫在眉睫的外来威胁致使它迅速而成功地适应了西方的技术、法律和习俗。在战后阶段，看到自己落后于西方国家，大多数日本政治家和官僚们被迫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

有趣的是，大多数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都受到相似的威胁<sup>②</sup>。比如说韩国，北朝鲜对它的自治和生存构成永久的、严重的威胁，1953年结束的朝鲜战争就是明证。城市国家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以前则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除了外部威胁，另有更深层的原因迫使东亚国家走上经济发展之路：无论日本还是其他先行一步的东亚国家都没有引人注目的自然资源。

外部严峻威胁的存在与缺少容易获得的可支配收入，使工业化和赶上发达国家成为东亚经济体唯一可行的抉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两个条件都限制了东亚国家决策者所进行的选择。它们因此可被视为外生的制度。外来的威胁也使私营部门愿意相信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的承诺，这是公司愿意承担风险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台湾地区和韩国，还有二战刚结束时的日本，都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援助，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可观的财政资源；然而，假如政治精英们通过明显不正当的手段致富的话，这些资源也会被迅速消耗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表现优良的东亚国家有条件进入重要的西方市场，这就要求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成功。此外，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状况，以及韩国、台湾、日本在二战后同美国的亲密关系，使它们一面向外国出口，一面保护幼小行业的公司不受外

---

① Cheng, Tun-Jen/Haggard, Stephan/Kang, David.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Korea and Taiwan: the Bureaucracy",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34,6: 89.

② Haggard, Stephan .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East A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38,4:60; Ahrens, Joachim .2002,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210.

国公司的竞争和恶意并购<sup>①</sup>。

另一个有助于韩国和台湾地区诞生“发展型政权”的外部因素，是日本留给它们的殖民地遗产。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肯定是压迫性的和粗暴的，但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启动了工业化，创立了紧凑的官僚体系及中央集权的、强有力的制度<sup>②</sup>。殖民统治还使两地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形成了大量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sup>③</sup>。

#### 四、从“发展型政权”的角度看中亚地区

##### （一）中亚地区的经济转型：一个简短的概述

在所有最近 20 年里摆脱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中，中亚的共和国被整体上视作最不成功的集团<sup>④</sup>。这有多种原因。早在转型开始前，中亚就是苏联的最贫穷地区。苏联经济是按一个整体来规划的，指派给五个中亚共和国的角色是为苏联更加工业化的地区提供原料<sup>⑤</sup>。除这些艰难的初始条件外，共产主义的终结和东方集团的崩溃对该地区来说也是毫无准备的<sup>⑥</sup>。

中亚国家独立后选择了不同的转型战略。5 个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常被认为改革力度最大。Spechler 因此称吉尔吉斯斯坦是“新自由改革的一个早期代表”<sup>⑦</sup>。哈萨克斯坦最初的快速改革步伐在 1990 年代中期却慢了下来<sup>⑧</sup>。虽然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走得很远，三分之二的企业已由私人拥有，但哈萨克斯坦仍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sup>⑨</sup>。出于种种原因，其他三个中亚国家的转型进行得较慢。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遵循着一种不是强调增长，而是不惜一

---

① Amsden, Alice H. “Diffusion of Development: The Late-Industrialization Model and Greater East As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81,2:284-285.

② Kohli, Atul .1999, “Where Do High-Growth Policies Come From? The Japanese Lineage of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Woo-Cumings, Meredith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ohli, Atul .2004,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Spechler, Martin C. “Hunting for the Central Asian Tige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0a/3:101.

④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50: 30.

⑤ Pomfret, Richar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from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212:12.

⑥ Pomfret, Richar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from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212:41.

⑦ Spechler, Martin C. “Central Asia on the Edge of Globalization”, 《Challenge》, 2004/ 47, 3: 71.

⑧ Pomfret, Richar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from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212:8.

⑨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 50:33.



切代价求稳定的经济转型路线<sup>①</sup>。结果，更加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只能慢慢推行，甚至几年后出现倒退<sup>②</sup>。塔吉克斯坦的改革在 1997 年前被一场内战严重阻碍，此后进步也非常缓慢<sup>③</sup>。土库曼斯坦在萨帕穆拉·尼亚佐夫的极其个人化和独裁的政府统治下，改革进程就更糟糕了<sup>④</sup>。

## （二）政治领域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半）威权的统治下取得了经济成功，从西方伦理角度来说是不令人愉快的。然而，撇开政治统治的道德因素，这种成功使得“发展型政权”成为中亚国家发展的一个更合适的参考模式。所有五个中亚国家现在都明显地处在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sup>⑤</sup>。

在中亚两个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从 1991 年两国独立以来就控制着政府。三个较小国家的情况也只是稍有不同。在土库曼斯坦，自封为土库曼之王的萨帕穆拉·尼亚佐夫的严厉独裁统治直到 2006 年他去世后才结束。古尔班古力·贝尔迪穆哈迈德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根据官方统计，他获得了 89.23% 的选票。这次大选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严重质疑。塔吉克斯坦在独立后被一场内战摧毁，艾莫玛莱·拉赫蒙总统从 1994 年起一直当政，他以 79.3% 的得票率赢得了 2006 年的最近一次总统选举。在唯一显出一点政治自由化迹象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一场“郁金香革命”迫使阿斯卡·阿卡耶夫总统在 2005 年辞职。他的继任者库尔曼贝克·巴基耶夫是否会认真追求民主合法性还有待观察。

在有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之后，中亚国家的威权统治很明显不再是——至少不一定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障碍。事实上，威权主义能够成为模仿东亚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优势，因为在一个更民主的背景里很难坚持一国长期发展的方向。经验显示，中亚的政府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力来追求以东亚经济体为模式的政策。但它们是否也有能力实施这些战略，即，一个能胜任的官僚体系是否已存在或即将出现，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方面，乌兹别克斯坦似乎比其他中亚共和国有一

---

① Spechler, Martin C. “Uzbekistan: The Silkroad to Nowhere?”,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0b/18,3:295.

② Pomfret, Richar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from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212:9.

③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50:38

④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50: 35.

⑤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50:30-53.

定的优势，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它曾是该地区的行政中心，因此继承了一个有一定的效率——虽不够高效率——的官僚体制<sup>①</sup>。

虽然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是威权政府，它们并不像独裁统治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那样过分压榨自己的百姓。Ahrens 指出<sup>②</sup>，韩国和台湾的政府通过让其国民广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来取得合法性。表现最佳的东亚经济体中财富分配令人吃惊地均匀。这一事实证实了上述观点。与之相反，从转型开始时，不公平和贫穷就在中亚国家发生<sup>③</sup>，比如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所带来的利润大多成了在昂贵消费的新首都阿斯塔那的新富阶级的财富<sup>④</sup>。

### （三）外生的成功因素和制约因素

一个成功的“发展型政权”必须有力量来推行有时甚至不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而它又需要拥有一些弱势来依赖某种形式的合法性。人们非常怀疑适合中亚国家发展的外部因素是否能让那里的威权政府投身于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的战略。不同的中亚国家状况相差很大。

该地区矿产资源分布不均匀。目前两个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它们都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去年这些很容易出口的资源价格飙升，它们获利甚丰。然而，从本文的立场来看，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对物资出口的严重依赖，也带来了很大的危险。危险之一是政治精英们，特别是在这种威权统治的国家，利用这些很容易染指的收入为毫无必要却自以为可以提升国家声誉的项目融资，甚或使之成为他们个人财富的来源。两种情况在上述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sup>⑤</sup>。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条件与表现良好的东亚经济体有天壤之别。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情况与之不同，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以自然资源的出口为主，也就无法开发这类很容易获得的利润。

中亚和快速发展之前的东亚国家相比，中亚各国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外部威胁不那么迫在眉睫。虽然它们被经济上、军事上都强大得多的国家所包围，但俄罗斯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都不敌对。将来或许某一个强国会在该地区谋求

---

① Pomfret, Richar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from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212:22.

② Ahrens, Joachim .2002,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210.

③ Pomfret, Richar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from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212:9

④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50:33-34.

⑤ Spechler, Martin C.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A Survey”,《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50:33-34..

压倒性的影响力，但这两国仍会致力于与中亚国家合作<sup>①</sup>。

一些条件有利于“发展型政权”在中亚地区的出现。Spechler 指出，前苏联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物质资本方面留下了一些东西，可以和日本在韩国和台湾的遗产相比。另外，在外部威胁基本消除之后，中亚国家内部的种族疏离就成了该地区的内部威胁。如果当局由此得出结论：它们必须谋求合法性，否则内部动乱的可能性会威胁它们的统治，那么这种内部威胁也会产生积极意义。

## 五、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在许多方面，东亚“发展型政权”呈现给中亚转型国家一个合适的参考模式。中亚地区政治方面的条件更像东亚地区快速增长开始时的威权统治，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然而，中亚国家是否真的能分享类似东亚国家那样的经济成功的经验，仍是一个大问题。直到今天，该地区的政府还未能证明它们是专注于经济发展的；也没有具体证据将中亚国家与众多未能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区分开来。

乌兹别克斯坦似乎比其他中亚国家有更好的机会走上“发展型政权”之路。如 Spechler 指出的，乌兹别克政府已公开宣称它要模仿日本和韩国，而非西方国家<sup>②</sup>。这一承诺的可信度还有待观察，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面临的外部威胁还不是特别强。

本文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分析还比较肤浅。要更深入地研究，就需要对中亚国家进行更彻底和详细的分析。然而，这些国家的可靠数据和对其的科学研究都相对缺乏，使得这一任务十分具有挑战性。另外，在分析中不但要运用最成功的“发展型政权”的例子，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也要运用最近正在追赶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的例子，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几个国家比它们的东北亚伙伴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也面临着更少的外部威胁。虽然这些国家相对缺少外来的限制，但它们仍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纪录。

（王时芬译，王铁军校）

---

**【Abstract】** Two decad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transition

---

① Pomfret, Richard. “Central Asia Since 1991: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from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3/212:10.

② Spechler, Martin C. “Hunting for the Central Asian Tige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XLII No. 3. 2000a, p. 101-120; Spechler, Martin C. “Uzbekistan: The Silkroad to Nowhere?”,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0b/18,3:295-303.

from a comman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has been completed—with differing degrees of success—in virtually all formerly communist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transition countries that are lagging behind in this process, among them the fiv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in Central Asia. Regarding these republics which differ from both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there is no apparent reference model. This article aims at analyzing whethe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at was so successful in East Asia can also serve as a reference model for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 Key Words 】** Central Asia, Transition Model, East Asian Experiences, Developmental State

---

(责任编辑 姜 睿)

## 全球与地区制度竞争中的后苏联国家：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A. 利布曼\*  
Д. 乌什卡洛娃\*\*

**【内容提要】**本文从哈萨克斯坦的实例出发，考察单个国家利用制度竞争吸引外国投资产生的一系列决策的差异性问题。它主要聚焦于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效果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恰恰是正规经济制度发展和实施的推动力。哈萨克斯坦的例子展现了这二者相对重要性的转变对国家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所产生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层面在制度竞争中的相对重要性。

**【关键词】**后苏联地区国家 全球与区域制度竞争 哈萨克斯坦

**【中图分类号】**F13/37.36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1-0044-(19)

### 一、导 言

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的新独立国家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议题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传统安全议题往往直接与军事实力引发的挑战相关，这是该地区大部分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则经常与国际经济竞争相关联——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区域间的——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因素。事实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后苏联地区这20年来的独立发展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反应。不同的国家会推出不同的政策满足外国投资者，进行本国企业的国际扩张、经济开放和市场保护。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政策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际经济

\* A. 利布曼，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 Д. 乌什卡洛娃，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全球化与一体化问题研究中心。

竞争有很多层面，可以从不同方面感受到，它们通常在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中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主要观点，这和全球化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紧密相关。一个是“地缘经济学”路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近几年有很强的复苏迹象（它是作为围绕国家财富基金和所谓“经济爱国主义”讨论的一部分<sup>①</sup>）。考虑到各国实力不均衡，它着眼于经济如何开放的问题，同时它将自由市场看作是一个非直接的统治工具。这一概念经常被用在该区域政府间资源分配、管道建设项目中讨价还价的工具。

另一个路径将自由市场看作是实力的**主体**而不是**工具**，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通过调整政策（个性化或非个性化）以应对来自私人企业团体的压力。本文聚焦在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这个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和进行的研究还较少，可以从**制度竞争**理论这个角度来研究，该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已经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制度竞争将经济政策的制订描述为对制度和经济政策在市场上的“出价”建构，其间，政府对于流动生产因素的竞争会导致对经济政策和司法管辖权限中的正规制度的调整。这个观点将帮助后苏联地区的各类政策概念化为全球和区域制度竞争中的各种战略。本文运用这个路径研究哈萨克斯坦经济政策的演进过程。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极为有趣的例子，这样说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在这个国家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政策制订过程形成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都要大。第二，哈萨克斯坦，下面也会展示，过去20年在制度竞争的定位方面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所实施的不同战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不同实例。第三，哈萨克斯坦所卷入的竞争有两个层面：全球制度竞争，是为了吸引跨国资本，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区域制度竞争，是在后苏联地区内进行，这个在2000年以后变得尤为重要。两种竞争的卷入程度有一定的内生性，因为他们分别取决于单方自由化战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参与。最后，尽管本文不会论及，但值得注意的是，“地缘经济”竞争和制度竞争具有互补性。

本文结构如下：接下来的部分将呈现笔者推理的简明理论逻辑。第三部分阐述哈萨克斯坦作为制度竞争的一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后采用的多种吸引流动生产要素的战略。第四部分将转到更高层面的分析，考察哈萨克斯坦在为制度竞争超规则设计时所作的努力——在后苏联空间内进行经济一体化，以理解制度竞争中的变化以及内部政治环境对于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地位发生转变的影响。最后，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

① Klinova, M. (2008): Novyi “Ekonomicheskiy Patriotism” v Evrope: Khorosho Zabytoe Staroe? 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4)

## 二、制度竞争的效果种类

制度竞争包含了社会科学领域很大部分的研究<sup>①</sup>。基本上，目前的研究成果包含了关于制度竞争范畴的六个主要方面。依据蒂布特群分(Tiebout sorting)观点，制度竞争将使个体权限根据他们的不同倾向进行分配，这样就能通过确保满足人们的不同倾向、不同偏好以提高制度的质量。不过，这也会导致制度系统出现分歧<sup>②</sup>。制度化企业家精神(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路径的研究角度则是基于进化经济推理得出的相同结果，不过这一角度强调学习和制度革新<sup>③</sup>。竞次(race to the bottom)观点则假设个体有相同的偏好，在一个仁慈政府管理的世界里，制度竞争实际上会降低制度质量。对于规则竞争，它意味着“零规则”均衡(不过，产品规则和过程规则会产出不同的效果，后者更有可能带来消极影响)<sup>④</sup>。然而，这一观点也可以大致上归类于财产权和合同执行制度<sup>⑤</sup>。这也是负聚合观点作出的预言，它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受到较少的关注<sup>⑥</sup>。竞次路径和负聚合路径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流动因素的偏好作用，而后者关注相互学习的效果。<sup>⑦</sup>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观点，不同于竞次和蒂布特群分，它认为政府往往是利己主义的，并由此认为制度竞争实际上限制了政府的寻租，这样就提高了制度的质量<sup>⑧</sup>。最后，资本主义多样化观点认为不同国家的制度是高度稳定的，尽管有流动性因素，但他们的比较优势保存了经济秩序中的基本结构<sup>⑨</sup>。

所以，制度竞争范畴可包含三个聚合结果(政治经济，负聚合以及竞次)、三

---

① Vaubel,R.(2008):A History of Thought on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in:Bergh,A.,and R.H?ijer(eds.):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Cheltenham:Elgar

② Oates,W.E.(2006):The Many Faces of the Tiebout Model,in:Fischel,W.A.(ed.):The Tiebout Model at  
Fifty.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③ Wohlgemuth,M.(2008):Learning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in:Bergh,A.,and R.H?ijer(eds.):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Cheltenham:Elgar

④ Scharpf, F.W. (1998): Globalisierung als Beschränkung der Handlungsmöglichkeiten national-  
staatlicher Politik. Jahrbuch für Neue Politische Oekonomie 17

⑤ Libman,A.(2008):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MPRA Working Paper No.10936

⑥ Oleinik, A. (2007): Errosia Demokratii v Rossii i na Zapade v Svete Gipotesy o Negativnoi  
Konvergencii. Obshchestvennye Nauki i Sovremennost (2)

⑦ 事实上，这是个比较老的观点。亚当·斯密称“对于政府而言，没有比从人民的口袋里榨取钱财  
学习得更快的技能了。”

⑧ Sinn,S.(1992):The Taming of Leviathan: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s.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2)

⑨ Hall,P.A.,and D.Soskice(2001,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个趋异结果（蒂布特群分，制度化企业家精神以及资本主义多样化）、四个高效结果（蒂布特群分、制度化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多样化和政治经济）、两个低效结果（竞次和负聚合）。该理论中形成结果的预测与现实中制度竞争存在的多样化结果恰恰相匹配。这也催生了第七种研究观点：和市场竞争中的“秩序自由主义”观点相类似，制度竞争可能也会承载起一种“超规则”的功能，这种功能将调节政府在公共物品、制度以及经济政策等市场上的行为<sup>①</sup>。然而，分析私人物品市场可以看到，规则制定功能往往交由外部代理人（政府），在制度竞争的世界里，规则是交由竞争者自己来制定的，不过，事实上，在没有“无知之幕”的世界里，不管何种形式的规则还会受到特定国家对于以往制度竞争发展所作的预期的影响。

有趣的是，从多种研究路径都可以轻易得出超规则设计结果的预言。蒂布特群分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就可以用于研究范畴结构的构成、数量和稳定性，而不用在现行范畴之间作迁移，这点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所涉及<sup>②</sup>。对目前研究成果所作的简化调整表明，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去集中化程度（即制度竞争）取决于在集中化带来的好处和偏好呈现出的异质之间进行的交换。不管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考量，还是从税收的竞次观点都认为政府为防止制度竞争会试图在市场上建立制度卡特尔（当然个中原因不尽相同：为了保护寻租或者为了提高他们公民的福利），这种卡特尔可能相对而言比较稳定<sup>③</sup>。最后，资本主义多样化观点并没有为超规则的设计提供任何概括性的预言。但是这一观点试图分析国际议价的作用，据此评估这一作用是否能够支撑特定资本主义多样化的蔓延<sup>④</sup>。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对于制度化企业家精神和负聚合这两个“以学习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目前并没有研究成果涉足此二者的内生的超规则的形成。事实上，沿着进化经济学对于市场垄断之于私人物品所持的怀疑态度（这点在奥地利经济学中被特别提及<sup>⑤</sup>），在制度化企业家精神的世界里，内生的超规则不大可能限制制度竞争。在负聚合的世界里，政府事实上的联合是可能的，但是不同于竞次或政治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联合更多地来源于制度环境的全面相似性，而不是试图对制度竞争作出限制。

表1提供了一个关于制度竞争在不同范畴的几个主要研究方法的高度程式化的

① Seliger, B. (1999): Ubi certamen, ibi corona: Ordnungspolitische Option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wischen Erweiterung und Vertiefung. Frankfurt et al.: Peter Lang

② Demange, G., and M.H. Wooders (2005, eds.): Group Formation in Economics: Networks, Clubs and Coali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Eichenberger, R. (1994): The Benefits of Federalism and the Risks of Overcentralization. *Kyklos* 47(3). Davis, R. B., and H. T. Naughton (2006):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 Spatial Approach. Mimeo

④ Callaghan, H. (2008): How Multilevel Governance Affects the Clash of Capitalisms. MPIfG Discussion Paper No. 5

⑤ 比较 Rothbard, M. (2004): *Man, Economy, and State*.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概述。尽管单个模式的区别是由于假设上的区别所造成，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一个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制度的真实世界里，不同的效果是存在的，这取决于制度或地区的类别。

表1：制度竞争理论：概览表

理论	动力	制度聚合	有效结果	对制度竞争的内生性超规则
蒂布特群分	根据个体偏好进行归类	没有	有	异质偏好和中心化优势之间的平衡决定了一种多范畴性结构
制度化企业家精神	学习和制度创新	没有	有	制度的自由竞争
竞次	来自流动要素所有者的压力	有	没有	为限制制度竞争，政府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卡特尔
负聚合	政府间的相互学习	有	没有	政府因为制度的全面相似性而进行的联合
政治经济	来自流动要素所有者的压力	有	有	为限制制度竞争，政府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卡特尔
资本主义多样化	流动和非流动要素利益集团间的互动	没有	有	多层次管理作为特定资本主义多样化的支撑工具

制度竞争的结果不仅受到超规则对于市场制度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单个国家内部决策结构的影响<sup>①</sup>。政府在充满流动要素的世界里调整其行为的方法取决于内部政治的组织形式。制度竞争的动力聚合实际上由政治系统完成。首先，制度竞争的效果不是微不足道的，通常有偏移<sup>②</sup>。其次，政治代理人的反应往往取决于相互之间的互动。很明显，依据不同的制度竞争内部政治决定的规则也会有很大变化；这样一来从共同进化角度来谈要比单边影响更合理。与此同时，识别与外来投资者进行议价的不同群体和代理人的利益也很重要，他们自己不同的目的和利益追求。不管如何，如果不能理解特定国家的决策机制，就不可能去预言制度竞争的结果。图1给出关于这个案例一个简单的决策逻辑。

① Heine,K.(2006):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A Research Not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26(1)

② Heinemann,F.,and E.Janeba(2008):The Globalization of Tax Policy:What German Politicians Believe. Mim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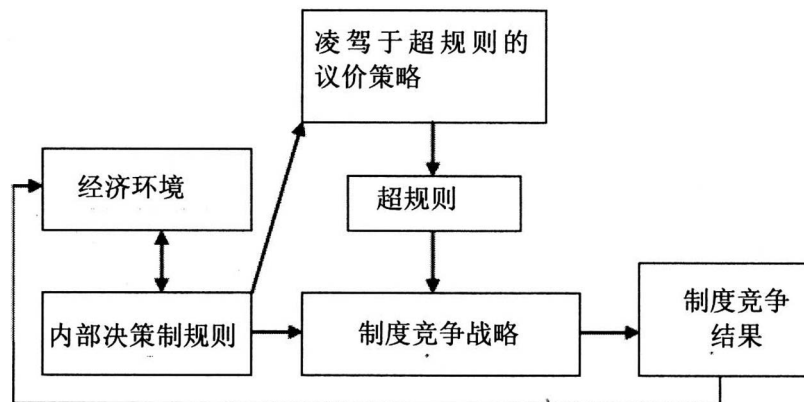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的内部制度和竞争

### 三、为争取外来投资的竞争：政治偏见 VS 政治生存

#### （一）基本思想

本文关注的是制度竞争战略和内部政治之间的一个很简单的平衡关系：**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间的互动。一方面，区域内的不同政府从个别政策中的获利能力是不同的<sup>①</sup>。举例来说，一个现代政府的岁入来源于税收，其行为就和那些中世纪政府或者那些依靠私人经济活动获得岁入的政府的行为不同<sup>②</sup>。对于前者而言，资本流入意味着明确的岁入增加；而对于后者，在资本流之于经济的正面效果和潜在竞争对于特权企业的负面效果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相对而言，如果国际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并且资源环节为人所控制，那么后者在资源经济中的比重将变大。另一方面，政治行为者的决定是由他们的生存逻辑和不断增加的权力驱动的，两者都由内部和国际的政治竞争造成的。

哈萨克斯坦属于资源开采型国家；石油、汽油、矿业和金属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尤为重要。从这点来讲，由于相对稀少的人口和不怎么吸引人的内陆国家地理位置也，自然资源是哈萨克斯坦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原因。因此，国际制度竞争中的战略选择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指的正是为跨国公司在以上的资源产业打造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拥有自然资源的政府往往无需新公司的进入或国内经济的发展，就可能从世界市场中获取相当可观的岁入。因此，政治偏见效果在这些经济体中就表

①在冲突经济学中，类似的观点用来指政治偏见效果，比较Jackson, M.O., and M. Morelli (2007): Political Bias and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4)

② Volckart, O. (2002): Wettbewerb und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Marburg: Metropolis

现为明显的偏向于拦截跨国公司的进入。在过去20年里，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逻辑之间的矛盾似乎支配了这一地区国家对政策实施的选择。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哈萨克斯坦政府的主要任务可能是确保国家稳定：在“三重转型”中<sup>①</sup>，国家建设远比经济和政治改革重要。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人口众多俄罗斯少数民族），苏联时期也并不存在强大的分裂运动。在哈萨克斯坦，政治权力集中化程度比较高，和俄罗斯、乌克兰国内的反对派相比，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反对派势力较弱；总统获得的支持也较强。不过，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们所面对主要问题是“国际合法性”的严重不足：这个国家必须向国内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展示其具有维系一个独立国家的能力。此外，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商品市场表现相对疲软的时期。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危机斗争中，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了，争取投资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发展，而仅仅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经济体系的生存。如此一来，制度竞争的主导战略成了为大型跨国公司创造极具吸引力的各类条件，同时，这也是通过培育经济改革来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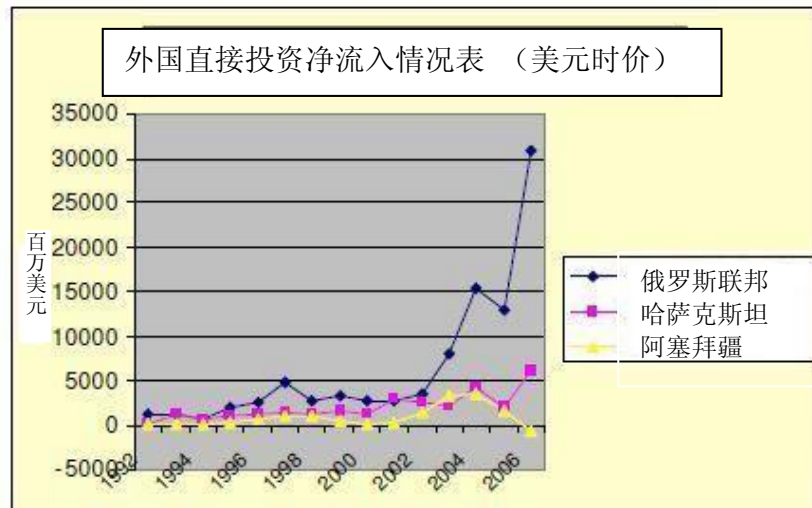
2000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稳定大为巩固，而全球市场则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由此一来，政治偏见的后果愈加突出。与大部分其他后苏联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一大批拥有特权的企业集团交往甚密。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获取“绩优”资源的渠道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当时为跨国公司提供许多优惠待遇），在21世纪前十年的后半叶，利润显然比合法性的风险和外来投资对于经济的正面影响更重要：因此，哈萨克斯坦进入到重新国有化阶段。接着的两部分将着重谈这个问题。

## （二）20世纪90年代：政治生存逻辑

与其他后苏联国家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确获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在那段时期，哈萨克斯坦在所有独联体国家中成为获得外国直接投资位居第二的国家（见图2），仅次于俄罗斯。而在人均获得外国直接投资（见表2和图3）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方面，其表现还超过了俄罗斯（见表3）。

---

<sup>①</sup> Offe,K.(1991):Capitalism with Democratic Design?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Social Research 58(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集团，2008年。

图2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情况表 (美元时价)

表2: FDI, 净流入 (国际收支统计), 人均当前美元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亚美尼亚	128.41	0	2.4	7.8	5.5	16.5	70.8	39.4	33.8	22.8	36.3	39.8	72.3	85.6	114.1
阿塞拜疆	0.3	0.1	0	42.9	80.8	142.2	129.3	63.9	16.1	27.9	170.4	399	428.1	200.2	-68.8
白俄罗斯	0.7	1.71	1	1.4	10.3	34.8	20.2	44.2	11.9	9.6	24.9	17.4	16.7	31.2	36.4
格鲁吉亚	...	0	1.6	1.2	1.1	49.6	54.9	17.2	27.8	23.5	34.7	73.3	109	101.2	239.1
哈萨克 斯坦	6.1	77.9	41	61	73	86.2	76.4	106.3	86.2	190.8	174.3	140.3	276.9	139.6	401.3
吉尔吉 斯坦	...	2.2	8.4	20.9	10.1	17.7	22.8	9.1	-0.5	1	0.9	9	34.4	8.3	35.1
摩尔多瓦	3.9	3.2	2.6	5.9	5.5	18.3	17.7	9	30.8	13.3	20.8	18.5	21.8	50.9	63.1
俄罗斯	7.8	8.2	4.7	13.9	17.5	33	18.8	22.6	18.6	18.8	23.8	55	107.4	90	216.3
塔吉克 斯坦	1.6	1.6	2.1	1.7	3.1	3	5	1.1	3.8	1.5	5.7	5	42.1	8.3	51
土库曼 斯坦	...	19.8	25.1	55.6	25.3	24.9	14.1	28.1	28	37.2	21.6	21.3	-3.2	12.7	149.2
乌克兰	3.8	...	3.1	5.2	10.2	12.3	14.8	10	12.1	16.3	14.4	29.8	36.1	165.8	119.9
乌兹别 克斯坦	0.4	2.2	3.3	-1.1	3.9	7.1	5.8	5	3	3.3	2.6	2.7	0	1.7	6.2

来源：世界银行集团，2008年；原始记录。

表3: 外国直接投资, 净流入 (% of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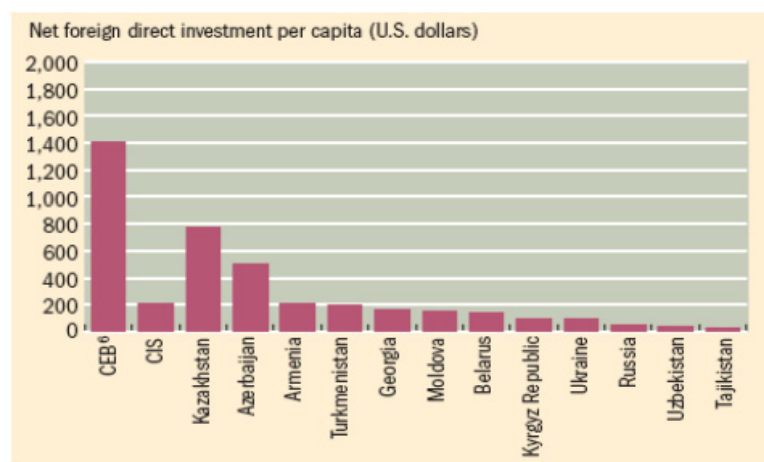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亚美尼亚	348.2	0	0.6	1.7	1.1	3.2	11.7	6.6	5.5	3.3	4.7	4.3	6.1	5.3	5.4
阿塞拜疆	0	0	0.3	10.8	19.7	28.1	23	11.1	2.5	4	22.3	45.1	41	12.7	-2.8
白俄罗斯	0	0.1	0.1	0.1	0.7	2.5	1.3	3.7	0.9	0.8	1.7	1	0.7	1	1
格鲁吉亚	...	0	0.3	0.2	0.2	6.9	7.3	2.9	4.3	3.4	4.7	8.4	9.6	7.1	13.7
哈萨克斯坦	0.4	5.4	3.1	4.7	5.4	6	5.2	9.4	7	12.8	10.5	6.8	9.6	3.5	7.6
吉尔吉斯斯坦	...	0.5	2.3	5.8	2.6	4.7	6.6	3.6	-0.2	0.3	0.3	2.4	7.9	1.7	6.5
摩尔多瓦	0.7	0.6	0.7	1.5	1.4	4.1	4.6	3.2	9.9	3.7	5.1	3.7	3.3	6.6	7.1
俄罗斯	0.3	0.3	0.2	0.5	0.7	1.2	1	1.7	1	0.9	1	1.8	2.6	1.7	3.1
塔吉克斯坦	0.5	0.5	0.9	0.8	1.7	2	2.3	0.6	2.4	0.9	2.9	2	13.1	2.4	12
土库曼斯坦	...	2.5	4	9.4	4.5	4.4	2.4	5.1	4.3	4.8	2.2	1.7	-0.2	0.8	7
乌克兰	0.3	...	0.3	0.6	1.2	1.2	1.8	1.6	1.9	2.1	1.6	2.8	2.6	9.1	5.2
乌兹别克斯坦	0.1	0.4	0.6	-0.2	0.6	1.1	0.9	0.7	0.5	0.7	0.7	0.7	0	0.3	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集团, 2008年; 原始数据。

从1992年到2002年, 外国直接投资对哈萨克经济的每年净流入增长在1994年的近-20%和1993年超过1200%之间变化。对哈萨克斯坦来说, 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的竞赛中, 1995年至1997年稳步增长的投资流入最为重要。与俄罗斯不同, 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对哈萨克经济的负面效果较小(见图2), 哈萨克斯坦在1998年后外国直接投资的下滑非常有限。这样一来, 在2002年, 哈萨克斯坦的人均净外国直接投资至少是俄罗斯的八倍(见图3)。

图3: 人均净外国直接投资, 2002年

人均净外国直接投资情况表(美元)



资料来源: 金融与发展, 2003年

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直接流向哈萨克经济最具竞争力的部门——矿业、冶金、电力生产。举例来说，1993年，哈萨克斯坦72.5%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石油部门。到1994年，这个数字是62.2%。1995年，33.1%投资在矿业，20%在石油，16.6%在基础金属生产。1996年，32.8%投入到基础金属的生产中（23.3%流向稀少的有色金属制造上），20%投入石油（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家概览：哈萨克斯坦（UNCTAD WID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2008, 见表4）。

**表4：1993年至2002年哈萨克斯坦中外国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表**

部门/产业	FDI, 百万美元	占FDI 总量百分比
总量	14642.9	100
第一产业	9119.3	62.3
农业、捕猎、森林、渔业	11.7	0.1
矿业。采石和石油	9107.7	62.2
矿业和采石	408.7	2.8
铀和钍矿石的开采	30.9	0.2
煤。褐煤的开采以及泥煤的提取	3.2	0
金属矿石开采	363.3	2.5
其他矿业和采石	11.22	0.1
石油	8699.1	59.4
第二产业	1329	9.1
食品、饮料和烟草	434.8	3
纺织、服装和皮革	1.7	0
木材和木制品	10.9	0.1
焦炭、石油产品和核燃料	201	1.4
化学和化学制品	83.3	0.6
橡胶和塑料制品	4.1	0
非金属矿石	20.3	0.1
金属和金属品	492	3.4
碱性金属	491.4	3.4
碱性钢铁的制造	39.2	0.3
碱性稀有非铁金属的制造	452.5	3.1
金属制品	0.6	0
机械和器械	4.9	0
电子和电子设备	72.9	0.5
发动机和其他交通器材	0.8	0
其他制造业	1.82	0

第三产业	3832.4	26.2
电、气、水	349.9	2.4
建设	84	0.6
贸易	145.3	1
宾馆和饭店	21.5	0.1
交通、仓储和通信	345.3	2.4
金融	252.5	1.7
企业活动	2507.5	17.1
公共管理和国防	126.4	0.9
其他	362	2.5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家档案：哈萨克斯坦，2008年，第18页

因此在21世纪初，外国投资者在诸多关键工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比如石油开采，能源利用以及冶金部门。2002年全年的外国直接投资股份达到15.3538亿美元（UNCTAD WID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2008）。根据相关估计，21世纪早期，主要为外商控制的公司占哈萨克斯坦工业产能的40%，主要为外商控制的公司占了该国国外贸易的50%<sup>①</sup>。事实上，为重新制定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税收政策或新的社会责任要求，哈萨克斯坦政府经常作出一些机会主义行为（CVEI, 2003, p. 121），但跨国公司对哈萨克斯坦经济政策的影响仍然相当明显。与其他大部分后苏联国家不同，哈萨克斯坦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能让外国投资者直接接触到关键“战略性”资源，而这些在其他国家往往是留给本国的金融寡头（乌克兰、俄罗斯）或者国有企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经济改革的关联性如何？第一印象是哈萨克斯坦相比于其他后苏联国家，的确为发展市场制度实施了一系列较为连贯的政策。哈萨克斯坦现在成为独联体中进行自由改革国家的“典型”（和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一样），特别是在其公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比21世纪头十年中期俄罗斯开始实施重新国有化时所占的比例还要小之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改革经常被俄罗斯援引作为其讨论经济政策走势时的楷模。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独特的担保，比如，引入生产分享协议（这在后苏联地区是首创）。和俄罗斯不同，哈萨克斯坦通常把外国投资者看作是优先群体，他们往往可以接触到那些较具吸引力的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哈萨克斯坦的外来投资受到复杂的国家法案的约束——《外国投资法案》（1994年）、《政府支持直接投资法案》（1997年）、《投资基金法案》（1997年），还有一些总统令等。根据这些法案，外国投资者所享有的待遇不比国内投资者差；政府对经济关键部门没有投资限制；一旦国

① Akhmetova, G. (2002): Korruptsiya v Neftedobyvaiushikh Stranakh. Almaty, Kulzhahan

家立法的调整会妨碍外国投资者，原有立法在外国投资完毕后的十年内继续有效。哈萨克斯坦还向外来投资者提供海关特权、政府津贴以及一些税收减免。

哈萨克斯坦曾实施过一项成功的银行改革，包括将银行整体结构私有化（发展银行除外），这里甚至包括国家储备银行，银行系统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银行数量的大幅减少（从1993年到2002年减少到四分之一，也是在这个时期，哈萨克斯坦较早地为外来投资者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IFRS/IAS）、存款保险系统（1999年）以及开放的金融服务市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环境最大限度的发展，而这个具有竞争力的环境必须对垄断和市场份额做出清晰的分割。自1998年以来，能源市场主要是基于私有企业，大部分是私有输送网络和公共长距离网络（哈萨克斯坦电缆运营公司，KEGOC）。哈萨克斯坦的养老金系统不是基于重新分配原则，而是基于积累原则。住房和交通服务已经私有化。

哈萨克斯坦在自由改革中的成功已经为国际组织和评级机构所认可：2002年，哈萨克斯坦获得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Moody's）的投资评级，这在独联体国家中是第一个。之后在2004年，该国又得到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Fitch）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2000年10月，欧盟调高了哈萨克斯坦的市场经济地位。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对改革的明显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外国经理和专家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尽管有时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行为规范通常是作为公司政策一部分），实施（或支持）与他们在母国相一致的、较好的操作规则。从这点来看，持续的自由化和更多的跨国公司存在将不断互为强化。不过，在经济中掌握高度控制权的外国公司倾向于向官僚提供相当一部分非正式支出<sup>①</sup>。此类作法在哈萨克斯坦已有出现<sup>②</sup>。如果把哈萨克斯坦直到21世纪早期都一直进行的去集中化过程也考虑在内的话，事情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一过程让当时针对外来投资者的区域法规和区域保护变得更为重要<sup>③</sup>。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似乎相对接近于制度竞争中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通过限制自己对于寻租的胃口来支持来自海外资本的流入，并实施全面的经济改革来提高经济制度的质量。

### （三） 21世纪头十年：政治偏见逻辑

21世纪头十年的哈萨克斯坦见证了外部环境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巨大转变。政权

---

① Hellman, J.S., Jones, G., and D. Kaufmann D. (2000): Are Foreign Investors and Multinationals Engaging in Corrupt Practic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ransition, May-June-July

② Olcott, M.B. (2002): Kazakhstan: Unfulfilled Promise.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③ Jones Luong, P. (2004):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in Kazakhsta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Jones Luong, P.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的稳固和日渐明朗的国际合法地位似乎让国内精英们逐渐淡忘了政治生存这个问题（至少支持国外直接投资已经不可能再为这一论断提供多少支撑）。另一方面，商品市场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为那些控制碳氢化合物和金属的人创造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尽管跨国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接触到了关键资源，政府还是建立了一张由私人企业、公共企业和半私有企业构成的特权网。在上世纪90年代晚期到2000年之后，这张网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一开始通过创立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KazMunaiGaz）来控制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中的股份；接着通过建立哈萨克哈萨克凤凰国家控股公司（Samruk holding），囊括了所有国有企业的战略资源；最后，哈萨克凤凰国有控股企业和财富国有投资基金（Kazyna）合并。在上世纪90年代，观察家发现哈萨克斯坦由国内投资不断累积起的金融资源淡化了对于外来资本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偏见与政治生存逻辑相比似乎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并且大环境对外来投资者可能将变得更为险恶。

事实上，经验主义的观察和之前的预期一脉相承。2002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宣布了修改管理外来投资者地位的现行合同的意图。2003年，有关田吉兹雪佛龙石油合资公司（Tengizchevronoil）支出产生的冲突由总统解决，这也预示着政府干预的加强。2004年，如果当时的业主出售石油开采项目，那么政府具有购买项目股份的优先权。此外，政府对外来投资者在部分产业里的股份限额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尤其在电信业）。2005年，为了控制控股公司，这项规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最后在2007年，哈萨克斯坦国会宣布，如果外来投资者的行为极大影响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利益并且威胁到国家安全，那么政府可以修改合同的某些条款。2008年2月，政府中止了和生产分享协议相关的一系列商务谈判。当然，仅从这一点就认为哈萨克斯坦的保护主义达到了俄罗斯或委内瑞拉的程度，着实有些牵强：举例来说，2008年哈萨克斯坦的外来投资者（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相比）还通过该国的石油出口税新规则获得了额外的获利。

政府-企业关系最明显的事件是2007年的卡沙甘（Kashagan）油田冲突。卡沙甘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之一，该油田过去由Agip KCO国际财团（吉普-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石油作业公司）开发。1998年，哈萨克斯坦政府把股份出售给日本国际石油开采株式会社（Inpex Nord）和美国菲利普斯石油公司（Phillips Petroleum），然后在2005年又以极高的代价加入Agip KCO财团。在新一轮试运转被推迟后，哈政府要求在相关项目中提高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占的股份。当局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包括根据海关、消防和环境条例提出指控，甚至还修订现行立法。2008年1月，Agip KCO国际财团的合伙人（埃尼集团，Eni）、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壳牌石油公司（Shell）以及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e）

不得不同意根据哈政府的要求，将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份从8.3%提高到16.8%。2008年6月，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从印度尼西亚的中亚石油有限公司（Central Asia Petroleum）购买了哈萨克斯坦石油联盟（Mangistaumunaigaz）51%的股份。哈萨克斯坦石油联盟在巴夫洛达拥有哈萨克斯坦最先进的石油加工工厂，在格里尤斯拥有第一流的加油系统，这样，政府通过收购掌握了对国内石油价格的控制。然而，卡沙甘油田并不是政府扩张干预的唯一事件。卡拉恰干那克石油运营公司财团（Karachaganak Petroleum Operating consortium）曾经因违反关税和环境条例被起诉。2007年，大约有100项和外来投资者签订的合同被取消。不过，公共部门的扩张不仅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还深入到电力和矿业部门。2007年，哈政府就利用煤炭开采资源攻击美国AES能源公司（如果反垄断指控成立，那么美国AES公司仅赔偿费就相当于该集团在哈萨克斯坦超过10年的投资额）。2008年6月，部分实行重新国有化的有色金融集团——哈萨克斯坦铜业公司（Kazakhmys）成立（政府用欧亚天然资源公司7.7%的股份交换该公司15%的股份）。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未能出现改善，这点已经引起许多国际组织的注意。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营商环境报告：哈萨克斯坦概览》，该国过去三年的投资保护指数为5.7（从1到10，分数越高，投资保护越高）。不过，该国的排名在一年中从49位跌到53位。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指数是7.7（第11位），俄罗斯的指数是5.0（第88位）。

总的来说，到2000年以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偏见结果似乎主宰了政治生存结果。不过，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战略的转换至少部分与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战略有内在关联。当然，世界市场的良性发展必然会确保了特权公司的收入，同时也超出政府的控制范围。不过，资本流入的后果之一就是政治生存效果重要性的减弱。通过间接地改善经济现状以及直接参与腐败网络和促进国际合法地位的形成，哈萨克斯坦在投资跨国公司的同时也支持和壮大现存政权<sup>①</sup>。在商品高价格时代，即使是面临巨大的没收威胁，投资依然有利可图。因此，工商界不会因为没收而去“惩罚”政府。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政治权力日益扩大，政治精英们会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追加投资的冲动。由此，政治生存逻辑似乎为政治偏见让出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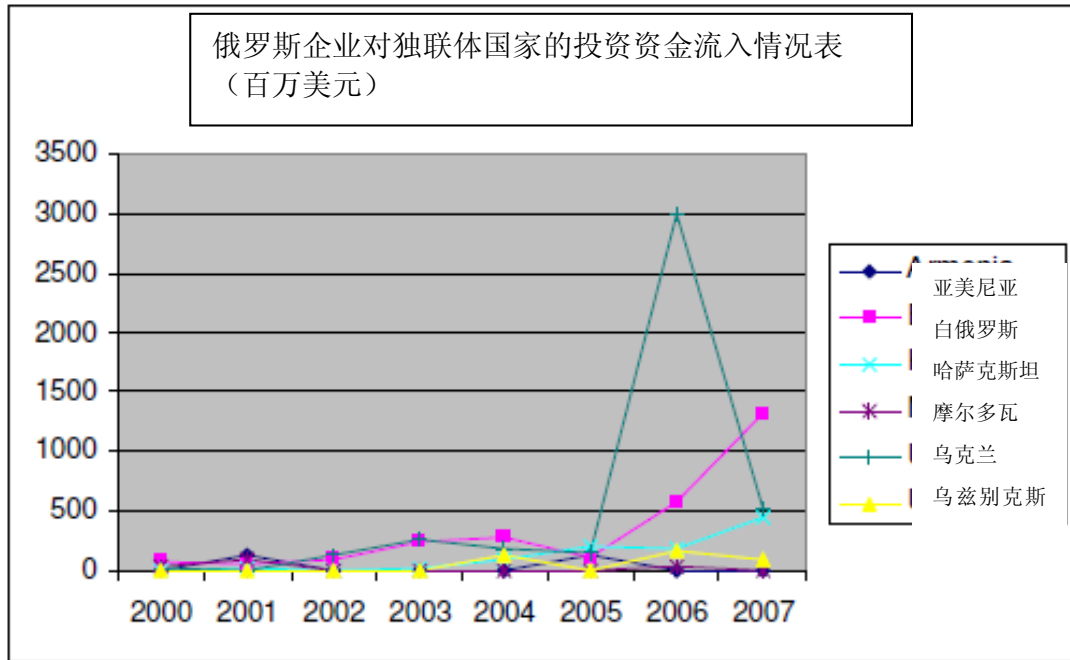
#### 四、全球与区域制度竞争：战略选择和动机

---

<sup>①</sup> Bayulgen,O.(2005):Foreign Capital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Curse or Blessing?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政治偏见与政治生存逻辑的竞争，似乎至少部分解释了哈萨克斯坦走向制度竞争的战略演进过程，另一个重要方面改变制度竞争的范畴对现存战略选择（通过超规则）和代理动机都有显著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都会出现：在全球层面，主要竞争者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者的样本包括很多类型的国家（尽管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参考国家集团”最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在区域层面，这意味着对于源自后苏联时代的流动资源的争夺（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交易）。当然还有一个介于全球和区域间的中间层面的竞争：比如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争取第三方投资而展开的竞争，不过，这种竞争往往锁定在后苏联地区内（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优势所决定）。

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在后苏联地区总是区域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之一（至少，从言辞方面看是这样的）。不过，上世纪90年代在区域一体化对话中的积极参与，实际上并没有导致俄罗斯跨国公司进驻该国的数量的明显增加。事实上，与乌克兰（该国对区域一体化持极度怀疑态度）甚至一些小国家比如亚美尼亚或者摩尔多瓦相比，哈萨克斯坦在吸引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时表现要差得多（见图4）。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单边开放自然而然地将新近成立的俄罗斯公司置于不利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公司在加入能源开采财团和大规模私有化进程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公司在本国往往有“双胞胎”。由于俄罗斯国内有大量有待出售的公司，但金融资源有限，所以哈萨克斯坦的资源对于新兴俄罗斯企业集团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不过，在2005年前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苏联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在区域层面变得更为激烈。首先，俄罗斯的公司成熟起来了，因此更有能力在国际层面竞争。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投资潜力大幅缩水。在这个时刻，区域间的很多国家都进入到高速发展期，产生了大量值得竞争的资本流。这场竞赛有很多方面，当然也预示着对制度质量带来的不同结果。



资料来源：俄罗斯投资，2008年

图4 俄罗斯企业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资金流如情况表 (百万美元)

一方面，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竞争，部分是来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竞争，因为哈萨克斯坦试图改善制度质量，以增强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阿拉木图区域金融中心（RCFA-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Almaty）的成立就是一项很明显的尝试，中心提供很多优惠条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资本。另一个由政治经济理论作出预言的竞争领域是对流动劳动力的竞争。众所周知，俄罗斯一直都吸引着中亚国家的移民劳动力。不过，哈萨克斯坦最近对移民劳动力更具有吸引力。哈萨克斯坦的移民主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这些移民出现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乌兹别克斯坦有相对大量的哈萨克少数民族。在哈萨克斯坦南部（这似乎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移民区域），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力移民数量在20万到100万人之间浮动。不过，任何数据都有可能被极度夸大，因此参考时要格外谨慎。不断改善的经济条件和较少的恐外情结（这在现代俄罗斯非常普遍）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

然而，一旦俄罗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介入，制度竞争的结果似乎就会有很大不同。的确，2000年以来，俄罗斯企业实力的加强使其得以实施海外扩张。不过，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企业借助于较强的政府规则和对知名跨国公司相对不太友好的态度，得以“抓住时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Russian LUKoil）

和加拿大资本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PetroKazakhstan）在特盖石油合资公司（Turgai Petroleum joint venture）问题上发生的争端。政府在这项争端中积极介入，尽管不是完全支持卢克，但在大部分问题都反对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俄罗斯公司就利用外来投资者和政府间的矛盾不断在哈萨克斯坦扩张。此外，俄罗斯企业还证明了他们很有能力从“污水”<sup>①</sup>中获得成功。事实上，俄罗斯企业的“成功”阶段相对较短并且没什么效果；举例来说，2007年，在俄罗斯的阿卡斯工业集团（Access Industries）同样成为拥有煤炭资源开采权、但受到哈政府压力的公司之一。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俄罗斯企业愿意并且能够在较不透明、较恶劣环境下运作的事实，使由“政治生存”到“政治偏见”战略过渡更有可能！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后苏联时代的制度竞争因为存在对坏制度的需求而受到拖累<sup>②</sup>。不过，制度竞争的区域层面似乎在代理人竞争和竞争工具方面都非常具体。我们应该意识到，尽管哈萨克斯坦为了进一步吸引资本和独联体劳动力，而进行了很多有目的性的尝试，其主要竞争者——俄罗斯——似乎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战略。不仅如此，哈萨克斯坦似乎还从那些从俄罗斯逃逸出来的资本中获利，这些逃逸资本是因为以前的“寡头”决定关闭在俄罗斯的生意：例如在2005年，米尔豪斯资本投资公司（Millhouse capital）就曾宣布其将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增加投资力度的计划。如果与哈萨克斯坦正面竞争，俄罗斯总是采用非常具体的竞争工具，远非政治经济模式所预言的那种方法。在中间层面的竞争有个很具体的例子：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对汉莎航空货运公司（Lufthansa Cargo）设立主要中转机场的争夺。尽管有较为扎实的区域一体化框架和良好的政治规则，俄罗斯还是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强迫汉莎航空公司将中转基地从阿斯塔纳搬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主要是以撤销汉莎航空公司跨西伯利亚航线的许可证相威胁）。很明显，俄罗斯在制度竞争中的立场受到一种“加州效应”的驱动：既然后苏联国家在经济潜力方面很不对称，俄罗斯在“追赶”独联体其他潜在竞争对手时，感受到的压力相对有限。因此，当制度竞争转换到区域层面，改善制度的动力也减弱了，这不仅是因为来自需求方的要求较少，而且还因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没有真正想去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者是通过非市场的保护主义干涉来达到提高地位的目的）。在全球层面，情况明显不同。尽管如此，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还是可能对后苏联世界的制度竞争区域层面带来十分剧烈的调整。

---

① 另一个例子就是最近“透明国际”的研究（2008年），这一组织将俄罗斯企业列在最有可能对当地政府实施贿赂的名单之列。

② Libman,A.(2008):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MPRA Working Paper No.10936

## 五、结 论

制度竞争观点——对更为引人注目的地缘经济竞争观点的补充，对后苏联地区经济政策的发展，必然能够提供一些额外的思考视角。基本上，本文论述了制度竞争对于经济状况的质量有两种渠道的影响。

首先，制度竞争主要依靠内部决策规则，这可以简化为“政治偏见”与“政治生存”间的平衡。我们已经论证过，起初的国际合法性缺失和经济危机创造了一种强大的政治生存效果，这促成了经济制度的改善和改革的进程。然而，在大量海外资本流入的制度竞争环境中，这种平衡表现出无法自我维系的态势；事实上，同样的全球制度竞争也催生了改善制度的动力，它和全球商品市场发生的变化一起，侵蚀着哈萨克斯坦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石，并导致了更强大的政治偏见效果。因此，制度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短期正面效果，会与长期赤字催生的更大的寻租机会相抵消。有一点值得注意，问题不仅在于沉入成本方面的道德危险：即由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而带来的全方位的外向性，而不是在投资者失去流动性后剥夺投资者的能力，后者驱使了政府行为的改变。

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制度竞争不同层面的互动。以前的研究成果往往将注意力限制在单一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市场”，假定了市场的同质性。但是在流动成本非零和、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制度在不同区域市场会有不同的特性。这个结论似乎微不足道，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同一个国家可以“游走于”不同的市场之间，这样就可以利用特定的制度套利机会。本文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从全球市场到区域市场的内生性制度转变提供任何清晰的证据，但是，哈萨克斯坦对于俄罗斯投资者的态度转变至少代表其在不同市场中转移注意力的尝试。有关这种转变、其内在和外在因素、“地缘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传统政治竞争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唐闻佳 译，译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兴明 校）

---

**【Abstract】** The paper approaches the problem of differentiation of strategies implemented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by looking at the experience of Kazakhstan. It basically focuses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litical bias and political survival effects as driving forces fo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m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Kazakhstan demonstrates how the shift of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se two aspect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country's position in competing for FDI. Moreover, the paper looks a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Key Words】** Post-Soviet Countries, Glob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Kazakhsta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страны, глобально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Казахстан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能源经济

## 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 ——价格分析的角度\*

刘 旭\*\*

**【内容提要】**近年，俄罗斯主要通过4条途径向东亚国家输送原油。由于这4条途径的油源地及输送方式不同，因此最终的交易价格也不相同。笔者选取2条途径——用铁路通过满洲里向中国输油和用油轮从萨哈林岛向日本和韩国输油——的贸易价格与俄罗斯对欧洲的离岸价格及中东原油对东亚国家的到岸价格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俄罗斯原油在东亚石油市场的价格现状。本文还对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出口原油的价格作出预测，指出它的价格将高于目前中俄铁路原油贸易价格和同品质的中东原油价格。

**【关键词】**俄罗斯 东亚地区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 原油价格 科兹米诺

**【中图分类号】**F746.2/.9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1-0063-(11)

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石油合作很多年来一直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国内外的很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分析。这些研究中，很多都是从“战略”的高度着眼，更注重国家层面的宏观分析。本文试图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层面，从原油出口价格的视角，对俄罗斯对欧洲和对东亚国家的原油出口价格、俄罗斯原油和中东原油在东亚国家的到岸价格进行比较分析，根据东亚国家进口俄罗斯原油的价格现状对未来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

\* 本文系笔者在首届斯拉夫与欧亚研究东亚会议（First East Asian Conference for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Sapporo, 5-6 February 2009）上所作发言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石油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04）的阶段性成果。

\*\* 刘旭，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管道的出口原油价格作出预测，并提出政策建议。

## 俄罗斯对东亚国家的原油出口

近年来，俄罗斯主要通过以下 4 个途径向东亚国家出口原油：（1）用铁路通过满洲里向中国出口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原油；（2）通过海路主要向日本和韩国出口萨哈林原油；（3）通过中哈原油管道向中国出口西西伯利亚原油；（4）通过海路从欧洲市场向中国出口乌拉尔原油。<sup>①</sup>

表 1 俄罗斯与东亚国家原油贸易量（单位：百万吨）

	原油品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俄罗斯原油出口总量 <sup>(1)</sup>		260	253	248	259	243
中国进口量 <sup>(2)</sup>		10.8	12.8	16.0	14.5	11.6
	通过满洲里 <sup>(3)</sup> 西西伯利亚 东西伯利亚	3.1	5.2	8.9	8.9	8.9
	过境蒙古 <sup>(3)</sup> 西西伯利亚	3.0	2.8	1.4	0.1	-
	海上进口 乌拉尔 <sup>(2)</sup>	4.7	4.8	5.7	5.5	1.7
	中哈管道 <sup>(4)</sup> 西西伯利亚	-	-	-	-	1.0
日本进口量 <sup>(5)</sup>	索科尔、维泰兹	1.5	1.5	1.4	5.7	4.7
韩国进口量 <sup>(6)</sup>	索科尔、维泰兹	1.1	1.0	1.7	4.9	3.1

资料来源：（1）俄罗斯联邦海关 [<http://www.customs.ru>]；（2）中国海关 [<http://www.customs.gov.cn>]；（3）东西伯利亚铁路公司 [<http://vszd.rzd.ru>]；（4）*Nefte Compass* 2008 年各周版；（5）日本海关 [<http://www.customs.go.jp>]；（6）韩国国际贸易协会 [<http://global.kita.net>]。

从表 1 可以看出，俄罗斯向东亚国家输送的原油大部分被出口到中国，这是中国在充分利用与俄罗斯接壤的优势从陆路进口原油的同时还大量在欧洲市场采购俄罗斯原油的结果。通过满洲里的铁路进口原油是根据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石油在 2004 年签署的为期 5 年的长期供应协议实现的。海上进口主要是根据中石化和欧洲

① 截至 2007 年，俄罗斯还通过铁路过境蒙古向中国出口西西伯利亚原油。但是由于运输成本过高，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决定停止利用这一途径出口原油（*РБК Daily*, 28 марта 2007; *Коммерсант*, 03 июля 2007）。

② 指从波罗的海及黑海港口出口的俄罗斯的代表性原油——乌拉尔混合原油（Urals Blend），而非乌拉尔-伏尔加油田地区出产的原油。

石油贸易商Mercuria之间的供应协议进行的<sup>①</sup>。通过中哈管道进口俄原油是从2008年1月开始的，主要按照TNK-BP、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Газпром Нефть）和中石油之间的协议来完成。日本和韩国经海路进口俄罗斯原油，这些原油主要是由萨哈林—1和萨哈林—2生产的。

在这4条路径中，不论从贸易数量、运输方式，还是从交易价格和交易方式来看，通过满洲里的铁路原油贸易和海上萨哈林原油贸易都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这两个贸易途径作为案例来分析俄罗斯原油在东亚石油市场上的价格现状。

### 通过满洲里的铁路原油贸易

如上所述，这条途径的原油贸易主要是根据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之间在2004年签署的供油协议来进行的。从表1可以看出，依赖这条途径的原油贸易量约占俄罗斯对东亚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根据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协议，这条途径的原油价格是一种公式价格。它与欧洲北海原油市场的布伦特原油的月平均现货价格挂钩，在此基础上加上一个固定调整值<sup>②</sup>。但是，自2007年以来，俄罗斯石油公司对此价格公式日益不满，多次要求调高出口价格。两公司最终于2007年11月达成协议，决定将固定调整值上调0.675。图1显示了2007年以来俄罗斯经铁路出口中国的原油与出口欧洲的价格差<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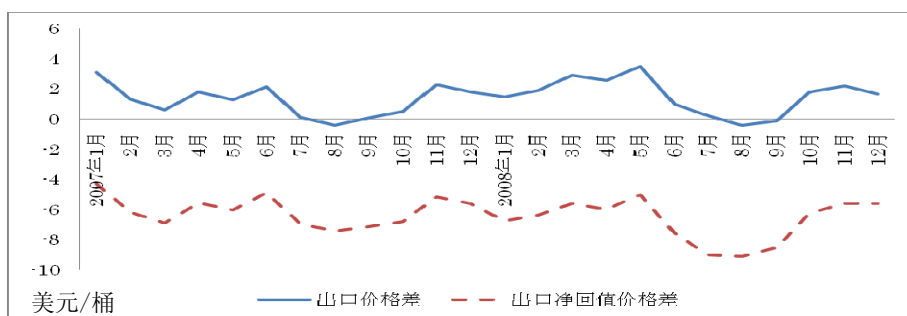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原油出口中国（铁路）与出口欧洲的价格差

① 两公司在2004年签订了为期1年的长期原油供应协议。Mercuria从当年6月开始向中石化供油。这一协议虽然在随后的3年中得到延长。但是在2008年两公司没有能达成续约协议，这是2008年从海上进口俄罗斯原油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Reuters, 24 January 2008 and 20 May 2008)。据报道，来自欧洲市场的一部分乌拉尔原油被用作国家战略储备基地用油(《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11日)。

②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按照2004年的协议，这个调整值为-3 (Interfax, 16 January 2008; Ведомости, 29 января 2008)。

③ 详细计算方法参照文后附注。这里，出口价格是指在出口地点的交易价格，即船上交货(FOB)价格。选取普里莫尔斯克港(Приморск)的出口价格作为出口欧洲的价格。

图 1 中实线为出口价格的差值。可以看出，俄罗斯原油出口中国的月平均价格基本上高于出口欧洲的价格。但是，从出口净回值价格的差值（虚线）则可以看出，俄罗斯原油出口中国的利润远低于出口欧洲的利润<sup>①</sup>。在 2008 年 8 月，这一差值达到每桶 9.13 美元。出口中国与出口欧洲的巨大利润差别使俄罗斯倾向于增加对欧出口，减少对华出口<sup>②</sup>。在近期的关于中俄原油管道和 2010 年以后原油长期供应协议的谈判中，俄罗斯石油公司要求中石油大幅提高购买价格。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中石油很难接受俄公司的这一要求。图 2 显示了俄罗斯原油（铁路进口）与沙特原油（油轮进口）在大连的到岸价格（C&F）的差值。<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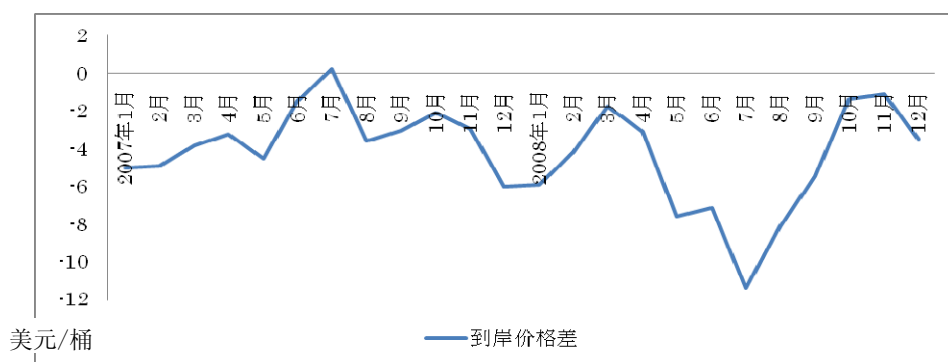


图 2 俄罗斯原油与沙特原油的到岸价格差

从图 2 可以看出，俄罗斯原油通过铁路与管道混送到大连的价格一般要低于中东原油的到岸价格。这个差值在 2008 年 7 月达到最大，为 11.41 美元/桶。这说明中石油通过进口俄罗斯原油节省了许多购买成本，也说明，理论上中石油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提价要求还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然而实际上，中石油很难接受提价。这是因为（1）任何公司都不想主动增加购买成本；（2）大连炼油厂的进口原油大部分是比沙特超轻质原油质量差的中东原油，这些原油的价格比沙特超轻质原油还要低；（3）随着大连炼油厂对加工设备改造的完成，中石油更倾向于多进口质量较差、价

① 净回值价格（Netback Price）在这里指从出口价格中扣除运费后的价格。运费在这里指从原油产地到出口地点的运输费用。净回值价格的巨大差值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运费（管道与铁路混合）要大大高于对欧洲的运费（管道）。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包括运费在内的俄罗斯原油的出口费用和管道政策将另撰稿详细论述。

② 这也表现为俄罗斯几大石油公司中只有俄罗斯石油公司利用这条线路对中国出口原油。然而这一现象在 2008 年 10 月后得到改观。根据 *Nefte Compass* 发布的数据，从 2008 年 10 月开始，苏尔古特石油公司开始利用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和铁路向中国出口东西伯利亚的塔拉干原油。

③ 详细计算方法参照文后附注。这里选用沙特超轻质油（Arab Extra Light）来代表沙特原油。其理由是（1）沙特超轻质油与俄罗斯原油都是大连炼油厂的原料用油；（2）两种原油的性状（API 度与含硫量）相近，可以互为替代（严格地说，沙特超轻的含硫量要更大一些）。

格更低的高硫原油以减少成本。

俄罗斯石油公司提出的要求，是中国公司未来通过中俄管道进口俄罗斯原油的价格要与科兹米诺湾（Козьмино）的原油出口价格相同<sup>①</sup>。下文谨对科兹米诺湾的原油出口价格作预测性分析。

## 科兹米诺湾的原油出口价格

科兹米诺湾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终点和原油输出港。现在，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正在主持科兹米诺湾的原油输出港建设，并计划于 2010 年完成。届时，来自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原油将在斯科沃罗季诺转卸至铁路油罐车，运抵科兹米诺湾后再向亚太国家出口。科兹米诺湾的原油将会以怎样的价格出口呢？原油性状是决定原油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先对科兹米诺出口原油的组成与性状作简要分析。

表 2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原油组成 （单位：百万吨）

油田	2010 年		2016 年	
东西伯利亚油田	6.0	20%	39.8	50%
万科尔油田	-	-	21.5	27%
尤鲁布奇诺-托霍姆斯克油田	-	-	2.3	2%
塔拉干油田	4.0	13%	6.0	8%
上琼斯油田	2.0	7%	10.0	13%
西西伯利亚油田	24.0	80%	40.2	50%
合计	30.0	100%	80.0	100%

资料来源：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 [http://www.transneft.ru]；俄罗斯石油公司 [http://www.rosneft.ru]；TNK-BP 石油公司 [http://www.tnk-bp.ru]；苏尔古特石油公司 [http://www.surgutneftegas.ru]。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输送的原油，即科兹米诺湾的出口原油，是东西伯利亚原油与西西伯利亚原油的混合<sup>②</sup>。在 2010 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第 1 阶段正式启用之后，管道原油的主要成分是西西伯利亚原油<sup>③</sup>。到 2016

① Argus FSU Energy, 31 October 2008.

② 俄罗斯及其他国外媒体称之为 ESPO Blend 或 ESPL Blend（Коммерсант, 27 июля 2007; Platts Oilgram News, 30 July 2007）。

③ 根据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计划，万科尔油田将于 2010 年开始生产，但是产出原油的大部分将向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输送。2008 年 7 月，俄罗斯石油公司与 TNK-BP 石油公司签署原油交换协议。该协议规定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 TNK-BP 石油公司向安加尔斯克炼厂及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每年供应 1300 万吨其在西西伯利亚生产的萨默特罗尔原油，而俄罗斯石油公司向 TNK-BP 的梁赞炼油厂供应相同数量的万科尔原油（Russia & CIS Oil and Gas Weekly, 16 July 08）。

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第 2 阶段建成并启用后，东西伯利亚原油的比率将上升至 50%。

表 3 俄罗斯主要原油种类的性状

原油种类	出口地点	密度 (API 度)	含硫量 (%)
乌拉尔混合	普里莫尔斯克、新罗西斯克、友谊管道	31.8	1.35
西伯利亚轻质	图阿普谢	35.1	0.57
索科尔	迪卡斯特里	37.9	0.23
维泰兹	维泰兹、普里格罗德诺耶	33.6	0.24
对中国铁路出口	外贝加尔斯克	36.5	0.57 - 1
东西伯利亚原油			
万科尔	?	31	0.16
尤鲁布奇诺-托霍姆斯克	中俄边境、科兹米诺	42~45	0.2~0.3
塔拉干、恰扬塔、上琼斯	中俄边境、科兹米诺	37~45	0.1~0.3

资料来源：The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Market Handbook 2008；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http://eneken.ieej.or.jp]；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http://www.cnpc.com.cn]。

从表 3 可以看出，东西伯利亚的原油质量要比西西伯利亚原油及乌拉尔混合原油高，比较接近萨哈林原油。因此，考虑到未来东亚原油市场的供需状况，理论上科兹米诺湾出口原油的价格将会接近于萨哈林原油价格。以下利用萨哈林原油的交易价格来推测未来科兹米诺湾出口原油的价格。

### 萨哈林原油的出口价格

萨哈林原油主要产自萨哈林-1 和萨哈林-2。其中萨哈林-1 出产的原油，即索科尔原油 (Sokol)，于 2006 年 10 月开始出口；萨哈林-2 出产的原油，即维泰兹原油 (Vityaz)，于 1999 年开始生产并出口。萨哈林原油的主要出口方向是日本和韩国。根据萨哈林州海关的数据，2008 年共出口原油 1080 万吨，其中出口韩国占 54.6%，出口日本占 42.4%<sup>①</sup>。然而，萨哈林原油由于其质量较好，出口价格也相对较高。图 3 显示了萨哈林原油出口日韩的到岸价格与中东原油的到岸价格的差值<sup>②</sup>。

① 其余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泰国和新加坡。

② 详细计算方法参照文后附注。这里选用阿联酋穆班原油 (Murban) 代表中东原油；选用索科尔原油代表萨哈林原油。这是因为：(1) 索科尔原油在萨哈林出口原油中占据很大比例 (2008 年约为 88%)；(2) 穆班原油与索科尔原油性状相似，在原油市场上被视为可互相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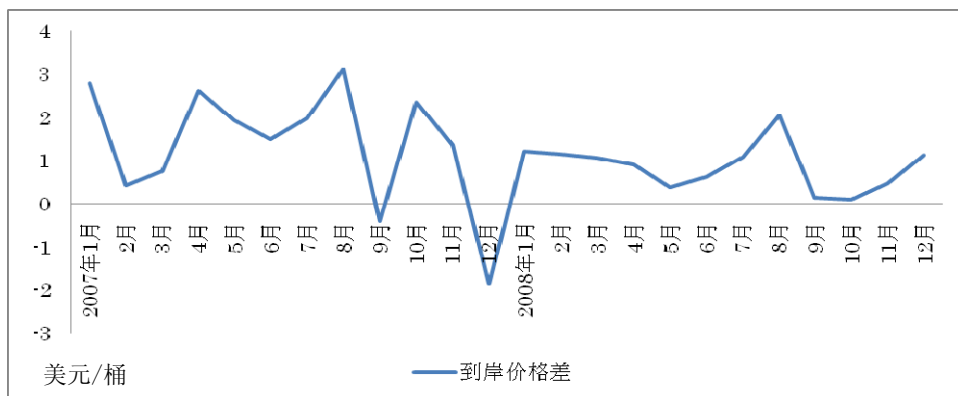


图3 萨哈林原油（索科尔）与中东原油（穆班）的到岸价格差

从图3可以看出，索科尔原油的到岸价格要高于中东穆班原油的到岸价格。这一差值最大达到约3美元/桶。由于穆班原油与沙特超轻质油的价格相似，参考图2可以得知索科尔原油的出口价格要高出通过铁路对中国出口的俄罗斯原油价格很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炼油厂没有大规模地进口具有地理优势的萨哈林原油。相反，为什么日韩会大规模地进口萨哈林原油呢？日韩的炼油厂从技术角度来说，具有相当高的加工高硫原油的能力。他们也倾向于购买低价格的中东高硫原油。但是，对他们来说，相比中东原油，萨哈林原油具有如下优势：

- 地理优势。中东原油运到东亚地区一般需要20天左右，而萨哈林原油运到日韩炼油厂只需要3天或4天。
- 安全供应的优势。中东原油运往东亚地区需要经过繁忙的马六甲海峡，出现事故而造成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大，还有遭遇海盗袭击的危险。萨哈林原油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 应对短期供应的优势。日韩炼油厂一般通过长期购买协议采购中东原油。

进口萨哈林原油可以弥补中东原油应对短期生产调整方面的不足。

由此可见，日韩积极进口萨哈林原油既有原油供应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有经济上应对短期市场需求变化的考虑<sup>①</sup>。由于从萨哈林进口原油的数量在日韩进口原油总量中的比重很小（2008年日本为2.3%，韩国为2.7%），购买价格相对高的萨哈林原

<sup>①</sup> 还有一个可以看似解释日本炼油厂进口萨哈林原油的原因的是，萨哈林-1和萨哈林-2项目里有大量的日本企业参与其中，他们只是取回自己的份额油。然而实际上，参与萨哈林原油生产的日本企业主要是贸易公司，他们本身不拥有炼厂，而是按照市场价格向本国炼厂供应原油。参与萨哈林-1项目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虽然向其在日本的下属炼厂供应原油，但是从日本财务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与商务部）的贸易统计数据来看，他的下属炼厂并没有享受到所谓“内供”价格或者“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e）的好处。他们之间的交易价格基本上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同。

油并不会使日韩的石油公司的采购成本大幅增加。但是，如果从科兹米诺湾出口的俄罗斯原油像萨哈林原油一样处在比中东原油高的价位上，日韩还会积极购买吗？从 2016 年起，从科兹米诺湾出口的俄罗斯原油按计划将达到 5000 万吨/年，日韩的石油公司需要仔细考虑其购买战略，即是更多购买价格相对较低但有供应中断危险的中东原油，还是更多购买价格相对较高但却有安全供应保障的俄罗斯原油<sup>①</sup>。同时，这也取决于日韩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其能源战略。

##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从价格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原油在东亚石油市场的现状。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出口的原油价格，有很大可能要高于目前中俄间的铁路原油贸易价格，也要高于同品质中东原油的到岸价格。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东亚国家在考虑扩大进口俄罗斯原油时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因素。就中国企业来说，中石油倾向于利用中俄管道进口俄罗斯原油以解决东北油田产能下降而造成的炼化设备闲置问题，这与中国政府分散原油进口渠道、强化原油安全供应的目标相一致。但是利用中俄管道进口原油，由于供应方只有俄罗斯一方，原油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方左右，这也是 2007 年以来中俄关于原油价格谈判所反映出的现实<sup>②</sup>。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即如要通过进口俄罗斯原油来强化能源的安全供应，就必须承担更多的经济成本<sup>③</sup>。这既是由运输方式（管道）、东亚石油市场的构成（即地区内主要的原油供应方只有俄罗斯一方）等经济因素决定的，也是由原油性状等物理因素决定的。

日韩两国及其他亚太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也面临与中国同样的问题。只不过由于他们只能从海上进口原油，因此他们必须也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科兹米诺湾的出口

---

① 在俄罗斯在科兹米诺湾附近建成大型炼化基地的条件下，原油出口量将降至 3000 万吨/年。另外，如果考虑一部分原油要被供应至在阿穆尔共青城和哈巴罗夫斯克的炼油厂，可供出口的原油量将进一步降低。

② 这里所说的“受俄方左右”不是指俄罗斯可以任意制定原油价格，而是指俄罗斯要求中国接受科兹米诺湾出口价格作为管道原油供应价格。俄罗斯也无法任意规定科兹米诺湾出口价格，但是它可以通过调节出口量来影响市场的价格决定。

③ 至截稿时传出报道，在北京举行的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三次会议上，中俄就管道建设、长期供应协议与长期贷款等问题签署最终协议。根据协议，中石油接受俄方提出的将科兹米诺湾出口价格作为管道原油供应价格的条件，而科兹米诺湾出口价格将以 Argus 和 Platts 发布的月平均价格为依据（《Ведомости》，18 февраля 2009；《Коммерсант》，18 февраля 2009；《РБК Daily》，18 февраля 2009；《第一财经日报》，2009 年 2 月 18 日；新华社，2009 年 2 月 18 日）。这表明中国政府与企业愿意承担更多的经济成本来实现中俄管道供油这一战略目标。

原油<sup>①</sup>。他们也必须考虑原油的安全供应与进口成本的平衡问题。俄罗斯要求中国为管道原油支付与科兹米诺湾出口价格相同的价格，意在使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竞争俄罗斯原油。然而在价格决定方面，这对中国是不利的。这是因为：（1）在中国只从管道进口而不在科兹米诺湾参与购买的情况下，原油价格将由俄罗斯与其他亚太国家的供求关系决定<sup>②</sup>；（2）中国利用管道进口大量原油将减少科兹米诺湾的出口量，如果日韩等亚太国家对俄罗斯原油表现出极大的购买兴趣，减少的供给将促使价格上升。总之，利用管道，中国保证了俄罗斯原油的进口量，但在交易价格上却不得受日韩等其他国家购买行为的影响。

对于如何降低俄罗斯原油的进口成本，有两个方法值得考虑。其一是促进开发俄罗斯上游资源的国际合作以获取更多的份额油，其二是促进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上、中、下游的产业一体化的合作。第二个方法在现行中国国内的能源价格控制政策下实现的难度会很大<sup>③</sup>。第一个方法却很具有现实意义。近年，中国、日本等国虽然在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上游勘探开采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并没有大的突破。对俄罗斯石油资源开发有极大兴趣的中国、日本等所谓互为竞争对手的亚太国家，应摒弃“争夺俄罗斯资源”的意识，联合起来组成国际财团（consortium）共同参与俄罗斯上游资源开发，以强化对俄的交涉力，降低各自承担的风险。同时，这些亚太国家还应联合起来向俄罗斯发出信号，促使其放弃依据地缘政治观点对亚太石油消费国家“分而治之”的策略，积极地吸引国际资本促进远东石油资源的开发。否则的话，对亚太石油消费国来说，远东的资源开发很有可能只是“空想的游戏”<sup>④</sup>，更谈不上降低这一地区的原油进口成本了。

\* \* \* \* \*

## 附：文中原油价格的计算方式

（1）图 1 的计算方式

出口价格差的计算公式为

---

① 有报道称，韩国国家石油公司正在与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协商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韩国支线（*РБК Daily*, 10 февраля 2009）。然而由于这条管道要经过北朝鲜，同时其经济可行性还未经过论证，因此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② 参照萨哈林原油价格的决定公式，科兹米诺湾出口价格很有可能是以亚太石油市场的某种原油价格（比如阿曼原油与迪拜原油的月平均价格）作为基准价，然后在此基准价上再加上调整值。文中的“由...供求关系决定”指的是这个调整值的决定。

③ 冯玉军：“权力交接后俄罗斯能源政策走向与中俄能源合作”，《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65 页。

④ 伊藤庄一：“ロシアにおける中国のエネルギー権益確保行動と我が国の対応—原油パイプライン・プロジェクト問題を中心に—（中国在俄罗斯获取能源权益的行动与我国的对策—以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建设问题为中心—）”，财团法人国際金融情報センター（财团法人国际金融信息中心）：《ロシア問題研究会（俄罗斯问题研究会）》，东京：日本财务省，2008 年 3 月。



出口价格差=中俄铁路原油价格—普里莫尔斯克港出口价格。其中，  
中俄铁路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价格—3（截至 2007 年 10 月）和  
中俄铁路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价格—2.325（自 2007 年 11 月）。

其中，普里莫尔斯克港出口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价格根据 *Platts Oilgram Price Report* 发表的周末价格计算平均值得出。由于不是每日价格的平均值，计算结果会与实际价格有误差。

出口净回值价格差的计算公式为

出口净回值价格差=中俄铁路净回值价格—普里莫尔斯克港出口净回值价格。其中，

中俄铁路净回值价格=中俄铁路原油价格—管道运费（自下瓦尔托夫斯克<sup>①</sup>至安加尔斯克）—铁路运费（自安加尔斯克至外贝加尔斯克）；

普里莫尔斯克港出口净回值价格=普里莫尔斯克港出口价格—管道运费（自下瓦尔托夫斯克至普里莫尔斯克港）。

其中，管道运费根据联邦税务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тарифам）公布的管道运费法令计算得出，同时参考 *Argus FSU Energy* 发布的数据。铁路运费根据联邦税务局公布的铁路运费法令计算得出。

以上价格单位均为美元/桶，同时 1 吨设定为 7.33 桶。

## （2）图 2 的计算公式

到岸价格差的计算公式为

到岸价格差=中俄铁路到岸价格—沙特超轻到岸价格。其中，

中俄铁路到岸价格=中俄铁路原油价格+铁路运费（自满洲里至大庆）+管道运费（自大庆至大连）；

沙特超轻到岸价格=沙特超轻原油价格+油轮运费（自拉斯塔努拉至日本千叶）。

其中，中俄铁路原油价格计算方法与图 1 相同；沙特超轻原油价格取自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发表的直接交易（Direct Deal）的官方结算价格（Official Selling Price）；铁路运费和管道运费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的运费法令计算得出；油轮运费（26 万吨 VLCC 级）根据 *OPEC 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 发布的运价指数（WS Rate）与国际运费率协会（Worldscale Association）发布的基准运价（WS 100 Rate）计算得出。

以上价格单位均为美元/桶，同时 1 吨设定为 7.33 桶。

---

<sup>①</sup> 下瓦尔托夫斯克（Нижневартовск）位于西西伯利亚油田中心地带，是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西西伯利亚管道的总枢纽。石油产业界经常以下瓦尔托夫斯克价格作为西西伯利亚原油的出口净回值价格。

(3) 图 3 的计算公式

到岸价格差的计算公式为

到岸价格差=索科尔到岸价格—穆班到岸价格。

其中，索科尔原油价格指印度国家石油公司（ONGC）、俄罗斯石油公司与日韩买主及国际石油交易商（比如 Vitol）之间的交易价格，根据路透社（reuters.com）、*Argus FSU Energy*、东京商品交易所发布的计算公式与数据计算得出。

穆班到岸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穆班到岸价格=穆班原油价格+油轮运费。

其中，穆班原油价格取自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公布的直接交易的官方结算价格（与东京商品交易所公布的价格相同）；油轮运费与图 2 相同。

以上价格单位均为美元/桶，同时 1 吨设定为 7.33 桶。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ssia mainly transports crude oil to East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four channels. The final transaction prices are not the same as a result of oil source regions and transportation means by these four different channels. Thus the author selects two ways---the trade price of transporting oil to China by railway through Manchuria and transporting oil to Japan and South Korea by oil ship from the Sakhalin Island – Russia’s FOB for Europe and CIF of Middle East’s crude oil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makes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se two ways, revealing the current price situation of Russian crude oil in the East Asia oil market. This article also predicts the prices of export crude oil through Eastern Siberia - Pacific Ocean pipeline and points out that its prices will exceed current Sino-Russian railway crude oil trade prices and those of the same qu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Russia, Eastern Asia Countries, Eastern Siberia - Pacific Ocean pipeline, Prices of Crude Oil

---

（责任编辑 常喆）

## 俄罗斯战略性主导产业增长方式： 能源工业的实证分析\*

戚文海\*\*

**【内容提要】**对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研究表明，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的能源工业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俄罗斯转轨危机中，能源工业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并率先走出经济危机。对经济转轨前俄罗斯能源工业的回顾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式开采是制约苏联油气开发后劲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客观的认识。本文从设计采收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论述了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进一步加强。深入分析了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的原因。本文指出，经济转轨中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整体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调整。

**【关键词】**俄罗斯 能源工业 经济转轨 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43/47.512.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1-0074-(13)

对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研究表明，能源工业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俄罗斯国内各界对经济转轨中能源工业也寄予厚望。特别是在俄罗斯转轨危机中，能源工业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并率先走出经济危机，对俄罗斯宏观经济从全面危机走向复苏，从复苏步入稳定发展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经济转轨新阶段，对能源工业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重要作用要给予客观辩证的分析，既要给能源工业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已经发挥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不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7 年规划基金课题（项目编号：07JA790018）、2009 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和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戚文海，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可夸大其作用，也要看到能源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化给整体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消极影响。探讨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的能源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对资源禀赋丰富的经济转轨国家具有一般意义。为此，本文从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化的加强、制约经济转轨中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自然条件以及转轨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展开深入论述。

## 一、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化的加强

### (一)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设计采收率呈下降态势

一般而言，石油储量的增长有两种方法，一是在新区加强勘探工作，寻找新储量；二是提高已开发油田的采收率，增加石油可采储量。鉴于俄罗斯的勘探工作量明显下降，近期内不能寄过高希望于新区，在老油区努力应用提高采收率技术，应该是增加可采储量的主要方法。但是，近 10 年来俄罗斯的设计采收率却呈下降态势，1965 年的采收率为 48%，2000 年下降到了 34%。详见表 1。

表 1 近 10 年俄罗斯的设计采收率

指标	10 年平均								
	I		II		III		IV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2
设计的采收率	0.5	0.47	0.45	0.44	0.42	0.41	0.39	0.37	0.36
采收率年均下降，%	5		3		3.5		3.5		
石油储量增长，百万吨	540	732	850	722	990	1168	930	216	260
10 年年平均增长，百万吨	751		115		1301		350		
石油产量，百万吨	166	265	377	470	550	561	450	302	380
10 年年平均产量，百万吨	269		471		520		377		

(二) 能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率先实现增长也是以高投入、低产出来实现的  
能源效率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进步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作用，技术进

步不但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也是提高能源生产和利用效率的主要力量。因为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能源的生产和使用状况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调整的步伐，高效率的能源生产和使用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质量。对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增长方式的研究表明，经济转轨以来能源生产的费用增长较大，其中电力工业 23.0%，石油开采业 5.4%，天然气工业 19.1%，煤炭工业 9.3%，高于工业整体费用的增幅 13.0%。<sup>①</sup>俄罗斯燃料动力综合体自身消费的燃料动力资源占总消费量的近 30%。<sup>②</sup>其中发电厂用电率加上网损率从 1991 年的 17.1% 上升到 1998 年的 23.1%。电价中的固定燃料成本近 10 年来上升了 11%；其中 1/4 是来自标准煤耗的上升，3/4 是来自燃料价格的上涨。<sup>③</sup>

俄罗斯能源利用效率中心主任伊格尔-巴什玛科夫认为，由于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俄罗斯可能会在 2010 年前停止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巴什玛科夫在“俄罗斯能源战略：燃料动力综合体能源储备”圆桌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还将发展石油天然气系统，那么我们可能会停止出口能源载体，因为它们将会被内部市场吸收。俄罗斯能源战略实施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缺乏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国家政策。没有国家的参与，市场不可能完全调节能源储备。”

表 2 1995-2002 年俄罗斯石油开采一些指标的变动情况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石油开采量/ 百万吨	306.8	301.2	305.7	303.3	305.2	323.5	348.1	379.6	421.3
平均每秒昼 夜量/吨	7.5	7.4	7.3	7.7	7.7	7.5	7.7	8.3	9.5
年均工业生 产人数/千人	213	246	264	289	261	267	347	331	---
固定资本折 旧率%	52.1	54.7	56.6	57.0	55.2	52.3	46.7	54.8	---
固定资本更 新系数	3.3	3.0	1.6	1.7	1.7	2.9	4.2	3.7	---
固定资本系 数	1.5	1.9	1.1	0.9	0.9	1.0	1.0	1.5	---

资料来源：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России 1990, №10.

- ① Ясин Е., Структурный маневр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8, 2003, С.22.  
 ② Воронин А., энерго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ак факто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экономист. 2004, №10  
 ③ 傅霞飞：“俄罗斯电力工业改革现状与问题”，载《国际电力》2001 年第 3 期，第 17 页。

### （三）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下降

经济转轨以来，能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下降。能源工业的亏损企业比重，电力工业从 1992 年的 6.6% 上升到 2001 年的 39.1%，石油开采业从 1992 年的 8.0% 上升到 2001 年的 21.1%，天然气工业从 1992 年的 17.9% 上升到 2001 年的 42.9%。<sup>①</sup>从能源工业在俄罗斯工业中的利润比重情况看，电力工业占 9.1%，燃料工业占 42.8%，石油开采业占 26.7%，石油加工业占 3.7%，天然气工业占 1.7%，煤炭工业占 0.4%；从赢利率比重情况看，电力工业占 4.4%，燃料工业占 15.0%，石油开采业占 20.1%，石油加工业占 13.5%，天然气工业占 3.2%，煤炭工业占 1.8%。而同期能源工业在俄罗斯工业中投资比重看，电力工业 9.3%，燃料工业 49.6%，石油开采业 32.8%，石油加工业 2.6%，天然气工业 10.1%，煤炭工业 2.1%。<sup>②</sup>电力工业全行业的利润率从 1993 年的 25.5% 将到了 1999 年的 1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计算显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的雇员——主要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雇员，从 1997 年到 2003 年增加了 80% 以上，同时劳动生产率却下降了 40%。在同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的劳动成本上升了 107%，而大多数私人石油企业的劳动成本仅增加了 25%。这表明，俄罗斯能源工业自身增长方式的粗放化与经济转轨的深化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的要求产生了矛盾。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化，必然对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的增长方式提出由粗放化向集约化转变的要求。

### （四）石油天然气在经济转轨中的俄罗斯能源生产结构中仍居于主导地位

能源与社会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主要体现在，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能源都是各个产业的投入要素，他们通过产品的投入产出而在产业间产生联动；另一种情况是围绕能源的开采、加工、运用而新产生的一些产业间直接通过能源加工产品而产生的产业关联。经济转轨以后石油天然气生产在俄罗斯初级能源生产中仍保持主导地位。1994 年油气占俄罗斯初级能源生产的比重高达 80.1%，尤为突出的是天然气在俄初级能源生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升幅较大，与经济转轨前的 1991 年相比，截至 1996 年其比重分别上升：7.4%、9%、11.2%、11.6%、12.6%，而同期除电力外初级能源生产中的煤炭、油页岩、薪材、泥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 GDP 的能耗在经济转轨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每千卢布 GDP 能耗由 1991 年的 1.99 吨标准燃料增至 1996 年的 2.37 吨。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构

---

① Ясин Е., Структурный маневр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8, 2003, С.8.

② Плышевский Б., 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Экономист, 2004№10, С.11.

成中的比重占首位，到 1998 年天然气在俄罗斯初级能源生产中的比重已达 47%。<sup>①</sup>另据俄燃料动力部预测：至 2005 年，油气在俄初级能源生产中的比重将增至 80.3%。<sup>②</sup>可见，经济转轨中石油天然气在俄罗斯初级能源生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就保证了石油化工、机器制造、金属加工、黑色冶金、建材工业等耗能较大的工业部门的能源需求，成为支撑俄罗斯国民经济能源需求的重要能源生产部门。

### （五）经济转轨以来勘探效率和天然气处理能力下降；石油储量结构的恶化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石油勘探工作下降了 75%，石油储量增长下降 85%。1986-1990 年发现油田平均储量为 1100 万吨，1991-1999 年下降到 400 万吨。现在俄罗斯国家控制的油田 80%都是储量不到 1000 万吨的小油田，且 75%是难采储量。由于勘探效果下降，从 1994 年起，新增石油储量不能弥补。俄罗斯共计有 20 多个天然气处理厂，总处理能力超过 850 亿立方米，所有处理厂处理能力的利用率不到 60%，主要原因是设备老化，磨损腐蚀达 56-60%。2004 年全俄油田溶解气产量超过 500 亿立方米，其中经处理厂处理的仅 430 亿多立方米，其余均放空点火。有些公司油田溶解气的利用率不到 50%；从 1971 年到 2000 年，全俄难采储量占总储量的比例增长了近 2 倍，达到 54%以上，其中西西伯利亚增长了 3 倍，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增长了 2 倍。俄一体化大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储量中，难采储量占的比例从 20%至 65%不等。

## 二、制约经济转轨中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多视角分析

（一）历史视角：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式开采是制约苏联及俄罗斯油气开发后劲的根本性因素

**表 3 苏联油气基本建设投资及产量增长情况 (%)**

时间	1971 - 1975 年		1976 - 1980 年		1981- 1985 年	
	产量	投资	产量	投资	产量	投资
石油	100	100	122.9	171.4	128.4	281.9
天然气	100	100	149.9	172.0	209.7	250.6

资料来源：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ефти, 1990, №10.

不断增加投资量是经济转轨前石油天然气工业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石油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例。同时，能源工业在各国国

① Сияк Ю. В., Газов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2003№1, С.18.

② 巢华庆等编译：《俄罗斯大型特大型油气田地质与开发》，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年版。

民经济发展中处于先行地位，它的建设生产应安排在其他经济部门之前。而且随着新区自然条件变差、储量质量恶化以及环境保护要求提高等原因，投资需求加大。一般讲，随着投资的增加，石油产量会有所上升。原苏联对石油工业的投资十分巨大。例如，1988年其石油产量6.24亿吨的高峰，天然气年增长量达430亿立方米，当年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投资分别占国民经济总投资和工业投资的14.3%和34%。详见表4。

表4 1961-1992年原苏联及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投资情况

基本建设投资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	1992
国民经济总投资	2133	3063	4372	6443	7608	9538	-	-
工业总投资	877	1197	1686	2515	3007	3991	-	-
燃料能源工业投资	300	420	610	997	1410	1779	483	387
其中：石油工业	93	131	205	356	565	733	214	177
天然气工业	39	73	138	271	411	514	67	41

资料来源：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ефти, 1990, №10.

因此，前苏联(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不断增加对油气开发的投入。其中西伯利亚所获得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不断增加，以年均10%递增，“十一·五”计划期间的投资比“十·五”计划期间的投资额增加约40%。基建投资的增长部分几乎全部用于维持石油的巨大产量和发展天然气工业。仅从前苏联对秋明油田的投资来看，数量就相当惊人：1964-1972年投资额为90多亿卢布，1971-1974年为80亿卢布，“九·五”计划期间增至139亿卢布，“十·五”计划期间进一步上升到220亿卢布。

此外，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开始，前苏联的能源政策改为优先发展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因此，前苏联大大增加了对油气工业的投资，而对煤炭工业的投资则相对减少，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每年油气工业的投资一直为煤炭的2-3倍，从而使油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显著增加，由1950年的20%增至1978年的64%<sup>①</sup>。在此时期，由于增加使用油气为燃料，提高了效益，使苏联经济即使在停滞时期也维持了一定的增速。

① 华泽澎主编：《能源经济学》，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表 5 苏联石油产量已过高峰期

五年计划	年 份	产 量:		5 年增长量 (亿吨)
		第 1 年	第 5 年	
第 8 个	1966-1970	2.65	35.3	0.88
第 9 个	1971-1975	3.77	4.91	1.14
第 10 个	1976-1980	5.20	6.03	0.83
第 11 个	1981-1985	6.09	5.95	0.14
第 12 个	1986-1989	6.15	6.07	0.08

资料来源: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ефти, 1990, №10.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初, 是原苏联石油工业稳步上升的时期。从 1951 年至 1984 年, 全国石油开采量平均每年增长 8.5%, 绝对增长额为 1700 万吨, 而同期美国的年绝对增长量仅为 480 万吨。但自 1984 年以后, 全苏及西伯利亚油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陆续暴露出来, 由此导致全国石油产量的下降。至 1988 年, 石油每 5 年的增长量已由第 8 个五年计划的 0.88 亿吨降至 1988 年的 0.08 亿吨, 达到历史最低点, 从而使苏联石油产量的高峰期结束。其原因在于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粗放式经营, 使其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见表 5), 制约了其发展后劲。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西方有关研究机构曾预言, 20 世纪 80 年代起苏联的石油产量会大幅度下降, 由此会导致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一系列变化。恰在此时, 当时执政的勃列日涅夫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增加石油产量, 打破了西方的预言。1985 年以后, 戈尔巴乔夫同勃列日涅夫一样违背油田的科学生产规模, 不择手段地增加石油产量。这些短期行为使西西伯利亚的油气储藏结构遭到了破坏。秋明油田中最出名的年产 1 亿吨原油的萨莫特洛尔油田仅经过 10 年的开采, 油田结构就遭到严重破坏而失去了生产能力。

表 5 1960-1991 年前苏联和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成本

指 标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1
采油, 卢布/吨	3.12	2.97	4.25	5.70	7.21	13.70	21.9	57.4
采气, 卢布/千立方米	0.59	0.41	1.67	2.98	3.29	3.99	4.1	10.6
石油探井, 卢布/米	117.2	160.0	243.2	297.1	387.2	465.7	614.9	1123.63
天然气探井, 卢布/米	122.2	180.4	277.5	297.0	469.3	818.4	672.9	1117.50
石油生产井, 卢布/米	48.9	55.5	82.2	93.4	112.0	119.5	130.6	284.30
天然气生产井, 卢布/米	66.4	63.0	115.7	176.9	286.2	342.9	456.6	873.80

资料来源: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ефти, 1990, №10.

(二) 自然视角: 气候和资源状况的恶化是制约俄能源工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性因素

## 1、严寒的气候和开采难度增大，使油气生产成本大大增加

由于西西伯利亚许多油气田逐渐枯竭，因此不得不重新开发埋藏深、储量少、难开采的小油气田。开采难度加大及技术落后使油气田生产成本逐渐上升。沙特阿拉伯生产一桶石油成本仅为 1 美元左右，海湾国家为 4 美元，欧佩克国家为 1-3 美元，经合组织成员国为 4-8 美元，而俄罗斯高达 15 美元<sup>①</sup>。此外，随着油气田地质勘探工作向俄北部地区推移，目前新投入开发的许多油气田都处于永久冻土带和高寒地区，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加大，与油气相关的基础设施费用提高，由此大大增加了开发成本。如亚马尔半岛和西西伯利亚纳德耶姆—普尔—塔佐夫斯特耶地区几个新近投入开发的气田都处于永久冻土带上，开发的技术水平要求提高，投资需求增大。据有关专家估计，其开发成本增加了 1/3。

## 2、俄罗斯石油工业资源状况趋于恶化

目前，俄石油工业资源状况均出现恶化。稠油储量、低渗透油藏储量、含气油藏储量、含水油区储量以及碳酸盐层储量的比例增加。大量大型和巨型油田已进入开发晚期，其主要表现便是石油产量明显下降，产层含水率大幅度上升。全俄 ABC 型难采石油储量由 1980 年的 36.8% 增至 1996 年的 50%<sup>②</sup>。同时，俄石油储量投入开发和采出程度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从油田来看，大油田采出程度最高，如萨莫特洛尔油田，采出程度为 65%，马索托夫为 72%，费德洛夫为 58%，罗马什金为 85%，阿尔兰为 77%，乌辛油田为 58%。

石油储量的质量变差还表现在：①储量的运用程度很高，全俄已达 72%；②已投产储量采出程度较高，全俄平均为 40%，而占俄石油总产量 33% 的 12 个大油田则达到 60%-86%，其中罗马什金油田达 85.6%，萨莫特洛尔油田 63%；③油井含水率上升，全俄平均超过 70%，罗马什金油田达 86%，萨莫特洛尔油田达 92%；④难采储量，即低渗透率油藏的比例加大。20 年前难采储量只占前苏联石油总储量的 5%，现在则占 50%，西西伯利亚地区甚至高于 50%。由于难采储量的比例加大和油井含水率上升，单井平均产量在近 5 年从 25.1 吨下降至 11.9 吨。⑤发现和新投入开发的多是中小油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克雷洛夫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在勘探过程中新增的石油储量与该区总资源量的探明程度密切相关。在总资源量的探明程度为 15%-25% 的勘探初期，储量增长最多，然后会急剧下降。目前，俄石油总资源量的探明程度约为 1/3，已过了储量增长的高峰。近两年新增石油储量不足以弥补同期的采出量。实际上，除新、老油区外，新发现油田的储量规模日益变小。例如，1986-1990 年全俄新发现

① [俄]斯·日兹宁著，强晓云等译：《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 页。

② ЭКО, 2006, №10.

油田的平均储量仅为 930 万吨，而 1961-1965 年则为 5350 万吨。同期内，俄欧洲北部地区从 4200 万吨降至 680 万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从 500 万吨降至 100 万吨。但是自然条件的恶化可以用技术条件来加以弥补和改进。用石油专家、能源部石油开采许可证总局局长列索夫斯基的话来说，“没有不合格的油田，而只有不适应或者跟不上这些油田现状的开采工艺”。

### （三）技术视角：技术进步是能源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和根本推动力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和根本推动力，教育和科技的大发展既是集约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国家在开发一次能源时利用高科技极大地提高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效益。20 世纪 80 年代，在 OECD 国家中，石油开采的平均成本为每桶 8-10 美元，而现在是 4-8 美元<sup>①</sup>。在西方国家中，技术因素还在节能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在电力生产、石油开采与深加工、能源消费中利用的现代技术以及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环保工艺等方面均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差距在继续拉大。

具体而言：①能源工业设备老化严重，设备折旧率进一步提高：1995-2000 年石油开采业为 51%-61%，石油加工业为 75%-80%，天然气工业为 59%-73%，煤炭工业为 52%-64%，电力工业为 58%-63%<sup>②</sup>；石油管道老化也很严重：使用期限 30 年的管道有 50%已超过 25 年，13%已超过 30 年，20%役龄为 20-30 年，35%役龄为 10-20 年<sup>③</sup>；②开发井网过稀。俄共有 1875 个油田，投入开发的为 1020 个，占总储量的 75%。在已开发的石油储量中，有 90%采用注水方法。井网密度为 20-100 公顷/井。由于井网稀，导致许多储量采不出来。克雷洛夫认为，合理的井网密度应为 10-50 公顷/井，因此需要打加密井；③钻井工作量下降。前苏联油气产量与钻井进尺的关系表明，钻井进尺增加，石油产量就会随之上升。1988 年钻井进尺达到约 4900 万米的高峰，石油产量也爬到了高峰；而随着钻井进尺的减少，石油产量也下降。钻井进尺减少不是俄罗斯钻井技术不如西方，而是由于缺少资金，钻机设备不配套以及钢材质量差。

### （四）转轨视角：经济转轨中能源政策因素强化了能源工业增长方式的粗放化

#### 1、经济转轨以来不合理的投资政策使俄罗斯能源工业得到优先发展

从 1995 年起，为了扩大出口稳定经济，俄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采取了“消极适应”政策，因而实行了投资倾斜政策，增加了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的投资。经济转轨初期的 1992 年，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 50%，1995 年上升

---

① [俄]斯·日兹宁著，强晓云等译：《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 页。

②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2004 №5, С.3.

③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2004 №5, С.4.

到 61.7%，明显高于其他工业部门。1995 年石油工业基建投资比预测的高 8.1%，投资减少的速度比 1994 年减缓了 80%。与此同时，由于俄政府对结构调整实行消极适应政策，因此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油气在生产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油气出口在俄对外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也相应提高。1993 年俄出口转为正增长，1994 年增长 8%，1995 年增长 18%，1996 年增长 15.8%。投资的倾斜和出口的扩大，使石油天然气能源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工业部门，这便形成了在经济总体下降的条件下，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部门生产的下降幅度低于其他工业部门，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并居各工业部门之首。投资结构决定增长结构，而增长结构又以不同的投资结构为前提。较高的增长率是以相对较高的投资增长结构及投资比例为前提的。在 1991 年能源工业内部的投资结构中，电力工业、石油开采业、石油加工业、天然气工业和煤炭工业的比重分别为 17.5%、51.2%、1.7%、15.4%、11.8%，到 1999 年的比重分别为 17.8%、25.3%、8.9%、42.8%、3.6%。此消彼长，经济转轨以后，俄罗斯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日趋下降，至 1995 年已分别仅占工业生产构成的 2.4%和 11.3%。

## 2、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度追求不得不将重点仍寄托于能源工业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完全粗放到粗放为主型，再过渡到集约为主型乃至完全集约型的发展过程。作为俄罗斯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能源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经济整体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实现高增长的目标，只能通过高投入低产出来实现。俄单位 GNP 能源费用比美国高 4.5 倍，比 OECD 国家高 6.4 倍，比欧盟国家高 8 倍，比日本高 10.6 倍。而每单位能源费用仅获 0.63 单位 GDP，美国为 2.9，OECD 国家为 4.0，欧盟国家为 5.0，日本为 6.7。<sup>①</sup>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要求经济增长的能耗逐步降低，以与经济能效提高相适应。GDP 的单位能耗下降一半，即 GDP 的平均能耗要从 2000 年的 22% 下降到 2020 年的 13%~15%。但是预测表明，每千美元 GDP 所消耗的标准燃料，发达国家将从 2000 年的 0.36 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0.29 吨，2020 年达到 0.23 吨；发展中国家将从 2000 年的 0.71 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0.66 吨，2020 年达到 0.56 吨；而俄罗斯将从 2000 年的 1.47 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1.07 吨、2020 年达到 0.78 吨。<sup>②</sup>单位 GDP 消耗的能源高出美国 4 倍，高出德国 5 倍，高出英国 5.5 倍。<sup>③</sup>可见俄罗斯每千美元 GDP

① 《1997 年世界石油工业综述》，中国天然气总公司，1998 年版。

② Воронин А., Энерго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ак факто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Экономист, 2004№10, С.58.

③ Клоцвог Ф., Черноиа Л., О стратегии управляемого 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ст., 2004№9, С.60.

所消耗的标准燃料既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 3、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利用率很低，能源消费结构失衡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能源利用率很低，单位能耗为工业发达国家的 3.5 倍；能源消费结构失衡，天然气比重过大，而天然气资源量仅为俄矿物燃料总资源量的 27%。由于国内天然气价格很低，致使天然气浪费严重。煤炭在能源消费构成中所占比例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能源工业的产出比不断下降，整个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入产出比从 1990 年的 0.43 下降到 1999 年的 0.22。其中，电力工业从 1990 年的 0.20 下降到 1999 年的 0.10，石油开采业从 1990 年的 0.90 下降到 1999 年的 0.17，石油加工业从 1991 年的 0.20 下降到 1999 年的 0.08，天然气工业从 1990 年的 0.60 下降到 1999 年的 1.55。<sup>①</sup>为此，《2020 年前俄罗斯战略》规定，必须改革经济结构，提高新技术的比例，采取节能措施，调整能源价格。2010 年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占的比例应下调到 49%，2020 年进一步下降到 45%，同期内，煤炭的比例从 18% 增加到 21%。

### 4、俄罗斯能源的出口结构将长期制约俄罗斯能源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俄罗斯重要商品的出口构成中，原油从 1995 年的 41.5% 上升到 2000 年的 44.7%，石油产品从 1995 年的 25.8% 上升到 2000 年的 36.0%，天然气从 1995 年的 32.6% 上升到 2000 年的 33.27%，煤炭从 1995 年的 11.9% 上升到 2000 年的 17.1%。在 2000 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构成中，石油为 38.7%，天然气为 42.1%，石油产品为 12.9%，煤炭为 5.4%，电力为 0.9%。<sup>②</sup>未来天然气出口在俄罗斯的天然气生产中的比重，2010 年将达 40%，2020 年将达 42%。<sup>③</sup>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所认为，未来俄能源出口，2010 年为 77~84 亿吨标准煤，将比 2000 年增长 140~153%，其中 2010 年石油出口量将为 2.5~2.75 亿吨，天然气为 2500~2650 亿立方米，煤炭为 3500 万吨标准煤，电力为 200~350 亿千瓦/时。2020 年石油出口量将为 2.7~3.1 亿吨，天然气为 2750~2800 亿立方米，煤炭仅为 3500~4500 万吨标准煤，电力仅为 300~750 亿千瓦/时。<sup>④</sup>从初级能源消费与电力消费的关系看，2010 年前俄罗斯初级能源消费将增长 128%，电力消费将增长 146%，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1.14。可见在 21 世纪初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在俄罗斯能源出口结构中仍居主导地位。这种低级化的能源出口结构将长期影响

① Мастепова. М.,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2001, С.60.

② Мастепова. М., Топлив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2001, С.292.

③ Сняк Ю.В., Газов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 :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2003№1, С.27, С.29.

④ Макаров А.А., Фортов В.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ов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04№3, С.202.

俄罗斯的能源生产结构，从而制约俄罗斯能源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5、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新能源发展滞后，发展速度慢规模小

针对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均制订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划和支撑政策。美国制定了庞大的风力发电计划，欧盟要求到 2010 年仅生物质能的供应量就达到能源总消费量的 15%。德国到 2002 年已经安装了近 1.3 万台风力发电机组，总功率超过 1000 万千瓦，占世界风力发电总量的 1/3 强。而法国新的风电发展规划则计划到 2025 年风电占到总发电量的 25%，到 2050 年占总发电量的 50%。丹麦已经成功地用风电满足了国内 18% 的电力需求。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俄罗斯尚不属于积极利用新能源的国家。新能源在俄罗斯能源平衡表中仅占约 1%，而欧盟国家的比重已达近 4%。北欧国家的比重则更高。俄罗斯新能源的利用潜力为 2.7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俄国内初级能源最终需求的 30%。<sup>①</sup>新能源在初级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俄罗斯为 1%，欧盟国家为 4.3%，芬兰为 20.0%，瑞士为 17.5%。新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比重，俄罗斯为 0.5%，欧盟国家为 4.4%，芬兰为 13.5%，瑞士为 7.4%。新能源在热能生产中的比重，俄罗斯为 4.3%，欧盟国家为 22.1%，芬兰为 17.6%，瑞士为 60.1%。<sup>②</sup>

## 三、主要结论与启示

1、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经济转轨中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整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03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转轨进入了新阶段。该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确立之后，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实现经济发展正成为经济转轨矛盾运动的主导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以能源工业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俄罗斯，应将能源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重点，其手段是能源工业自身首先要节能降耗。

2、经济转轨中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罗斯托认为，在任何时期，一个经济系统能够具有或保持“前进的冲击力”，是若干个“主导部门”迅速扩张的结果。这些主导部门在自身扩张的同时，还对其他部门产生影响，最终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sup>③</sup>。但是，任何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其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在经济发展步入稳定增长阶段后，将经济增长速度的实现仍

---

① Ф.Клоцвог Л.Черноиа Остратегии управляемого 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ст.2004.№9.с53.

② Ф.Клоцвог Л.Черноиа Остратегии управляемого 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ст.2004.№9.с54.

③ 龚仰军著：《产业结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39 页。

寄托于能源工业这样的战略性产业，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的。

3、经济转轨中俄罗斯能源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的成效。俄罗斯能源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的低级化，是制约俄罗斯能源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转轨因素。投资结构决定增长结构，而增长结构又以不同的投资结构为前提。较高的增长率是以相对较高的投资增长结构及投资比例为前提的。为此，转变能源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是调整投资结构。

4、产业结构变动直接决定各产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弹性的高低，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对能源消费和利用的效率。各产业能源消耗密度的不同，是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强度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如果能源消耗密度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并且上升较快，能源消费强度就会因此而增加。另一方面，各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差异很大，如果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大的产业增长速度较快，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就会下降。

---

**【 Abstract 】** Researches on Russian energy industry sinc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ve shown it as a strategic dominated energy industr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Russi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Russian energy industry has maintained a high growth rate and was the first one out of Russian transition crisis. Looking back on Russian energy industry before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has suggested that the extensive exploitation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is the basic reason hindering the potential of developing oil and gas, which we should recognize completely objectivel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strengthening extensive way of economy development since economy transition from aspects such as design recovery rat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Besides, this article also makes a depth analysis of reasons and points out changes of economy developing ways of Russia's energy industry has influenced the overall economy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 Key Words 】** Russia, Energy Industry, Economic Transition, Way of Development

---

（责任编辑 卢冠霖）

## 中俄关系

#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李承红\*\*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的进程、内容和发展动力等问题，重点分析了中美俄三方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态度，特别是美方和俄方的官方与学界的不同观点。作者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中的问题及原因：交易量下降，围绕价格、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分歧等，但认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同时对中国国家利益关系重大，作者为此提出了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对策。

**【关键词】** 军事技术合作 现状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E163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1-0087-(30)

## 导 言

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传统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尤其是两国之间日益频密的军备交易与技术合作，属于典型的“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范畴，它直接关乎两国之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能否得到维护以及被维护到何种程度，从而其意义与影响有别于双边关系中的一般经济性交换如投资贸易及人员交往环境保护等活动所产生的影响。鉴于中俄两国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项目批准号：07JJDGJW25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李承红，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博士候选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快因而被广泛认为有可能在本世纪的前半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国家，而俄罗斯则是继承了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库到目前为止地球上唯一一个有能力以“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为战略与美国进行核对抗的国家，两个有着如此经济地缘与军事影响的欧亚大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相互靠近乃至结成准军事同盟所可能产生的全球影响力，自然不容小视。实际上，西方不少国际问题观察家，对于冷战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双边军事技术合作关系方面的进展情况，表现出相当的关注。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进程到底如何？它们发展的动力又何在，它是不是构成对美国单一霸权的某种均势行为？它有没有诱发催生传统的“安全困境”，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军备竞赛？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关注。<sup>①</sup>

由于军事技术合作的敏感性，研究材料的不易获及，学者们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详细情况了解并不充分，研究成果也相对有限，中文方面的资料文献尤其不足。<sup>②</sup>本文力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根据俄罗斯发表的一些英文材料，试图对广义上中俄之间的军事关系，特别是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的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文章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将从历史的角度，简单介绍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将从横向的角度着重介绍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中俄军事装备的交易，军事技术的共同合作开发研究，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以及军事演习的共同开展等方面。文章第三部分将介绍中俄美三方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立场观点，并同时对这些看法观点进行简要分析。第四部分将讨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在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军备武器交易数量的下降，双方围绕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产品价格等引发的争议，以及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互信基础不足等问题。文章最后将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阐

---

①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Robert J. Art,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 3 (winter 2005/06), pp.177-185; Robert H. Donaldson and John A. Donaldson, “The Arms Trade in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dentity, Domestic 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7, no.4 (December 2003); Yu Bin, “In the Search of a Normal Relationship: China and Russia Into the 21st Century”,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5, no. 4 (2007), pp. 47-81.

② 中文研究成果参见于兴卫：“新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论述”，载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8-727页；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在其“21世纪初中俄关系的挑战”这篇全面讨论中俄关系的论文中，部分论及了中俄军事合作方面的问题，参见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668-692页；刘德喜在其专著中，对中俄之间军方高层往来的情况，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见《从同盟到伙伴——中俄关系五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本文有关中俄军方高层往来的部分材料来自刘德喜先生的著作。

述中俄军事合作的战略意义，同时就如何消解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增进中俄互信，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 一、中俄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简要发展历程

### （一）中俄军事合作关系的起步初创阶段

大体而言，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简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到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此阶段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的初步建立阶段。<sup>①</sup>消除中苏和中俄边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建立初步军事互信为此阶段合作的主要任务。中俄消除边界紧张建立边界军事互信的谈判直接继承了中国与前苏联之间就此问题展开的协商。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成功访华之后，双方便于该年的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谈判。1990年4月，双方签署了“关于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中俄建交后，在原有基础上双方继续举行了六轮谈判。从第七轮谈判起，解体后的前苏联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俄罗斯组成四国联合代表团与中国进行谈判。经过多轮谈判，在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外长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在此阶段，中俄的军方领导人也开始互访，揭开了军事技术合作的序幕。1992年2月底3月初，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萨姆索诺夫上将访问中国。1992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访俄，并与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讨论了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问题，其中包括在远东地区进一步削减军备问题。1992年11月下旬，俄副总理绍欣访华，会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双方讨论了利用国防工业为各自国民经济服务的事项。这实际上成为后来建立的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军购方面，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就开始从前苏联购置部分武器。在1992年，有报道认为俄罗斯大概已经有40%的军火是输往中国。<sup>②</sup>

### （二）中俄军事合作关系的稳步发展阶段

---

<sup>①</sup> 此处有关中俄军事合作关系分期的观点参考了于兴卫在其“新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论述”一文中的看法。参见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9页。

<sup>②</sup> 《南华早报》，1996年11月28日。转引自郑宇硕：“21世纪初中俄关系的挑战”，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0页。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发展历史的第二阶段从 1992 年叶利钦访华到 1996 年中俄五国举行“上海五国”会议为止。这是一个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发展出信任和紧密关系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俄双方不仅在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方面进一步加深，双方军事领导人的互访也日趋频繁，同时中俄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具体进展。

就此阶段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而言，1994 年 7 月，中国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访俄，并与俄签署了“中俄两国政府预防危险军事活动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了处理双方边防军队发生突发事件的办法。<sup>①</sup>此后经过多轮磋商谈判，双方最终在 1995 年 9 月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内容达成一致。1995 年 11 月，中、俄、哈、塔、吉五国草签了这一协定。<sup>②</sup>1996 年 4 月，五国元首在上海会晤，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为另一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此阶段中俄军方领导人的来往也相当频密。1993 年 11 月，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访问中国，成为首位访华的俄国防部长。访问过程中双方签署了两国国防部五年的合作协定，并确定了国防部长定期会晤制度。此后这一国防部长会晤制度一直延续下来。1994 年 4 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科列斯尼科夫上将访华，与中方讨论了削减俄中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谈判进程。1996 年 5 月，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访俄，与俄签署了关于落实 1993 年两国军事部门签订的军事技术合作协定的议定书。1995 年 5 月，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率领一个包括俄空军司令、情报总局局长、国际军事合作总局局长等军方高级官员在内的庞大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

具体就军事技术的合作方面而言，此阶段双方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1993 年 5 月，俄罗斯在北京举办了武器展览，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器展览。1993 年 6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俄，与绍欣副总理举行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sup>③</sup>1995 年 12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俄，与俄第一副总理索斯科维茨举行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刘华清等参观了俄罗斯一系列国防工业，双方就中国获得苏-27 型战斗机的生产许可权达成了协议，还就军事院校学员的交流问题达成协议。<sup>④</sup>从 1992 年到 1995 年，中国订购了 72 架苏-27 战斗机、4 艘基罗级潜艇、10 架伊留申运输机，以及 100 套 S-300 防空导弹系统。1996

---

① 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关系五十年》，第 341-342 页。

② 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关系五十年》，第 349-350 页。

③ 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关系五十年》，第 347 页。

④ 于兴卫：“新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论述”，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 720 页。

年，中国与俄罗斯正式签订协议，在沈阳组装及生产 200 架苏—27 战机。<sup>①</sup>

### （三）中俄军事合作关系的制度化纵深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从 1996 年的上海五国会议至 2005 年底，这是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向纵深方向拓展，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轨道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俄军事互信机制进一步完善，使得双方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另一方面，此阶段以中俄两个大国为核心的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1 年正式成立，同时中俄又签订了睦邻友好条约，这都标志着中俄两国军事关系的制度化发展走向了新水平。中俄军事合作逐渐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开始关注并协调应对处理一些双方共同关切的区域及国际性重大问题，诸如国内分离势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盛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体现出某种准盟友关系的性质。

军方高层的互访在此阶段也是一如既往的频繁，双方国防部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之间的定期会晤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安排。1997 年 11 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中将访俄并签署了两军总参谋部会谈备忘录。1998 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中将访俄，与俄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上将举行了两军参谋部第二轮磋商。<sup>②</sup>到 2006 年，中俄军方总共举行了总参谋部十轮战略磋商。<sup>③</sup>

在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和强化方面，1997 年 4 月，五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协定的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1998 年 8 月中俄再次签订了《中俄边防信息交换议定书》。在双边互信建立的基础之上，中俄双方 1999 年 12 月 9 日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和“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中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双方的正规作战部队撤至距边境 300 公里的纵深地区，而且大量裁减边境守备部队人员。<sup>④</sup>2004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和俄罗斯签署《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协定》。这标志着中俄边界线走向已经全部确定。

这些协定彻底结束了冷战时期中苏边境地区多年来形成的军事对峙状态，为毗邻五国携手维护地区的共同稳定和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和军事基础。1998 年 7 月，“上海五国”元首在阿拉木图举行了第三次会晤，声明将联合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共同制止核军备竞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等。2000 年 7 月，在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此次中亚的另一个大国乌兹

① 郑宇硕：“21 世纪初中俄关系的挑战”，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 680 页。

② 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关系五十年》，第 344 页。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 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6 年 12 月 30 日。

④ 于兴卫：“新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论述”，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 721 页。

别克斯坦首次作为观察员与会。会议决定加强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情报方面的合作机能，将最初的边境裁军与军事互补机制逐渐转化为区域集体安全体系。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再次会晤，成员国首脑会议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同年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决定联合打击威胁本地区安全的“三股势力”，六成员国同意在必要时可以对“三股势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展现出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性质。2001年7月中俄双方签订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由于此点，不少分析家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开始具有准军事同盟性质。

在具体的军事技术合作方面，1996年12月，俄副总理博利沙科夫率团访华，举行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议定书。到2005年9月，中俄共举行了12次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2000年7月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达成了军事国防合作基本协议。该协议指出中俄从2000到2015年分两阶段进行军事合作的重要计划与项目。第一阶段是2000年至2005年，第二阶段是2005年至2015年，期间的重要项目包括：合作研制新一代航空器、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等系列导弹；合作研制激光、束光、中子等高科技军事装备。中方也将派遣450名军官到俄深造；举行联合军演和实战模拟高科技战争演习。<sup>①</sup>

中国在此阶段也花费了相当多的外汇用于购买俄罗斯的武器系统。据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的资料，除了在2003年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俄罗斯武器的第一大买主之外，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武器进口国的地位，俄罗斯武器出口的30%--50%均由中国购买。权威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报告也认为，在2000-2004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武器购买国，略占全球武器交易量的14%，而其中中国武器进口的95%来自俄罗斯，占俄罗斯总出口武器量的45%。<sup>②</sup>

2002年7月，中俄双方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目的是检验双方军队通讯联络情况以预防边界危险军事行动。2003年中国，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了“联合—2003”的反恐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也是中国军队首次跨国界演习。2005年8月18日至25日，中国和俄罗斯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总共有多达10000名的正规部队投入演习，出动了包括战略轰炸机、预警机等一大批的先进武器。演

---

① 于兴卫：“新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论述”，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722页。

②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 Book 2005: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习内容包括海上封锁和抢滩登陆等，这次演习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 （四）中俄军事合作关系的调整阶段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第四阶段则是从 2006 年初一直至今，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发展的调整阶段。此阶段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总的来说仍在向良好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中俄军事武器交易的数量下降，双方围绕交易价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产生一些内部性争论等，同时双方原本制度化的军事技术合作年度会议也不知何故延迟近两年没有召开。中俄军事技术合作进入调整适应，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找寻动能的新时期。<sup>①</sup>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报认为，“俄中军事合作经过 13 年的发展历程后，已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现成装备的阶段已告结束，是向中国转让先进军事技术的时候啦。”<sup>②</sup>

就军事高层互访与协商来看，原来的两国国防部长会晤以及总参谋部战略协商会晤机制依然持续。不过，由于中国的“俄罗斯年”和俄罗斯的“中国年”的举办，两国的军事交流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 2006 年中国的“俄罗斯年”活动中，中国的军事组总共设计了 6 项军事活动，其中包括俄空军“勇士”特技飞行队在湖南张家界举行了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等。而在 2007 年的俄罗斯的“中国年”活动中，中国的军事组筹划了总共八项军事方面的活动，其中包括中国海军司令员将率领舰艇编队访问俄罗斯。<sup>③</sup> 2008 年 6 月 16 日，俄罗斯防空兵代表团访华 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镇武会见。<sup>④</sup>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俄首条军事热线与 2008 年 3 月 14 日开通，中国国防部长与俄国防部长正式直接通话。这条热线早于此前传闻的中美军事热线的建立。<sup>⑤</sup>

2007 年 8 月 9 日至 17 日，中俄参加了“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在中国乌鲁木齐和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7 年 9 月，中俄联合举行“合作—2007”反恐演习。中国武警部队“雪豹突击队”和俄“勇士”特战队等 1000 余名官兵参演。

---

① 有关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方面存在问题的更多材料将在下一部分进行阐述。

② “中俄军事交流渐入新境”，《南方周末》，2005 年 9 月 15 日。  
<http://news.sina.com.cn/o/2005-09-15/15596954106s.shtml>

③ 新华网，《本网专访：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点评中俄军事交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28/content\\_5148742\\_1.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28/content_5148742_1.htm)。

④ <http://news.sohu.com/20080616/n257532598.shtml>。

⑤ 《中国新闻周刊》，2008 年 3 月 24 日。

## 二、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内容

### （一）军备交易

中俄双方军事技术合作首先表现在武器装备的交易方面，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武器装备。<sup>①</sup>据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的研究资料，除了在 2003 年印度超过中国为俄罗斯武器出口的第一大买主之外，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武器进口国的地位，俄罗斯武器出口的 30%--50% 均由中国购买。仅 1996 年，中国武器进口的 70% 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唯一一家国家武器出口贸易公司 Rosobornexport 估计 2004 年对华军售总额就多达 41 亿美元。而根据权威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8 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年度报告》，俄罗斯在 2003-2007 年间占全球常规武器出口比例的 25%，略小于美国的 31%。其中中国占俄罗斯出口武器的 45%，高于占第二位印度的 22%。<sup>②</sup>

从空军来看，中国通过俄罗斯，获取了相当数量的苏-27 和苏-30 先进战斗机，大幅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4 年 9 月，中国空军实际上已经装备了 271 架俄制苏-27 和苏-30 及其改良型先进战斗机，再加上 129 架已经订购但尚未交货的飞机，那么中国可能已经有能力配备 400 架的俄式重型战斗机，其总量已经超过俄罗斯本国空军装备的数量。根据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的专家们估计，在未来的 7 年中，俄罗斯还可能将向中国出口价值 80~90 亿美元的战机。另有报道说，中国一直在试图以租订或现款购买的方式从俄罗斯获取 2 到 4 架预警飞机，以用于未来可能的台海危机。

就海军来看，由于台海危机的发展，从俄罗斯等大国获取先进战舰就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根据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的资料，中国在 1994-1995 年期间从俄罗斯购买了 2 艘“基洛”级 877EK 潜舰，共花费 5 亿美元。在 1997-1998 年期间，中国再从俄购进“基洛”级潜舰 636 型 2 艘，共花费 5 亿美元。在 2004-2006，中国再度从俄购置 8 艘“基洛”级 636M 潜舰，共花费 16 亿美元。而 1999-2000，中国购置了两艘 956E “现代 (Soveremny)”级驱逐舰，价值 8.85 亿。2005-2006 中国

---

①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关中俄装备交易内容的中文资料零散而不全面，不易获及。本文有关中俄武器交易的数据与内容大都来自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Technological Analysis)，其中尤其是该中心副主任康斯坦丁·马基延科的研究结果。不过由于武器交易与技术合作的特殊性质，相关材料与数据的准确性难以据实评估检验，因此本文的相关数据与材料仅具有参考价值，不代表官方权威观点。

②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8: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另外获得了两艘 956EM “现代”级驱逐舰，花费 14 亿美元。<sup>①</sup>其中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由于配备有“日灸”式超音速反舰导弹，被广泛认为是在未来冲突中中国海军应对航空母舰的利器。而“基洛”级常规潜艇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柴油动力潜艇之一，可配备“俱乐部”反舰导弹，中国获得这些潜艇后将大大提高对台湾的海上封锁能力。2004 年中国也从俄罗斯购置了 24 架改良式苏-30 海军多用途战斗机。中国还从俄罗斯获取了两套先进的 S-300F 舰对空导弹系统。

另外，中国也从俄罗斯购买了 10 到 12 套 S-300P/PMU-1 型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8 套 S-300P/PMU-2 型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27 套 Tor-M1 短程地对空导弹。根据美国国防部有关中国年度军力报告，中国近几年开始积极购进俄罗斯先进的地对空导弹和相关技术。该报告认为中国已从俄罗斯获取了少量的 SA-10b, SA-10c 和 SA-15 地对空导弹。这些俄罗斯的防空导弹正用于实战部署，它们填补了中国防空体系的空白。<sup>②</sup>

根据俄方消息，在 2005 年，中国订购了 34 架伊尔-76 运输机，4 台坦克装运车，合计价值 12 亿美元左右，将在 2006-2011 年期间交货。从 2005 年起，中国开始大量从俄罗斯进口武器部件。在 2007 年，中国接收了 12 架米-171 直升机（合同总架次为 24，签于 2006 年，价值 2 亿美元），同时获得了 140 套 AL-31 飞机发动机（总额为 180 套，合同签于 2005 年，价值 5.5 亿美元）。这些发动机主要用于中国以前从俄罗斯购置的苏-27/30 型战机。中国同时获得了 30 套 RD-93 飞机发动机部件（总额 100 套，合同签于 2005 年，价值 0.7 亿美元），30 套 AL-31 飞机发动机（2005 年签约），以及 4 套 S-300PMU2 favorit SAM 系统（价值 4.9 亿美元，于 2004 年签约八套，价值 9.8 亿美元）。<sup>③</sup>

## （二）军事技术的合作研发

相较于武器装备的交易而言，中俄双方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也许更有深远意义。早在 1996 年，中俄双方就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俄罗斯在该备忘录中同意帮助中国研发新的武器系统。<sup>④</sup> 同年 12 月 6 日，中国又通过许可证的方式获取了生产苏-27SK 战机的特许权，由中国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在 5 年内生产 200 架苏-27SK。2000 年 11 月，塔斯社的一篇报道称俄罗斯同意中国参与使用其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

① “Export Contracts of Warships from Russian Shipyards 1992-2007”, *Moscow Defense Brief*, vol. 12, issue 2 (2008) .

②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国防实力年度报告》，中文版。

③ “Major Identified Deliveries of Russian Arms in 2007”, *Moscow Defense Brief*, vol.10, no. 4 (2007) .

④ “Country’s Briefing: China,” *Jane’s Defence Weekly*, (December 10, 1997).



GLONASS, GLONASS是俄罗斯版的GPS, 可以军民两用, 包括为高精度的远程打击提供导航。<sup>①</sup>2006年5月2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上将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参观了俄“红旗勋章城”指挥控制中心, 也即俄“格洛纳斯(GLONASS)”全球卫星定位指挥系统。梁光烈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到该基地参观访问的外国高级将领。因此外界广泛猜测“中国很可能向俄罗斯采购太空军事科技和相关设备, 以建立自己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在此之前, 中国在最近两年内可能会使用俄军方的‘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sup>②</sup>又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04年11月份的一篇报道, 中国代号为“新预警”的国产空中预警机已完成装机并开始进行试飞测试, 这将是取得对台军事优势的关键性技术突破。该报称该型中国国产预警机使用了俄制IL—76型运输机为载体, 暗示中国也许在发展预警机方面获得了俄罗斯的某些帮助。<sup>③</sup>在2003年的北京国际航展上, 俄罗斯专家向中国媒体证实, 中俄将联合研制L15军用教练机等武器装备。又据美国广播公司引自在美国国防部任职的美国莱克星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古尔的消息说, 中国, 俄罗斯及一些欧洲国家, 可能正在联合研发专门令美国隐形战机现形的新雷达系统, 如果成功, 美国B2隐形轰炸机及F-117隐形战斗机就将降级为一般战机。另外有报道指称, 中国与俄罗斯目前有11个空间项目方面合作, 其中包括联合载人飞行。而2004年的珠海航展上, 俄罗斯国营武器出口公司总经理霍普金夫透露, 中国装备的苏-27、苏-30和歼-8飞机中有10—20%的装备是他们公司生产的, 他认为中俄在机载雷达和航电设备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sup>④</sup>2007年3月, 中俄签署了《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关于联合探测火星—火卫一合作的协议》。根据该协定, 在2009年10月启动中俄火星探测计划的航天器, 到2010年8月左右能到达火星进行探测。<sup>⑤</sup>2008年7月14日, 《环球时报》报道说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总裁阿列克谢·费多罗夫表示俄罗斯可能同中国成立合资企业, 共同研制新型客机MS-21。据报道, 该种客机将能取代空中客车A-320和波音-737。<sup>⑥</sup>2008年5月24日, 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 在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 中俄还签署了航空技术进出口合作总协议。

在核能源的合作方面, 早在1992年莫斯科可能就已经向北京出售过可以提升

---

① “Russia, China to Cooperate on Global Navigation System,” FBIS, *Interfax*, July 22, 2000; “Russia, China discuss Arms and Space Cooperation,” *Interfax*, November 2, 2000.

② “美国紧盯俄罗斯对华军售, 猜测中俄两国军事交流”, 《环球时报》, 2006年5月31日。

③ Edward Cody, “China Now Test-Flying Homemade ACACS: Radar Places Intended For Use in Taiwan Strait”,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3, 2004.

④ “中俄军事合作的悠久传统将继续深化传承——俄罗斯航空人士谈与中国合作”, 《国际展望》, 2004年。

⑤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5785273.html>.

⑥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7-15/0937510811.html>

铀含量的技术。1999年2月的时候，又有报道称俄正在帮助中国的十三座不同地区的核电站在技术设计，建造，和运转方面提供帮助。在2000年6月，俄同意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快速反应堆，同时就两座浓缩铀工厂建设展开商讨。<sup>①</sup>另有报道声称在1999年10月，俄方正帮助中国发展一种新型核动力潜艇，此种潜艇可以使用核反应堆并能够实施战略核打击。2008年5月24日，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在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中俄签署了协议，确定了建设气体离心铀浓缩工厂四期工程提供技术协助合同的基本条件。

俄媒体也披露，自1996年以来，已有2000多名中国军官根据中俄两军交流计划，陆续在俄军各级指挥学校得到进修。俄军也派遣了一批中高级军官到中国国防大学短期进修。这为两军进一步展开合作打下了基础。<sup>②</sup>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科学家在中国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从事研发工作，也有不少的中国工程师在俄罗斯接受培训，总计有超过100个的共同生产合作研发项目已经被启动。<sup>③</sup>

### （三）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

中俄军事合作也表现在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与军事演习的共同开展方面。早在1994年，中俄两国就签署了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从大战略的高度为两国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1994年中俄两国签订《中俄预防危险军事行动活动协定》。该协定规定了处理双方边防军队发生突发事件的办法，这些突发事件包括：战斗机或军舰非故意地穿越边界、意外发射火箭；在可能危害到另一方的情况下使用激光器，给管理系统制造障碍。<sup>④</sup>1995年，中俄边防部门签署了“中俄边防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开展边防合作，预防在国界地区发生意外事件和冲突的情况，致力于把中俄国界建成和平，安宁和友好的边界。1996年，中俄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活动等。1997年4月24日，正在俄罗

---

① “Russia to Help China Build Fast-Breeder Nuclear Reactor,” *Agence France Press*, June 1, 2000.

② “中俄军事交流渐入新境”，《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  
<http://news.sina.com.cn/o/2005-09-15/15596954106s.shtml>

③ Robert H. Donaldson and John A. Donaldson, “The Arms Trade in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dentity, Domestic 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7, no. 4 (December 2003), pp.715-716.

④ 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关系五十年》，第341-342页。

斯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俄、哈、吉、塔四国元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再度相聚，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根据协定，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水平，使其只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 100 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的人员和主要种类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保留的最高限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协定也规定在长达 7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各自一侧 100 公里范围内，裁减后每方保留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的总人数不超过 13.04 万人。协定的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协定实施后，绵延 7000 多公里的边境地区将形成一个广阔的安全带和信任带。为具体落实上述两个协定，中俄等其他五国还于 1999 年成立了五国边境地区裁军联合监督小组，负责监督与核查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执行。协定规定由双方军事专家组成视察组，根据联合监督小组会议制定的计划，每年对双方边境地区的若干军事单位相互进行视察，监督边境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执行情况。<sup>①</sup>1999 年 12 月 9 日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和《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中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双方正规作战部队撤至距边境 300 公里的纵深地区，而且在边境地区的重要军事行动如演习等应事先向对方通报。<sup>②</sup>2004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和俄罗斯签署《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这标志着中俄边界线走向已经全部确定。<sup>③</sup>

#### （四）军事演习的共同开展

而在军事演习方面，2002 年 7 月，中俄双方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目的是预防边界危险军事行动以检验双方军队通讯联络。2003 年中国，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了“联合—2003”的反恐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也是中国军队首次跨国界演习。最引人注目的是中俄 2005 年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此次中俄“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于 2005 年 8 月 18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正式开始。演习分三个阶段进行：战略磋商与战役筹划，兵力投送与组织战役协同，以及包括海上封锁作战、两栖登陆作战和强制隔离作战三个实战课目。演习出动了包括“图—95MS”战略轰炸

① 《人民日报》，2004 年 10 月 29 日。

② 于兴卫：“新时期中俄军事关系发展论述”，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 721 页。

③ 《人民日报》，2004 年 10 月 14 日。

机、A—50 预警机、伊尔—76 运输机、装甲战车等一大批先进武器。<sup>①</sup>由于演习内容主要以海上封锁和登陆作战演练为主，而且出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常规武器，不少国际问题分析家认为演习具有针对中国台湾海峡爆发潜在军事冲突的可能。如荷兰Marcel de Haas博士分析的那样，“官方公布的演习目标，包括诸如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使用，夺取空中优势，海上封锁，和对沿海地区的控制，防空武器系统的启用等内容。不过，恐怖分子不可能拥有常规陆、海、空部队，他们也不可能平衡地部署军事力量。因此，这些演习的目标与反恐关系不大，而是不折不扣的常规战争演习，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所有设备。中国和俄罗斯最可能的真正目标是，它们希望向（西方）明确表明他们对亚太地区具有控制权，也不允许其他人染指干涉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sup>②</sup>同样Arun Sahgal 和V. K. Anand也认为，“中俄军事演习十分清楚地展示了中俄两国颇为宏大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与美国统治的单极世界相对照，他们希望在共同关切的基础上按多极世界理念来界定世界。”<sup>③</sup>

2007年8月9日至17日，中俄参加了“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在中国乌鲁木齐和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上海合作组织全体成员国参加的首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成建制较大规模、远距离、多军兵种出境参加联合军演。中方参演兵力为1600人。2007年9月，中俄联合举行“合作—2007”反恐演习。演习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宗旨和中俄两国内卫部队有关协议，针对国际恐怖活动的特点而进行的。演习为期3天，分为联合作战筹划、展开作战部署和实施联合作战行动3个阶段。演习在俄内务部内卫部队独立作战师训练中心进行。中国武警部队“雪豹突击队”和俄“勇士”特战队等的1000余名官兵参演。这些军事演习为深化两军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为两军务实合作探索出了新途径、新形式。

### 三、美俄中三方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看法观点

#### （一）美方观点

对于中俄日益密切的军事技术合作，各界看法观点并不一致，有些差距还颇大。首先，美国官方一直对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表示关切，每年在其有关中国的军力报告中，都要提及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比如美国国防部2006年的《中国军力

<sup>①</sup> 《人民日报》，2005年8月28日。

<sup>②</sup> Marcel de Haas, *Russian-Chinese Military Exercises and Their Wider Perspective: Power Play in Central Asia*, Netherlands Clingendael Institute,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October 2005, p.5.

<sup>③</sup> Arun Sahgal and V K Anand, “China and Russia, the new shooting stars,” *Asia Times Online*, 9 September 2005.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G109Ag01.html](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G109Ag01.html).

报告》，便再度对中俄军事合作表示严重担心。该报告声称，从 2000 年到 2005 年，中国的武器进口花费达 130 亿美元，其中 95% 的军事进口都来自俄罗斯。中方从俄罗斯购买的武器包括苏-27、苏-30 战机、“基洛”级潜艇，以及各种防空、反舰导弹等。报告还说中国在自行研制一些武器系统时一直借助重要的俄制部件，而且还在一些项目上获得了俄武器系统生产许可权。与此同时，中俄还在继续推进军事技术、设计、材料工艺等领域的合作。而《莫斯科时报》的报道也说华盛顿对北京的军力扩张以及俄罗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担心，一直极力说服俄限制对华军售。该报甚至称，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曾在莫斯科附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出售大量武器给中国，经济上的理由可以理解，但这会不会使亚洲更不稳定？如果台海爆发战事，将导致俄东部边界出现严重不稳定的局面。”<sup>①</sup>

而就学界来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看法也不甚一致。分歧主要表现在该如何看待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中俄之间合作的强项和不足又何在，未来发展趋势又将如何等问题方面。就美国学界来说，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研究中俄关系的区域问题专家（即传统的地区研究 Area Studies），以及从一般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角度出发考察中俄关系的学者，他们之间在观点和研究思路上也存在细微区别。近年来出现的美国研究中俄关系问题的新锐 Elizabeth Wishnick 的看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区域问题专家学者的观点。这派学者都怀疑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诚意，强调中俄军事合作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以及商业因素的影响，否定或低估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战略意义，他们的结论是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难以持久。像大牌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 Gilbert Rozman 与 Shermann Garnett 等大都如此。Shermann Garnett 早在 2000 年主编的一本很有影响的专门探讨中俄关系的书，就以“接近还是对手”为题作为书名，开始表达对中俄关系发展前景的疑虑。而 Elizabeth Wishnick 在《亚洲时报》发表的一篇专门评述中俄 2005 年军事演习的文章中，也认为中俄演习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俄罗斯希望训练其飞行员、测试武器装备情况，同时展示其先进武器以赢得更多中国市场。而中国则想借此机会对台湾和其他邻邦炫耀武力，以示吓阻。同时她还强调中俄双方在演习地点方面出现的分歧：俄罗斯最初希望在新疆，而中国则打算在浙江，最后选择了山东，同时俄罗斯也只提供了不到五分之一的兵力。此外这位学者还特意提到俄罗斯曾于 2005 年 7 月在远东地区举行过一次有近 5000 人参加的军事演习。她推测说俄演习有防范中国之意。她也认

---

① “美国紧盯俄罗斯对华军售 猜测中俄两国军事交流”，《环球时报》，2006 年 5 月 31 日。

为上海合作组织不会成为中亚的“北约”，原因在于中俄战略目标不同。<sup>①</sup>总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位学者强调的是中俄之间在军事合作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与此同时，她却只字不提中俄此次军事演习出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常规武器，甚至包括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远程战略轰炸机，演习项目则包括海上封锁、两栖登陆等颇有意向性的实战内容。这是这派学者研究的一个盲点，就是看不到俄中关系发展的潜力，而比较关注俄中之间的分歧与差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深入开展，美国有些学者也开始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观点。比如 Gilbert Rozman 教授在 2007 年接受《华盛顿观察》就有关中俄 2007 年联合军事演习的采访时，就认为此次军演的真正意义在于中俄美在中亚乃至世界舞台上的战略博弈。中俄军事合作更大的意义在于战略与外交方面，也即平衡美欧的国际影响力方面。Gilbert Rozman 认为中俄都支持国际关系多极化，双方的合作从经济外交深化到安全领域。联合军演是给美国看的，而上合组织为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一个战略平台。<sup>②</sup>

观点相对平衡的是 Lowell Dittmer 与 Bin Yu 等学者。比如 Bin Yu 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中俄关系的文章中就认为中俄关系既不是如有限派 (limitationists) 认为的那样缺乏互信没有战略价值纯然各自利用因而难以持久那样悲观，也不是如警戒派 (alarmist) 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双方走得很近的反美集团，充满威胁。本质而言，Bin Yu 认为中俄关系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既不是如中苏结盟时期那样来得亲密无间，也不是如冷战对峙那样剑拔弩张充满猜忌与危险，而是有合作、有分歧的正常关系。由于源自双方曾为之付出过惨重代价的长期历史经验，同时也由于两国关系在战略信任、边界稳定、不断提升的贸易与外交协调水平等制度化建设方面有足够基础，这种关系互惠互利，具有可控性与可持久性。具体就军事合作而言，Bin Yu 认为有几大特点，首先就是其商业性，这点区别于中苏 50 年代的军事合作关系，当时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第二大特点是军备转移的持久性。第三是多样性。简言之，当前的中俄军事关系远为复杂，多样，制度化。而且这种军事关系也更平等。不过作者还是认为俄罗斯对中国仍有戒心，但可控。<sup>③</sup>

---

① Elizabeth Wishnick, "Brothers in arms again", August 20, 2005,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GH20Ad01.html>. See Gilbert Rozman, "A New Sino-Russian-American Triangle?" *Orbis*, Fall 2000; Sherman Garnett, "Limited Partnership, Rapprochement or Rivalry?—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 edited by Sherman W. Garnett,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② “联盟升级？--西方媒体解读联合军演背景下的中俄关系”，《国际展望》，2007 年第 16 期，总第 570 期，第 12-15 页。

③ Yu Bin, In the Search of a Normal Relationship: China and Russia Into the 21st Century,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5, no. 4 (2007), pp. 47-81.

至于那些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析说明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也即试图回答这种合作的原因何在，影响又将如何等问题方面。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Robert H. Donaldson 和 John A. Donaldson 在《国际研究季刊》专门就中俄军备交易发表的一篇文章，此前Robert H. Donaldson曾就俄国内政治对其对外军备交易的影响写过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俄罗斯在九十年代中前期，由于其国内困难的经济，特别是军工企业面临的巨大困难，销售了不少武器给中国。其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和资源以稳定经济以及国内的军工企业。这位学者还认为，叶利钦曾运用与中国军火交易获得的资金来作为其 1996 年连任竞选的经费。<sup>①</sup>不过，后来普京上台后，抓强了国内管制，但中俄军备交易仍在增长，因此，从俄国内政治的角度考察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可能可以部分帮助我们理解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但并不全面。

在这篇新文章里，两位学者试图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寻找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解释。两位学者认为军备交易在俄中关系中所占位置十分重要，几乎构成中俄关系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追述了中俄军备交易的简单发展过程，认为 90 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快，国防经费足，而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当时相当不景气，因此商业考虑是俄罗斯出口军火给中国的主要原因，战略性不强。至于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因，两位学者首先考察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即就是那种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视作为衰败的俄罗斯寻求与上升大国中国的合作来共同平衡美国力量的解释。结果他们认为此种解释总的来说与实际并不相符。原因在于中俄之间缺乏明确的军事承诺，中俄关系演变的时间点也与美国单极世界的形成不合拍，而且中俄在发展彼此关系的同时又各自与美国发展了“追随强者 (bandwagon)”政策，最后俄罗斯的中长期利益似乎也不允许其与中国发展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接下来，他们又考察了均势理论的修正版，即“威胁均势论”的解释能力，结果同样如此。因为就总体实力，进攻性力量，以及地缘接近程度这些威胁均势论的创立者 Stephen Walt 认为构成威胁均势论的“三大要件”来看，都显示是中国而非美国是俄罗斯的潜在威胁。这两位学者接下来就引用了不少西方他们的同仁如 Stephen Blank、Sherman Garnett、以及俄罗斯一些学者在报纸发表的认为俄罗斯是在武装自己对手的观点。而如果加入威胁均势论的第四个因素，也即对攻击意图的认知解读( Perception of aggressive intentions)的话，那么这两位学者认为中俄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远景并不相容。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现状维持国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希望在欧亚文明之间扮演桥梁角色，而中国则是现状修正国家。他们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充满野心的

---

<sup>①</sup> Robert H. Donaldson, "Domestic Influences on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paper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ouisiana, 2002.

国家。接下来这两位学者又再次重复了那些讲中俄之间经济力量正在发生对比，中俄之间在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之间关系紧张，以及中俄之间在文化与心理层面缺乏信任的观点。如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威胁。接下来，两位学者认为建构主义解释也不甚合理，因为中俄双方在文化和共同规范方面鲜有重叠。最后，这两位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其中包括力量下降、国内政治、以及身份三大变量。就第一个因素来说，力量下降国家会选择与力量更大的国家结盟以维持其影响。就第二个因素来看，西化派、实用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东正教民族主义者三股俄罗斯国内势力在争夺影响，同时俄军工企业也有影响。而在身份方面，俄罗斯仍然视自己为大国，中国的身份则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亚洲强国身份，也会导致与美国冲突。而美国的“全球警察”身份则激化了俄中合作。

此处两位学者似乎模糊甚至无视了中俄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在夸大乃至制造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因为就“威胁均势论”的三大构成要件总体实力、进攻性力量、以及威胁认知来看，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在总体实力、进攻性力量方面远在中国之上。而就威胁认知来看，迄今为止，除了那些边远省份的个别领导人出于选举考量或其他原因曾公开发表过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外，俄罗斯政府从未发表过此类看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普京等俄方领导人对“中俄关系是历史最好”的不断重申以及频繁亲热的高层互动。而对美国及其单边主义，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政府则毫不客气地加以指责，甚至公开以“豺狼”相称。至于剩下的可能如两位学者认为的那样使得中国成为对俄威胁的所谓地缘接近因素，也一方面由于中俄边界的完全法定化和清楚界明以及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而对中俄关系变得不甚具有威胁性。更进一步，实际上由于现代武器的发展，特别是海空力量长程投射能力的空前加强，Walt 原版威胁均势论中的地理接近因素的影响力也因此大为下降，如果不是不再相关的话。因此仅仅由于中俄在地缘方面比邻而居，就据此断言中国构成俄罗斯的威胁，理由似乎不够充足。

同样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不过更多的是讨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全球性影响问题，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颇有前途的新锐Stephen G. Brooks 和William C. Wohlfort 与老资格的国际关系学者Robert Art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Stephen G. Brooks 和William C. Wohlfort看来，尽管表面上中俄之间以条约形式开展的军事合作似乎会导致力量的相对转移，因此构成了对美的某种均势行为。但实际上，这两位学者认为，中俄关系中的所有三大要件，包括外交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军备交易都不构成对美国的软均势行为（Soft balancing）。因为尽管中俄口头上追求多极世界，但中俄都设法避免出现双边关系的密切发展导致危及各自和美方关系的情况。中俄之间在2001年签订的条约也没有具体载明在对抗美国的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明



确分工和任务。加上俄中经济联系松散，各自又缺乏互信，特别是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因此俄罗斯更愿意出售更先进的武器给印度而非中国。而上海合作组织更大程度是中俄考虑联手遏制中亚伊斯兰分离恐怖势力的需要（新疆，车臣，西藏等），缺乏均势潜质。9·11事件后，中俄争相向美国示好，便反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非均势性质。而真正具有均势意向的中俄军备交易，在这两位学者看来，也并非如此。因为从俄罗斯而言，更多的是出于挽救其日趋衰败的军工企业的经济考量。如果说构成对美均势，那至多是间接地形成了对美之均势结果。而中国尽管具有防止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战略考量，但由于中国的此种立场和策略自1949年起就一直如此，因此与1991年之后才出现的单极世界和美国的全球行为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的结论是，中俄合作是地区性因素外加经济考量因素的影响所致，均势性不强。<sup>①</sup>

而美国老资格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Robert Art则在《Striking the balance》一文中，对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关键不在于俄罗斯是出于何种动机出售军备给中国（是经济原因还是均势考量），而在于中国是出于何种动机购买这些武器。就此点而言，Art认为两位学者从中国的此种考虑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从而将中俄之间显而易见的均势行为排除在外是既不相关又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只要一国军事力量的提升使其在应对另一国的力量和威胁时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这便构成了均势行为，不论其开始的时间如何，出于什么原因，是否真心实意如此。从这个角度看，Art认为中国自90年代以来加速的军备建设，特别是1996年台海危机后军费开支的激增，与俄日渐紧密的军事交易，及军备交易的对象—海空力量，等正是阻止美国在台海介入的均势行为。Art也认为，是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背后的动机更为重要。由此来看，只要中国力量的提升影响了其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便构成了均势行为。<sup>②</sup>

## （二）俄方观点

至于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也稍微有些分歧。主流的观点认为，中俄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因为符合双边利益。比如，前苏联国防情报分析官员Andrei Devyatov，就视中国的崛起为俄罗斯的机会，他主张中俄联手建构多极世界平衡美国影响。<sup>③</sup>有些学者如俄罗斯前杜马副议长米哈伊尔·尤里耶夫，甚至主张中俄建立完全的军事同盟。

---

①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② Robert Art "striking the balance", in Robert J. Art,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 3 (winter 2005/06), pp.177-185.

③ "Russia Play the China Card," *the National Interest*, p.71

尤里耶夫曾在俄国“侧面”周刊发表题为《中国威胁论的真相与神话》的文章。文章对种种中国扩张论的神话，如中国蚕食远东的神话，中国领土不够的神话，中国谋求霸权的神话，进行了十分有力的反驳。作者认为西方包括美国有意在中俄之间制造矛盾，在俄罗斯制造中国威胁论。而实际上，作者认为西方是俄中的共同敌人，表现为西方扶植俄反对派，支持分离主义者和恐怖势力来控制肢解俄罗斯。而中国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也将必然遭到美国升高的压力，如限制中国对欧美的出口，提升台湾军力；民主人权上攻击中国，扶持持不同政见者等。作者因此建议中俄结成联盟，此种联盟不是像前苏联或欧盟一体化那样的联盟，也不是类似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经济联盟，而是普通的军事政治联盟。此种联盟关系确保完全的军事互动，包括提供核保护伞、在世界大洋划分巡逻区和协调武装力量行动。联盟内的军事技术合作应提上新高度，甚至转向核武器领域。作者也认为，由于中俄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双方在国际金融体系方面的合作也将有一定效果，因此应该鼓励。最后作者也提及了中国对此种中俄军事同盟建议的接受度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应该会同意，因为符合中国利益。

莫斯科战略与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基延科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他同样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构成俄罗斯威胁的观点，马基延科认为中国有不少自身的问题需要处理，包括环境问题、贫富差距、执政党面临的经济发展压力等。中国面临的众多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内部事务方面。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考虑对象主要是台湾。因此，中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是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有助于减轻人口和经济方面压力的中俄之间的贸易，其中包括武器交易，都是俄罗斯应该欢迎的。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可以帮助俄罗斯的军工企业获得订单维持生产，并进而开发新技术产品。作为结论，马基延科认为俄罗斯应该提升出口给中国的武器装备的质量，包括考虑向中国出口图-22M3 海军轰炸机、949 和 971 核动力潜艇等先进武器。<sup>①</sup>

也有少数比较偏执的亲西方的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构成对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比如莫斯科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in Moscow）Andrei Piontkovsky，就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构成俄罗斯的最大威胁，而克里姆林宫由于只关注美国和西方从而忽略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作者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有领土野心。他举例说，中国曾于 2006 年 9 月在毗邻俄罗斯举行过为期 10 天的军事演习。他认为演习对象便是莫斯科。作者还认为中国竭尽所能强化俄罗斯的反美情节制造美俄

---

<sup>①</sup> Konstantin Makiyenko, “The Russian-Chinese Arms Trade: an Attempt at Qualitative Analysis: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Chinese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Moscow Defense Brief*, 2004, <http://mdb.cast.ru/mdb/2-2004/at/rcat/>

对抗，以将俄罗斯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作者更指责中国在中亚充满野心，无视乃至牺牲俄罗斯的利益，妄图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以保证能源的供应。因此，中俄可能在中亚引发冲突。作者建议俄罗斯改变其愚蠢的对美政策。<sup>①</sup>

俄罗斯研究中俄关系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Alexei Voskressenski 对于中俄关系与双边军事合作的观点相对平衡。他在《中国的崛起与东亚新全球政治下的俄中关系》（*The Rise of China and Russo-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Eastern Asia*）一文中指出，俄中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内向型的，即以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优先，而非针对第三方。尽管这可能导致了他们与西方关系的紧张，但这不是俄中伙伴关系所追求的，而是俄中两国关系深化发展的副产品。因此这位学者认为俄中伙伴关系并不是反西方或反日本的集团。从俄罗斯角度看，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双方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平等的而不是上下级的双边关系形态，此种关系有助于发展新的公正的世界秩序，其中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将得到考虑，而不论其大小。这些观点是富有前瞻性的。不过，这位学者还是警告，随着美俄关系、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如果华盛顿仍一意孤行，追求单边安全，拒绝接受俄罗斯与中国有关建立一个对他们安全威胁更少的安排要求，中俄对美国的威胁认知很容易转变成为强化他们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迄今相对较弱的中俄军事同盟很可能因此向强势军事同盟发展。尽管如此，这位学者还是认为美俄中日并不必然成为对手，因为他们可以寻找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通过共同努力，可以构建一种对所有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发展的国家都有利的世界和地区秩序。将崛起的中国融入区域和全球安全体系，而不是依靠美日韩军事联盟来遏制中国，对区域安全制度缺乏同时又被战略猜疑与历史包袱困扰的东亚与东北亚地区而言尤其显得重要。

不过，这名学者在其文章中还是颇为现实地指出，由于它们不同的地缘位置和国内情况，中俄两国的战略利益并不完全重合，中俄战略合作并不能够涵盖他们外交关系的所有层面，也不能够成为它们各自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Alexei Voskressenski 在文章中还用了一些篇幅来阐述俄罗斯存在的“中国威胁论”问题，而其本人在这个问题的上则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出发，他看到了中俄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中国会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有趣的是，这位学者在阐述“中国威胁论”时，有些观点与前面讨论过的美国学者 Robert H. Donaldson 和 John A. Donaldson 所提到的中国威胁论的说法，颇为相似。

---

① “China’s Strategic Threat to Russia”, *The Korea Herald*, August 27, 2007. 作者该篇文章也发表在 *The Japan Times* 以及泰国的 *The Nation* 上。

比如，Voskressenski 认为由于中国的总体实力，攻击性力量，特别是地缘接近因素使得不少俄罗斯人将中国视作潜在挑战，危险甚至威胁（这些观点与前面提到的来自美国的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就颇为相似）。不少俄罗斯的政界或军界人士担心在俄罗斯自身在东部海军和核力量很为弱小的时候出口优先级武器与技术给中国会危及俄罗斯安全。这位学者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保有兴趣，而俄罗斯出于经济因素以及俄罗斯部分外交和军事团体的意识形态动机，也有利益从事此种交易。但广泛的俄中军备与技术合作从长远来看将改变东亚、东南亚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平衡。可惜，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倾向于从短期角度思考。尽管如此，这位学者还是认为，由于在东亚地区只有中国支持俄罗斯力量在东亚的发展，因此俄罗斯与中国的军备交易和合作以及将来的能源出口，可以被看作是俄罗斯为此付出的代价。

该名学者同时还强调了中俄之间的战略取向的差异，并再次谈及了“中国威胁论”。他认为俄罗斯为现状维持国，而中国为现状修正国家。俄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逆转，以及俄中两大社会之间的理解的缺乏等老问题，也被认为是中俄之间利益不重合的表现。在论述中俄利益不重合的结论部分，这位学者认为俄罗斯主流的军事战略学者认为中国近期外交政策的主要抱负是指向台湾和南中国海，从而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稳定方面的利益并不矛盾。但实际上，中国提升的力量及其战略主张向地区性及有限性战争方向的转变，以及军力发展中强调机动性、致命性及预防性攻击等，也许会在该地区激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尽管如此，作者认为那种认为出口俄罗斯武器给中国会危及亚洲脆弱的军事平衡，甚至因此卷入中国与台湾、越南、日本，以及最终美国的领土冲突的俄罗斯学者是明显的少数派，他们的观点也不代表俄罗斯学界的主流。（这里这位学者提到的俄罗斯为现状维持国，中国为修正国，以及中国发展军事力量强调机动性、致命性与预防性攻击从而构成对俄罗斯威胁的观点，也与 Robert H. Donaldson 和 John A. Donaldson 的文章中的观点相似。）

### （三）中方观点

中国学界的观点总体是谨慎乐观，基本认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由于俄对中国战略信任度不够，中俄军事合作受到一定制约，合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比如中国学者杨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既表现在高层互访、安全与战略协商等的制度性安排方面；也表现在军备交易、以及演训合作方面。作者认为，中俄军技合作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它可增强互信，促进中俄两国的军事现代化，也为俄开拓军售市场，保持军工生产和科研潜力创造了条件。中国宜在不结盟的原则下、在国家总体安全利益的需要下推进中俄

军事合作。作者还认为中俄军事合作受到一些包括“中国威胁论”等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俄对中印在军售方面的差别对待，表现于武器质量方面。其原因作者认为是在于俄印为伙伴，而俄视中国为潜在对手，有戒心，希望始终保持“至少15年左右的军事技术优势。”<sup>①</sup>

而中国学者朱锋发表的一篇专门评述中俄2005年军事演习的文章也认为，“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是中俄两国和两军为贯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两军防务合作水平、共同承担维护东亚地区安全责任而采取的常规性联合军事演习。朱锋认为，中俄联合军演具有重大的战略与政治意义，特别是具有遏止台独势力发展的军事意义。它也标志着中俄防务合作已经开始超越装备人员交流，而进入更高水平的合作层面。<sup>②</sup>《国际展望》杂志，也以“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跨国联合军事演习”为题对中俄军事演习作了专门报道。<sup>③</sup>另外一篇《舰船知识》的分析文章详细介绍了此次军演的背景以及俄罗斯参演部队的历史沿革和演习的过程。文章分析认为，关注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包括恐怖主义，美国对朝核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可能介入，以及美国军事扩张对中俄在中亚、东欧与日本台海的战略挤压等，是此次中俄举行联合军演的主要考虑所在。不过，文章最后还是提出了中俄合作能走多远的问题，作者认为俄罗斯是“墙头草”，西方美国可能“搅局”。文章建议，中俄关系应该提高各种技术能源和贸易的交流合作，使中俄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战略关系，这样会有利于中俄军事与战略关系的发展。<sup>④</sup>

#### 四、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出现的新问题及其潜在原因

##### （一）军备交易量下降

从2006年至今，中俄两国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遭遇到不少问题。首先是中国进口军事装备的订单大量减少。从1992年到2006年期间，中国将近占俄罗斯武器出口总值的一半。但这一情况在2007年开始发生变化。俄罗斯在2007年的武器出口总值为75亿美元，其中印度占28%，而中国为21%。就2007年俄罗斯新签订的武器出口合约而言，其合约总额为55.2亿美元，其中中国仅占6%，远少于印度的73%，

---

① 杨晖：“中俄军事安全合作概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1期，第87—88页。

② 朱锋：“中俄军演向世界展示什么？”，《中国报道》，2005年9月，第20-22页。

③ “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跨国联合军事演习——和平使命2005年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独家报道”，《国际展望》，2005年8月，总第522期，第16-19页。

④ 高月：“合作、联盟、还是做秀——解读中俄联合军事演习”，《舰载武器》，2005年第8期，第12-14页。

甚至还不如排名第二的印度尼西亚的 8%。<sup>①</sup>武器订单下降的原因可能与中国在此前的十多年间已经购买了大批俄制武器，某些武器装备已达饱和状态有一定关系。不过，很多报道分析说，中国订单下降也与俄罗斯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质量不够高有一定关系。俄罗斯的军工集团主要给中国提供苏联时代开发出来的武器装备，而中国希望得到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由于中国自身武器研发能力的提升，中国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另外的说法是，中方订单下降的原因是俄罗斯未能按合同兑现交付中方购买的 38 架伊尔-76MG 和伊尔 78MK 飞机。俄罗斯方面称由于厂家搬迁等原因，要求在合同最初价格的基础上再提高 30% 左右。这让中国不满，中方决定，在俄罗斯完成这个合同之前，中方不再与俄签订大型合同，只进口一些子系统和关键零部件。<sup>②</sup>

## （二）双方围绕价格、技术转让及知识产权问题有些不同声音

中俄双方围绕俄出口武器给中国的过程中出现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产生了一些争议，有些不同意见。部分俄罗斯军方人员与厂家代表抱怨中国没有很好地保护俄罗斯军工产品的知识产权。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对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颇有微词。俄罗斯梅德韦杰夫首次访华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便表示“中国人购买了我们的装备和机器，我们的专有技术，接下来便将它们完全拆卸，再在他们国家生产同样的产品。”而且这个代表团成员还说中国人向来如此，没有办法应对。不过对于这种观点，不少俄罗斯官员与专家并不赞同。比如苏霍战机生产集团的总经理便认为，由于是他们集团根据许可证在中国生产苏-27 型战机，这一定会影响中国的航空工业，对中国的飞机设计制造生产发生些影响不足为怪。同样俄工业与能源部长科利斯坦科也认为技术产权问题很敏感。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话，发生一些技术学习也是正常的。<sup>③</sup>

## （三）合作研发部分受阻

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中国目前并没有收到参与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研发邀请，而印度却已经收到了正式邀请。这也让中国有些不满。在 2006 年珠海国际航空展上，当时负责对外武器出口工作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领导曾表示，俄罗斯正在考虑邀请中国参与第五代战机的研制工作。但后

---

① “Preliminary Results of Russia's Arms Trade in 2007,” *Moscow Defense Brief*, vol.10, issue 4 (2007).

② “中俄武器交易来到十字路口？美国专家展望中俄军售新格局”，《国际展望》，2007 年第 8 期，总 562 期，16-21 页。

③ “Russia and China Dispu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Kommersant*, May 24, 2008.

来实际情况是，仅印度收到了参与第五代战机的研制邀请。俄罗斯与印度政府在 2007 年签订协议，共同开发第五代战斗机以及多功能运输飞机的协议，使得印度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武器伙伴。<sup>①</sup>根据外电的分析报道，中国未获邀请，原因是俄内部存在分歧。第五代战机的研制费用相当昂贵，每年大约要花费 10 多亿到 20 亿美元，而中国在资金、人员和军事素质方面，本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合作伙伴，所以俄军工企业和航空设计局希望中国参加。但据说俄军方内部认为中国是潜在威胁，对此坚决反对。结果中国没有在被邀请之列。俄罗斯亚非国家研究所副所长 **Andrey Krarneev**，就曾说“我们不只一次武装过中国。在 1960 年代，这些武器被用来对抗我们的边防部队。这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但俄罗斯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时仍然小心谨慎，因此俄罗斯不想将其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中国。”<sup>②</sup>实际情况似乎也是这样，或出于对中国的猜疑，或由于其它原因，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有不少的限制与保留。<sup>③</sup>比如俄方多次拒绝销售诸如苏-30、苏-34、苏-35 和苏-37 等先进战斗机给中国，与此同时，俄方却向印度，阿联酋和南韩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出口此类战机。

#### （四）军事技术合作分委会暂时停开

最后，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在 2006-2008 年期间也没有召开过会议。其原因，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源说，是由于俄罗斯军方领导人的更替所致，不过后来有消息说，原因是因为北京要求俄罗斯提高其出口给中国的武器的质量。特别是由于在 2006 年中国测试的装载在 956EM 巡洋舰上的 Moskit 导弹与 636 舰船上面的 Club-S 系统都出现了问题，中国对此不满。总之，自 2005 年 9 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在俄罗斯的索契联合主持中俄政府间第十二次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分会会议便没有再度召开过。这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发展影响不利。

### 五、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对策：

#### （一）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对中国国家利益关乎重大，值得重视

中俄军事合作关系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

---

① Konstantin Makienko, "Russo-India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New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Moscow Defense Brief*, vol. 10, issue 4 (2007).

② [http://www.kommersant.com/p763776/r\\_529/military-technical\\_cooperation\\_China/](http://www.kommersant.com/p763776/r_529/military-technical_cooperation_China/).

③ 郑宇硕：“21 世纪初中俄关系的挑战”， 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 681-682 页。

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国际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制约，可以发挥相当重大的作用。中国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即便现在台海趋势趋缓，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稍有改善，情况依然如此。因为中俄之间的紧密合作，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仍是各自与美国打交道的相当强有力的筹码和手段，没有任何理由由于与美国的战略关系的发展轻视乃至放弃发展深化中俄军事方面的合作关系。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没有面临重大迫切危险的情况下，发展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对中国而言显得非常重要。实际上，中国已经与美国发展出了非常紧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贸易人员交流关系，此种经济贸易关系对双边来说都关乎重大，某种程度上中美甚至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现阶段中国与美国在共同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货币秩序，维护亚洲的稳定和现状，维护现有全球体系，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共同性。此种背景，使得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全球性反美反西方军事集团，既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美国对华政策、遏制崛起中国的态势，抱任何天真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中美两国没有利益冲突，美国与西方会张开双臂，欢迎接纳中国以平等伙伴加入它们主导的世界体系，同样是不现实的。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注定是一个与美国这一世界超级霸主利益不断交换的过程，尽管这一权势转移也许不会如历史上的霸权更替那样以战争形式出现，但也绝对不会是一个没有利害冲突的过程。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在今后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压力与挑战将会越来越大。像尽管改善但迄今仍然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美国与欧洲越来越关注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中国内部的经济开放及汇率确定问题、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与美国和西方的立场差异与利益冲突问题、能源问题、中国的内部政治改革步伐与民主人权问题、随着中国国力提升而导致的与美国全球经济金融利益的可能冲突问题等许多方面，中国都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如何成功应对这些压力与挑战，实现和平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拥有自己的对话和谈判筹码，以及一定的力量基础和可靠依托，就可能可以增加中国应对压力的能力，提高中国的战略转换灵活性和弹性。在这方面除了现在已经拥有的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之外，发展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特别是军事技术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中俄军事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都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必须予以重视。这不影响中国发



展全方位外交，中俄军事合作的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恰恰能够帮助中国发展全方位的外交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谐外交创造良好条件。为能源问题的解决提供良好条件。不过，在中美关系改善，日趋正常化，双边的经济联系又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处理中俄美三边的微妙关系要求特别注意策略和外交艺术。在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同时，又不能危及中国更为根本的国家经济发展、对美关系的大计。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中俄两国都反复强调中俄关系的发展是不结盟、不针对第三者，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助于消除美方对于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不必要的战略疑虑。同时中俄之间军事合作也不能过于张扬，如此可以帮助避免刺激中美之间、美俄之间陷入冷战对立零和游戏的安全困境。

## （二）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乃至腾飞，俄罗斯崛起重回世界中心舞台的态势变得日渐明显。如著名俄罗斯专家王海运教授分析的那样，俄罗斯崛起的姿态甚至显得有些“张扬”。<sup>①</sup>而美国的对俄战略目前似乎仍是维持其超强地位，继续扩大其冷战结束后的战略优势，推行北约东扩，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中亚发动颜色革命，以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由于俄罗斯的战略参照系是刚刚解体不久的前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对自身国家利益界定的摇摆不定，而美国则由于其冷战胜利者心态，希望俄罗斯以法德这样“小伙伴”的国家身份加入美国与西方主导的欧洲和世界秩序，从而也难以对俄罗斯待之以伙伴平等之道。<sup>②</sup>加上俄美关系又缺乏现在中美之间具有的密切经济联系来缓解可能冲突，因此如 2008 年格鲁吉亚的隆隆炮声所昭示的那样，正在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挤压似乎越来越难以容忍，俄美纷争似有深化的可能，尽管未必会以新冷战的形式出现。此种情况下，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借重，将可能加强。这将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军事技术合作的深化，创造现实可能性。

再从俄军事技术发展角度看，随着俄经济复苏，俄罗斯开始加大对军工研发的投入力度。俄罗斯的国防预算从 2000 年的 74.8 亿美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300 亿美元，翻了四番。2006 年 6 月，俄政府拨款 49394 亿卢布（相当于 1860 亿美元）用于军备购置和研发，其中的 63% 用于购买新式武器和装备，剩下的 27% 用于国防研发。俄

---

① 王海运：“俄罗斯快速崛起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人民日报》，2008 年 5 月 13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7231327.html>。

② Dimitri K. Simes, "Losing Russia: The Costs of Renewed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7.

罗斯也加大了对军工生产企业的整合力度，组建了一系列庞大的联合军工生产巨型企业。俄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委员会（Military-Industrial Commission）（MIC），来协调军工企业和军事采购之间的关系。可以预期，在这些措施的贯彻之下，俄罗斯军工产品的研发在未来将可能取得长足进展，从而也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深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sup>①</sup>实际上，最近的消息报道说，俄罗斯方面对于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停滞局面有些担忧，于2008年6月份派遣俄防空兵主任局局长弗罗洛夫上将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希望重振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该代表团除了了解中国军队装备的俄产防空导弹系统的作战使用与技术维护情况、以及为最后一批S-300PMU2“骄子”防空导弹交货热身之外，还将与中方讨论出售最先进的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给中国的事项。<sup>②</sup>这一发展表明，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仍然具备相当的开发潜力。

### （三）进一步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对策

#### 1、从发展中俄边境自由贸易区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层次、分阶段消除中俄战略互信不足

那么如何改变目前中俄之间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充分发挥中俄之间军事技术合作的潜力，进一步深化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关键是如何处理应对前面不少美国和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提及的目前在俄罗斯依然部分存在的“中国威胁论”问题，也即深层次上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度不够的问题。其中一种可能的思路就是，从中国全方位的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出发，从欧洲和东南亚的安全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汲取有益经验与教训，构建深化战略共识，超越过去有些简单的相互利用层面的关系，在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但又进一步追求中俄双边关系的深化发展，为中俄军事、能源领域的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双边关系环境基础上，发展中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使得中俄之间形成一种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俄双边2001年友好条约的签署，中俄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以及一系列边界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都在某种程度上为下一阶段的深化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中俄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具体而言，如有些学者建议的那样，可以从小规模的贸易自由区入手，发展到建设中俄远东自由贸易区，充分利用中国人口资金相对充足，俄罗斯资源技术有优势的特点，加强两国边

---

<sup>①</sup> Ruslan Pukhov and Mikhail Barabanov, “Challenges to the Reform of Defense R&D in Russia,” *Moscow Defense Brief*, vol. 7, no. 1(2007).

<sup>②</sup> “俄担心中俄军备合作滑坡，派上将访华欲扭转局面”，中国网，2008年6月22日，[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8-06/22/content\\_15868126.htm](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8-06/22/content_15868126.htm)。

境地区的经济合作，推进中俄经济一体化进程。<sup>①</sup>

实际上，不少中俄关系问题专家以及政界人士，都建议中俄两国通过加大区域经济合作力度，以增进互信，同时化解彼此之间的误解与威胁认知。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院的波波罗便是如此建议的，他说，“有充分理由相信，俄即便认可中国的崛起，遏制或与中国对抗也不太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政策选项，相反与中国在能源、远东开发、太空、原子能等领域加强合作可能最有可能中立化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波波罗进而指出，“实际上，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化解‘中国威胁’的最好的方法是将北京更为紧密地纳入泛亚能源和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方面，如此可加快促进将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转变为一个充满商业机会的地区，其中所有的参与方对维持该地区的稳定都有责任。当地基础设施方面建设的加速发展可能导致合作，进而吸引俄罗斯人及投资进入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从而淡化消除这一看似难以化解的安全问题。在更为宏观的经济层面，双边贸易联系的进一步扩展——不仅仅是在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在空间合作，原子能以及民航运输领域——将给俄罗斯带来更为强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以维持与中国良好的双边关系。”<sup>②</sup>俄罗斯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Alexei Voskressenski 似乎也持同样观点。他写道，“在俄罗斯决策层看来，俄中伙伴关系的目的是通过经济联系，来强化地区经济，经济多边主义，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经济纽带，从而将东北亚地区的议题从传统的安全合作转向促进地区经济发展。”<sup>③</sup>马基延科似乎也认同这种思路。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俄罗斯天然垄断委员会主席雷日科夫也认为由于俄罗斯需要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省的资金、技术、商品和劳务，而中国东北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尤其需要俄远东地区的石油、木材、矿产资源。因此，两地的发展振兴战略应当实现互动、对接，中俄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应当实现战略升级。<sup>④</sup>而按照俄罗斯“2008——2013 年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纲要”，俄罗斯计划投资 220 亿美元，加强远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俄将在这一地区修建 6600 公里铁路、5100 公里输电线路以及 400 公里公路，新建 17 个支线机场和 10 个海港。中国的企业可以参与到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来。这也将为中俄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深化，战略互信的增加提供机会，创造条件。

## 2、充分利用双方专家学者共同体的交流往来，增信释疑

---

① 赵洋：“辟建‘中俄远东自由贸易区’问题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 年第 1 期，第 19-22 页。

② Bobo Lo, "The Long sunset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Russia's evolving Chin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0, no.2 (2004), pp.295-309, p. 305.

③ Alexei Voskressenski, "The Rise of China and Russo-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Eastern Asia", p.9.

④ <http://heilongjiang.northeast.cn/system/2008/06/14/051317500.shtml>, 2008 年 6 月 14 日。

化解中俄之间的战略猜疑不信任的第二个可能思路是，除已经拥有的中俄官方半官方的各种制度化非制度化交流渠道之外，进一步发挥学者专家们的意见，通过诸如“专家学者群”这一可长久存在发展，同时又保有相当灵活性与机动性的社会性学者之间来往的活动，从而加强交流，增进共识，消除疑虑。实际上，据学者们的研究，以学者专家组成的网络，也即专家学者共同体，可以增进互信，减少战略不确定性，加强政策协调。因此，中俄双方通过加强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人文社科领域学者间的经常性互动交流，也将有助于双方增信释疑。

### **3、强化中俄一般性科技合作，以“溢出”效应服务于军事技术合作**

第三个思路是促进中俄之间的一般性科技合作，以“溢出”效应来一方面消解俄罗斯对中国的信任，另一方面改变单方面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局面。目前俄中两国在70多个基础科学领域有合作项目，此外在航空航天、新材料开发、农业技术等实用性科技领域也有合作。中俄政府间科技合作计划的项目累计已有几百个。合作形式也包括政府间的合作，部门与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科研单位之间的直接合作等。鉴于俄罗斯存在的雄厚的科研实力，中国也在大力倡导科技兴国，如果政府能加大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对俄合作和资金投入的力度，着眼周期长、投入大的大项目的合作，中俄之间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潜力是相当可观的。双方富有成效的科技合作，也将为中俄之间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 **4、加强与俄军工企业交往，把握趋势，适时合作调整**

第四个思路是，扩大与俄罗斯各军工企业团体的交往。如此一方面有助于帮助中国了解俄罗斯的军事发展态势和方向，另一方面帮助中国与俄军工巨头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未来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尽管俄罗斯加强了政府管制，在2006年5月，俄政府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委员会（Military-Industrial Commission）（MIC），负责协调军备的研发和生产、动员训练、军事工业技术的开发以及武器进出口的监管。但俄军工企业在俄罗斯政府的内部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视。据说印度与俄罗斯的军备交易关系就与俄军工集团和印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有关。印度在这方面的经验也许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 **5、努力改善与欧美等国的军事关系，多渠道拓展中国军备合作对象**

第五个思路是，就军备交易也是一种商业往来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开拓更多的军备采购对象，相对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进口依赖程度的话，可能也有助于中国在与俄罗斯进行装备交易时讨价还价。俄罗斯出口到印度的武器性能优于中国，固然与俄印关系密切有关，但与印度的买主选择的多样性也不无关系。印度尚有法国，英国，美国等市场可以选择，因此讨价还价能力较之中国要强。如果中国与西欧和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事关系得以改善，使得欧美取消他们1989年制定的对华

武器禁运的话，那也许也将有助于加强中国对俄罗斯军事合作的讨价还价能力。不过这方面的难度似乎比较大，也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的努力。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process,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Chinese-Russia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Then,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attitudes of the U.S.A., China and Russia towards Chinese-Russia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different viewpoints within the official and academic circles both in the U.S.A. and Russia.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regarding Sino-Russia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which include declining trading volume, differences in prices,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tc.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potential and prospects of Sino-Russia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remain favorable,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for deepening Sino-Russia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

（责任编辑 常喆）

## 博洛尼亚进程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空间

杜岩岩 张男星\*

**【内容提要】** “博洛尼亚进程”是数个世纪以来欧洲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结构变革。2003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俄罗斯也加入到了这一计划之中。在取得一些积极成效的同时，整体的发展并不顺利，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教育界的不积极。追踪俄的博洛尼亚进程，有助于提高中俄教育交流的针对性和成效。中俄教育交流合作有着众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并在合作办学、人才交流、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着相互认知、留学生培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关键词】** 博洛尼亚进程 中俄教育交流 合作

**【中图分类号】** G513.3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1-0117-(18)

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教育资源的流动和重新分配，推动着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加速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全球化对中俄两国教育制度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教育按市场化方式运作；二是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链接；三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在世界教育服务市场上，中俄两国均处于“弱势”地位，突出表现在教育产业意识和抢占国际市场的观念薄弱，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有待完善，办学主体的责权关系不明晰等方面。近年来，为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中俄两国都积极实施了旨在加入世界教育空间的国际化战略，为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空间的拓展与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之初，为重塑苏联时期的强国威望和保持“头脑托拉斯”的国际领袖地位、提升本国教育在世界教育服务市场的地位和份额，俄罗斯实施了旨在加入欧洲教育

\* 杜岩岩，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张男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一体化进程的博洛尼亚改革，从而构筑了与世界进行广泛对话和交流的空间。

## 一、博洛尼亚进程中的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

1999年6月，欧洲29个成员国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城市博洛尼亚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标志着欧洲教育体制改革“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即“博洛尼亚进程”的开始，并提出2010年欧洲将建成统一的教育空间。《宣言》还要求要更加关注教育，增加财政投入；提高欧洲公民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研制欧洲统一的高水平的教育标准；鼓励教师、学生和教育管理人员的流动；实行新的“358学制”。《博洛尼亚宣言》倡导促进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形成，并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核心内容：

- 实施学士—硕士两级高等教育学位体制（哲学博士的培养视为高等教育的第三阶段）。

- 统一欧洲样式的高等教育证书附录。

- 采用学分转换系统（ECTS），统一大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量化指标。

- 借助于相互承认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和保障教育质量。

“博洛尼亚进程”是数个世纪以来欧洲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结构变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促进欧洲成为社会政策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增长的强势地区；另一方面，使欧洲的高等教育在智力、资金和声誉上更具竞争力。2003年9月18—19日，在柏林“博洛尼亚改革”成员国高等教育部长会议上，俄联邦教育部部长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这一决定载入了“欧洲国家高教部长会议公报”并巩固了俄罗斯作为欧洲教育共同体成员国的地位，同时也宣布了未来几年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加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

### （一）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的动机和意义

#### 1、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欧化”是其历史长河的主流。普京执政后也多次强调斯拉夫文明与欧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对于站在特殊的欧亚道路上的俄罗斯来说，如何迎接《博洛尼亚宣言》的挑战，是继续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教育体制还是积极的参与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是很重要的抉择。我们认为，除了地域因素和历史原因之外，俄罗斯选择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因为在政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迫切需要在文化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里加强合作。目前，俄罗斯

仍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前景很难确定。近年的经济发展更多的依赖于能源领域的增长，其他领域继续处于疲软和衰退状态。在目前的条件下形成一个持续增长的教育服务和稳定的劳动市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是俄罗斯与欧洲实现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要。

## 2、高等教育转型的需要

从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来看，传统的俄罗斯大学是知识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学提供一系列的理论知识和较少的实践技能，毕业生不能立刻进入企业的具体工作角色。然而，经济领域的变革导致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企业要求毕业生具备的整体综合技能在大学的理论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是学不到的。俄罗斯没有规定大学生的职业技能考试，毕业生得到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后即获得职业资格。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俄罗斯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因此，俄罗斯把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注重职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高等教育走出学术篱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改革措施。这是与欧洲国家即将实施的“职业资格学位”和“博洛尼亚改革”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吻合的。因此，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是俄罗斯高等教育适应新经济，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所在。

## 3、参与世界教育服务市场竞争的需要

随着全球教育市场的形成，教育服务领域的国际竞争不断扩展，欧美等国家都力图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美国大学在国际排名中的优势，反映出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吸引力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外国留学生分配的不均衡。为缩小这一差距，提高在世界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力，欧洲将教育市场的一体化作为伴随欧洲内部一体化的逻辑阶段，甚至是提高欧洲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工具。正如俄罗斯学者别利亚耶夫所言：“欧洲教育一体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欧盟主导国的高等教育领导层希望建立一个旨在吸引国外留学生自费留学方面能与美国高等教育竞争的体制（本国公民教育是免费的，或者通过长期无息贷款获得）。”<sup>①</sup>

苏联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是举世公认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动荡导致了教育的衰退，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sup>②</sup>在 2007 年上海交通大学组织的大学排名中，进入前 500 名的俄罗斯大学仅有 2 所：莫斯科大学（第 77 位）

---

① Беряев В. Боло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попытка конкуренции//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2006. №4. с.33-41

② О состоянии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www.ifri.org/files/Russie/ifri\_jean\_obrazovanie\_sent2006\_rus.pdf



和圣彼得堡大学（第 341 位）。<sup>①</sup>这两所大学在 2006 年“泰晤士教育增刊”排名中位居前 200 强中的第 93 位和第 164 位。<sup>②</sup>在 2007 年这一排名中，俄罗斯大学没有进入前 200 强名单。随着苏联的解体<sup>③</sup>，俄罗斯外国留学生数量成倍缩减。目前，外国留学生数量仅仅约占俄罗斯大学生总数的 1%（法国是 11%）。2006 年俄罗斯接收的外国留学生 52300 人，英国—275000 人，法国—265000 人，德国—255000 人。<sup>④</sup>外国留学生人数的下降，不仅仅使俄罗斯丧失了经济收益，还将会危害国家安全。如果从人口下降和适龄大学生人数缩减来看，降低了俄罗斯对世界的“软影响力”。造成俄罗斯留学生数量下降的原因有很多，诸如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也包括西欧国家学习俄语兴趣的下降，<sup>⑤</sup>俄罗斯缺少符合西方标准的英语授课的课程，以及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社会声誉，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呆板的教育大纲和与欧洲教育网络一体化的薄弱等。

上述两个指标（大学国际排名的位次和留学生数量）证明，在世界教育服务市场的国际竞争中，俄罗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和边缘地位。但俄罗斯又不甘于这种现状，并将吸引外国留学生，首先是独联体国家的留学生作为教育政策的首要任务<sup>⑥</sup>。改变现状、提高俄罗斯高等教育吸引力已经成为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的动因之一。俄罗斯政府和部分高校校长认为“博洛尼亚改革”是一个新的机遇，只有与欧洲各国加强合作，才会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与欧洲的共赢。因此，加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是促进人才流动，拓宽俄罗斯大学生就业市场，提高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声誉和吸引力的重要措施。

#### 4、立场的分歧

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初，俄罗斯社会和学界对于是否应当加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归纳起来，存在着以下 4 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倾向于主张积极的参与欧洲教育一体化改革，认为俄罗斯高校最好的时期“金色的雨季”即将来临；在未来的教育空间中大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俄罗斯毕业证书文凭和职业资格在欧洲劳动市场得到认可；俄罗斯大学生在欧洲任何国家可以自由就业。第二种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俄罗斯高校的“博洛尼亚化”

---

① 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从 2003 年开始进行的大学排名。其指标体系和排名结果详见 <http://www.arwu.org/rank/2007/ranking2007.htm>

② THESE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06 года/<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

③ 苏联时期，1950-1970 年间外国留学生数量居世界第三位（在美、法之后），5.5%的外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1990 年苏联留学生人数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留学生总数 10.8%）。

④ 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详见 [www.uis.unesco.org](http://www.uis.unesco.org)。

⑤ 1985 年，法国中小学和大学的学生共有 28500 人学习俄语，而 2003 年缩减到 12000 人。在亚洲和独联体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

⑥ 如普京在 2006 年 3 月 24 日“俄联邦教育发展”国家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是件悲哀的事情，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特别是降低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系数，使俄罗斯失去其优势—教育基础性，削弱俄罗斯大学在欧洲和世界教育市场的竞争力。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认可俄罗斯高等教育优势的基础上要考虑俄罗斯与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要。第四种观点很有市场，认为“博洛尼亚进程”意味着欧洲高等教育根本改革新阶段的开始。欧洲国家高校目前对基本结构和内容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改革，90 年代实际上基本完成。不久以前所有欧洲大学已经实施了多层教育体制，采用学分制，并解决了职业资格认证相互承认的问题。俄罗斯加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只是形式上的合作，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俄罗斯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强调保护主权的愿望时，俄罗斯不打算成为欧盟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及任何形式的联盟。2007 年 3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强调，赞同普罗迪的合作准则：“制度外的一切”。<sup>①</sup>俄罗斯主权民主的表述拒绝任何形式的外部影响和移植模式。<sup>②</sup>尽管是这样，俄罗斯 2003 年仍然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事实上除少数的专家之外，没有引起欧洲的广泛重视。直到今天，欧洲存在一种共识：俄罗斯仍然认为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好，远离了欧洲的标准和价值。<sup>③</sup>

从这一观点看，博洛尼亚进程很有趣。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向欧洲表示准备合作，并将不断地与其互动，不打算走被孤立和特殊的民族教育发展道路，俄罗斯接受并采用了欧洲的标准和原则。

2003 年前有一些评论认为，一方面，这之前俄罗斯与西方已经渡过了政治上的“蜜月期”，当时俄罗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被看作是对其大国威望的认可问题。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可以理解为参与权和影响力的探索，甚至是俄罗斯实用主义政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典型特征。2003 年，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还不像今天那么紧张。此外，今天的俄罗斯是自信的国家，而西方在 90 年代的合作使俄罗斯饱尝了失败痛苦。因此，俄罗斯虽然重视通向欧洲市场的通道，但不认为必需移植欧洲的模式。<sup>④</sup>

## （二）四年来的成效及冲突

自 2003 年以来，俄罗斯的博洛尼亚进程已经走过了四年的历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很多阻力和障碍。

### 1、“博洛尼亚化”的倡导者和反对者

在俄罗斯的学术界、职业界和大学生中有不少反对博洛尼亚改革者。他们集俄

---

① Le Monde, 2007.3.28.

② [www.expert.ru/printissues/expert/2006/43/](http://www.expert.ru/printissues/expert/2006/43/)

③ Кастуева-Жан Т.В. Россия в Болон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оценки четырехлетнего опыта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www.iori.hse.ru/es/materials/T.Kastueva-Jean.pdf>

④ <http://www.iori.hse.ru/es/materials/T.Kastueva-Jean.pdf>

罗斯与欧洲关系的所有矛盾于一身，对博洛尼亚改革持又爱又恨的感情。目前，由于没有公开进行社会讨论，国家主导的博洛尼亚进程步履维艰。俄罗斯总是在力图协调两个矛盾冲突：一方面保存具有民族性的苏联传统，另一方面作为享有全部权力的欧洲成员。正如其他领域一体化的目的——欧洲也将博洛尼亚改革视为吸引竞争对手的智力资源的机遇。此外，俄罗斯教育部至今也没有对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改革目的作出明确的表态，仅仅提出“让西方的顾主明白我们的文凭”。<sup>①</sup>同时，俄罗斯社会对“智力流失”政策产生了强烈不满。有调查显示，被调查的 3300 人中，只有 23% 的人认为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不存在风险，约有 24% 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可能的后果估计不足将存在风险。<sup>②</sup>

对博洛尼亚改革的警觉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俄罗斯社会，包括教育界对于博洛尼亚进程的认识不足，虽然还有两年的期限，但很多人还认为“博洛尼亚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各种调查研究表明，俄罗斯博洛尼亚进程信息的不透明。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大学生对反复提到的教育体系知之甚少。按照博洛尼亚体系原则，调查对象选取在实施博洛尼亚改革中的有争议的高校，有 53% 的人是按照原来的五年制学习。16% 的被调查者对“4+2”（本科+硕士研究生）教育体系的一无所知。只有 13% 被调查的大学生对学分转换体系有准确的概念，还有 40% 的人对此曾听说过一些，但并不理解是什么，最后 47% 的人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什么。<sup>③</sup>

对于博洛尼亚进程的不一致的认识加剧了改革的风险。教育路径的和谐、创建互认的和可比较的教育体制常常被理解为用欧洲的教育标准使教育内容统一化。与此同时，博洛尼亚进程强调大学自治、教育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化原则的重要性。从另一方面看，使俄罗斯博洛尼亚进程更为复杂的原因在于其与高等教育内部的根本变革同步进行，所以在社会上远远不及全国统一高考（ЕГЭ）和大学合并影响大。

因此，教育界对于博洛尼亚进程的冷淡态度就不让人奇怪了。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认为，俄罗斯参与博洛尼亚进程不应当把欧洲的教育体制移植到俄罗斯来。萨多夫尼奇提出了俄罗斯教育质量及其基础性特点的丧失是非常危险的观点。按照他的分析，俄罗斯和欧盟追求不同的教育任务：欧洲需要具有学士学位的中间层人才，而当前俄罗斯急需高水平的人才和支撑科学潜力和基础科学发展的科研人员。<sup>④</sup>

---

① Слова В.Филиппова, Коммерсант-Daily.12.24.2002. №220.

② <http://bologna.mgimo.ru/votes.php?vote-id=1>, Результаты опроса 10 ноября 2007г.

③ "Мониторинг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ов в Болон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http://portal.ntf.ru/portal/pls/portal/docs/1/35105.DOC>

④ 援引自近四年登载在俄罗斯《独立报》上的关于萨多夫尼奇的访谈文章。

还有更尖锐的反对的声音认为，在尝试博洛尼亚进程中丧失了俄罗斯教育的竞争优势，认为欧洲教育的一体化是为了吸引其它国家的年轻的人才，以补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才缺口。很多缺乏吸引力的俄罗斯大学感到特别的不安。

在 2003 年 11 月的普京总统声明中，就可以观察到俄罗斯对于博洛尼亚进程的双重态度。他强调，俄罗斯的文凭在欧洲获得承认很重要，可以拓宽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博洛尼亚进程是“俄罗斯与世界空间一体化进程中的很严肃和实质性的一步。”2004 年 2 月，普京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会使俄罗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此外，他还强调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为俄罗斯的人才开放了欧洲的市场。2004 年 10 月，在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会议上，普京强调了“在博洛尼亚道路上必需保持民族优势”。这些不一致的声明动摇着博洛尼亚进程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立场，迫使专家探索俄罗斯博洛尼亚改革的“软着陆”。

## 2、“没有激情的运动”

目前，俄罗斯的博洛尼亚进程遇到了一些困难，诸如，已有的传统、思维惯性和保护民族认同等阻力。尽管政府按照既定的日程力推改革措施，但却受到来自俄罗斯高等教育传统和院校的压力。

为了如期顺利地加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俄罗斯通过立法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各项措施落实的具体时间表和责任人。2004 年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教育系统优先发展方向》纲要，要求通过立法对俄罗斯联邦《教育法》、联邦《高等和大学后职业教育法》以及其他法令做出修改和补充。这些修改要保证：

(1) 建立两个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2) 发展继续职业教育；(3) 吸引企业参与教育政策；(4) 发展科学和教育的一体化进程。2005 年又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

(1) 《关于成员国学术专业的统一证书和科学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和鉴定程序细则示范法令草案》；(2) 《关于控制独联体成员国教育质量的标准和监控技术的协议的协议的建议》。文件确认了俄罗斯联邦最高学位评审委员会 (BAK PΦ) 拟订的学术专业证书为蓝本。2007 年又颁布了实施两级学制的相关法律。

此外，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博洛尼亚进程的措施：学士—硕士两级学位体制、支持大学生和教师的流动、学分转换系统 (ECTS) 和教学质量保障措施等。但是，由于上文阐述那些原因的存在，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技术困难和参与规模小等障碍，四年后的博洛尼亚进程仍没有全面推广。而是首先在大型的首都的国立高校中进行，并且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特别不均衡的问题。

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大学数量和采用博洛尼亚工具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例如，2005 年仅有 2% 的毕业生获得了带有英文附录的毕业证。60 所大学中仅

有 10-15%的课程采用了学分转换系统。<sup>①</sup>这一报告还显示，被调查的 100 所大学中仅有 1/4 的大学实施了 1—2 项博洛尼亚进程的内容；1/3 的大学平均实施了 3—4 项内容；只有 17%的大学实施了 5 或 6 项内容。调查者认为，博洛尼亚进程发展得慢并且不均衡，大多数大学还没开始或刚刚开始。根据上述数据和客观指标，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的博洛尼亚进程是“刚起步和缓慢的”。

在博洛尼亚进程的要求和力图保存民族传统之间的折中导致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主要的争论是围绕学士—硕士两级体制问题，最终，在全面比较中传统五年制专家体制胜出并得以保留下来。2007 年，在国立大学中约有 290000 名大学生，其中专家文凭的占 92.4%，学士占 7%，硕士占 0.6%<sup>②</sup>（俄罗斯的硕士生与本科生、专家文凭的学生均称为大学生）。俄罗斯传统的专家体制不符合博洛尼亚逻辑，但它却深深植根于民族意识之中，包括企业雇主在内。有调查表明：学士还不是真正的专家。<sup>③</sup>萨多夫尼奇也支持这一观点：在 3—4 年里不可能培养出有质量的专家，因此，博洛尼亚进程应采用五年制的“俄罗斯的专家体制”，而不是采用欧洲的标准。经过 4 年的学习后仅有 2%—5%的学士就业。此外，在 5 年制专家文凭或 6 年制的学士+硕士之间选择时有两个起消极作用的参数：一是增加一年的学习时间；二是付费读硕士。正如不久前俄联邦众议院报告中强调必需合理分配学士和硕士计划。对于学士全部“流向”硕士的现象，大学应创建校际流动机制，支持最好大学生到其它学校就读。<sup>④</sup>

对欧洲合作者和雇主来说，俄罗斯新旧体制之间“杂交式折中”的结果将使博洛尼亚进程的任务更加复杂。如果说原来需要明白什么是俄罗斯的专家，那么现在必需弄清楚什么样大学或系在何种程度上采用了这一体系。目前仍不明朗的是，保留专家体制是权宜之计，或者是在个别大学加以保留（如医科大学）。不久前颁布的关于两级教育体制的法律也没有说清楚这一问题。<sup>⑤</sup>

事实上，博洛尼亚进程包括三个教学阶段，而不是两个。俄罗斯的第三级学位又分两个阶段：科学副博士和科学博士。俄法签署的学位互认协议中，在明确数量、内容的前提下，将俄罗斯的副博士等同于法国的博士。因此，俄欧双方还需在俄罗斯的副博士等同于欧洲的博士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博洛尼亚进程的另一重要原则是学术流动。因为它是俄罗斯“博洛尼亚进程最薄

---

① "Мониторинг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ов в Болон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http://portal.ntf.ru/portal/pls/portal/docs/1/35105.DOC>

② Боло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клад 2005-2007 гг.

③ Reitor.ru/ru/news/job/index.php?id19=138

④ [www.hse.ru/temp/2007/files/09\\_21\\_palata.doc](http://www.hse.ru/temp/2007/files/09_21_palata.doc)

⑤ 2007 年 10 月 24 日颁布的 №232-ФЗ 俄罗斯联邦法《关于俄联邦个别法律条款的修改》。

弱的方面。”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流动水平仍然很低。在 2005 年的俄罗斯国家报告中提出，每年有 2000 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到国外学习；大约有 20 个在国外进修和学习的双学位计划；向最好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 100 份总统奖学金。<sup>①</sup>这与目前俄罗斯大学生总数 700000 人对比，明显偏低。联合国教科文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在国外学习的大学生比例是中、东欧国家中最低的。<sup>②</sup>而俄罗斯 8.1% 的留学生来自欧洲，俄罗斯大学生仅占欧洲外国留学生的 1%。<sup>③</sup>上述资料表明，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学术流动，仅仅涉及到极少数的大学生。这也说明了俄罗斯教育拨款的相对薄弱：近三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3.5%—3.8%（其中约 0.5% 投入高等教育），同期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达到 6.2%。<sup>④</sup>

考虑到俄罗斯博洛尼亚进程的缓慢发展速度，可以预测，2010 年前俄罗斯很难全面完成博洛尼亚改革的任务。

### （三）前景：“一体化”的软着陆

对于俄罗斯的复杂状况，俄罗斯的专家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专家悲观的评价博洛尼亚进程的前景，认为存在改革没有进行到底就被放弃的风险。支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进入国际多边组织和进程的同时，俄罗斯实际上在尝试躲避规则，并按照自己民族的特点对其加以诠释和适应。例如，保留专家体制。

另一部分专家认为，博洛尼亚进程已经坚实地走进俄罗斯的教育政策和教育行动中；修改有关一体化的法律法规；组建工作组；专家定期见面；出台行动计划；制定进度表和规定完成日期；每两年完成一份国家报告；监控培养质量；吸引留学生等等。正如任何改革都有自己的进度表和审结制度，博洛尼亚进程对于参与国来说已经不是讨论赞成或否定博洛尼亚工具和原则，而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加以实现。此外，博洛尼亚进程的建议不具有法律效应，而是取决于参与者的遵守承诺的道德力量。

总体来看，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有两个积极的成效。一是获得了促进高等教育内部改革的外部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博洛尼亚进程可以与加入 WTO 同步进行。对于俄罗斯，博洛尼亚进程是促进开展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与“影子经济”斗争的契机。为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英语教学、教学现代化、改善高等教育与科学综合体的内部成效。二是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发生显性的积极成效。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博洛尼亚进程不是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可以将其视为接受全欧洲规则的过

---

① 欧洲“伊拉斯莫计划”学术流动项目。

② [www.uis.unesco.org](http://www.uis.unesco.org)

③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М.: Госкомстат, 2003. С. 285.

④ *Экономик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зеркале статистики: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ГУ ВШЭ, 2005. С. 7-8.

程。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一体化没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已经生活在欧洲的经济领域，接受其法律和法规。博洛尼亚进程的发展取决于欧盟和各国政府的决策力度。而加强与欧盟的关系，正如普京所说，是俄罗斯的“基本选择”。因此，俄罗斯的博洛尼亚进程不可能简单地按照定义来执行，因为它要与俄罗斯选择的发展模式相一致。

除制度视角外，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社会对话的主要渠道。加强“欧洲维度”和人员流动，能够促进社会的相互理解，推广共同的价值，提高信任，这些都弥补了俄欧关系的不足。此外，博洛尼亚进程与俄欧关系的其它领域密切相关。教育空间的最终目的是欧洲就业市场的一体化，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但是，目前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签证系统仍未放开，就这一角度而言，俄罗斯博洛尼亚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二、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潜力与障碍

从博洛尼亚进程的视角剖析俄罗斯的教育国际化战略，不难看出当前俄罗斯在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中所秉持的原则和方略：积极地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教育市场的有限度的开放；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因此，追踪俄罗斯的博洛尼亚进程，将有助于提高中俄教育交流的针对性和成效。

近年来，俄罗斯在加强与欧洲合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与独联体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俄罗斯教育科学国际合作司司长B. B. 尼奇考夫在 2005 年“关于教育科学领域国际合作的报告”中谈到：“与新兴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国家作为科技综合体将在世界教育服务市场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sup>①</sup>这与我国的教育开放战略“大国是重点、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国际组织是重要舞台”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中俄两国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决定了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战略意义与价值。新世纪以来，随着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中俄教育交流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一）合作的基础与潜力

#### 1、良好的合作机制和保障

近年来，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中俄教育合作与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内容更加丰富，已成为我国

---

<sup>①</sup> <http://www.mon.gov.ru/ruk/dir/nichkov/dok/1172/>

对外教育交流的一个新亮点。中俄教育合作是在政府之间、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相应协议和法律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的。1991年，中俄签署的《关于相互承认文凭和学位的等效性议定书》、以及教育部制定有关《留学归国人才服务制度》、《国家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等制度为中俄留学生交流提供了制度保障。

2000年，中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合作委员会分别成立了中俄教育合作分委会，为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组织保障。2006—2007年中俄两国“国家年”活动更加提高了中俄教育交流的质量和成效。双方除了常规的互换留学人员等合作内容外，还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合作项目，如轮流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城市举办中俄两国大学展，研究建立中俄联合大学的可行性，建立联合研究生院，鼓励和扩大高校间的科研合作以及组织中俄大学校长论坛等。

### 合作办学

与俄罗斯联合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之一。由于中俄两国的教育有着众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中俄联合办学日益受到两国政府和高校的重视。目前，中俄联合办学具有层次多样，办学模式丰富的特点，我国已有5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俄罗斯的有关院校及对口单位建立了直接合作关系，进行学术及人才交流。中俄联合办学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协议，然后定点在某校进行办学；第二，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办学；第三，经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批准和支持，两国学校之间更直接的合作办学。我国与俄罗斯联合办学的层次主要有三种：本科层次；本硕连读层次和博士研究生层次。<sup>①</sup>

### 人才交流

近年来，中俄留学生交流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所提高。1992年至2004年，中国向俄罗斯共派遣国家公派留学人员1584名，接受俄罗斯来华奖学金生1575名；向俄罗斯共派遣了汉语教师近40名，聘请来华俄语教师100余人。2006年在我驻俄使馆教育处注册的各类在俄留学人员共15000人，其中国家公派257人；俄在华共有2288名留学生，其中政府奖学金生218名，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人数最多。

中俄高校间留学生互派、自费留学也是留学生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机构“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一直从事中俄高校间教育合作的尝试。双方定期互派研究生，使两校在理工、人文等学科的教学优势形成良性互补。近年来，俄罗斯高校招收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中学应届毕业生，仅2003—2005年间，在俄罗斯高校（全日制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总数就由9000人增加到12400人，而中国留学生数占俄罗斯高校外国留学生数的比例明

---

<sup>①</sup> 赵晓彬：《中俄联合办学的相关问题与实践》，《继续教育研究》2007年第10期。



显超过了苏联同期水平（表 1）。

表 1 1950—2005 年在苏（俄）高校学习的中国和外国学生数量变化表

	在苏（俄）留学的外国 学生总数（千人）	在苏（俄）留学的中国学 生总数（千人）	中国留学生数占外国留 学生数的比例（%）
1950 年	5.9	0.4	6.4
1960 年	13.5	0.9	9.7
1970 年	26.2	0.0	0.0
1980 年	88.3	0.0	0.0
1990 年	126.5	1.3	1.0
2000 年	54.5	6.7	12.3
2005 年	83.1	12.5	15.0

资料来源：А.Л.Арефьев. тенденция в обучении граждан КНР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ах.москва.2006.

###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是双方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中俄教育界多次举办了高等教育展览和学术论坛活动，如 2006 年“中俄高等教育哈尔滨论坛”、“第六届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中俄重点大学校长论坛”等，论坛多以交流、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深入探讨中俄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针对 21 世纪中俄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战略等内容进行广泛对话，推动中俄高等院校间的合作向全方位、多层次和高水平方向发展。

#### 2、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机遇

中俄两国的教育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现实背景，在教育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两国教育制度既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教育发展的严峻现实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俄两国有着广泛的对话空间与合作基础。

#### 交流合作的新空间

旨在形成与世界可通约的教育体制的“博洛尼亚改革”为俄罗斯的对外教育交流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学位体制改革、统一高考、发展私立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体系等方面，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加入世贸组织，俄罗斯如果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将承担一定的义务，为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进行包括教育在内的服务贸易提供最便利的条件。2001 年，中国已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双方可以在 WTO 框架下展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从博洛尼亚进程可以看出，俄罗斯正在探索本民族的独特教育治理理念，同中国坚持的不照搬外国模式、走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理念是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参与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中俄在教育观念上有了共同语言，这

将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和理解，最终促进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

从教育发展战略来看，2006年俄罗斯开始实施的“创新型大学发展战略”，就其内容实质和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来说，同近年来中国实施的“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也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总之，中俄在教育战略和实施策略上的相同性和相似性，将进一步拓展两国教育交流的空间。

### 交流合作的新“坐标系”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指出：“最近发生的俄格冲突和金融危机表明，全球面临严重的管理体制和发展哲学的危机，标志着世界历史正在进入新时期。2008年8月至10月将作为过去100年第四个发展阶段的开端而被载入史册，这才是21世纪的真正起点。”<sup>①</sup>他还认为，在亚洲国家的强势崛起中，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力量重新分配的象征，并提出构建未来体制的原则是由最强大和更具有责任感的国家共同制订和协调政策，而不是一国独大，或是一部分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国家等。历史发展到现阶段要求深入研究中俄关系的新模式，不仅要考虑到内源文化特点，还要考虑到国际准则。教育作为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将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因此，中俄两国在加强教育领域合作时，重要的是要确定新的“坐标系”，明确合作的方向和路径，并围绕这一坐标系建设和发展完整的相互关系。

### （二）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尽管目前中俄教育合作总体趋势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教育领域的相互认知问题

比较研究是中俄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双方合作的理论基础。由于社会转型的原因，中俄双方都格外关注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和学习，中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一度被边缘化，导致双方的相互认知水平较低。尤其是对转型过程中各自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缺乏系统的研究，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局部的、现象的描述和介绍层面，特别是对俄罗斯重大教育改革实践的理论依据认识不足，这些问题将导致中俄教育交流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局限性。在前不久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谈到这一问题。其中，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认为：“苏联解体以前的东西，我们摸得较透。但对解体后的俄罗斯，我们很缺乏研究。”此外，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钟启泉教授指出：我们对俄罗斯教育的研究出现了断层。现在俄罗斯教育研究与西方教育研究已经联上了，其话语系统的西方特征

---

<sup>①</sup> 《俄罗斯科学院专家认为世界进入“第四发展阶段”》，《参考消息》2008年10月17日，第3版。

令人吃惊。我们一定要客观地把握俄罗斯教育的完整的发展脉络。但中国大陆现在研究俄罗斯教育的人没有几个。这与中俄都是大国的现实不符。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有东方语言 95 种，令人惊奇。这才是大国了解世界的心态。<sup>①</sup>

## 2、留学生培养质量的问题

目前从中国留俄学生的数量、质量、投入产出比来看，存在着“广种薄收”的现象，导致中俄合作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高级人才缺失和断层的问题。从世界大学排名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在《教育竞赛分析》一文中，俄罗斯学者古里耶夫认为，“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缺乏对提高质量的有效激励。”<sup>②</sup>还有学者提出，“今天俄罗斯教育在经济环境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国外一些知名大学提出的要求。在俄罗斯的商业结构中商业组织和商业、经理和金融领域内企业主的要求，都以“西方模式”为样板，经济专业的俄罗斯高校除了在价格上多多少少便宜一点之外，在竞争中很难表现出什么优势。”<sup>③</sup>此外，俄罗斯调查显示，中国留学生对俄罗斯高校所提供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太满意的地方有：教学过程中技术装备（特别是电脑）供应不足；对居住条件的不满意（80%以上的中国留学生住在高校宿舍，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租单间或套间）；学校不能保证留学生的人身安全（53.7%的中国留学生在学习期间遇到过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威胁，包括受到当地无赖的攻击）。<sup>④</sup>此外，留学生的俄语和原有基础也是留学生质量问题的原因之一。

## 3、合作办学的成效及定位问题

从目前中俄合作办学的现状来看，双方的联合办学仍处在初级阶段，存在着合作定位偏低、合作主体不对等、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哈尔滨师范大学赵晓彬教授在研究哈师大与俄联合办学问题时提出，“由于中俄两国教育体制与教育思想理念的差异，在办学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如：如何尽早地将效益性联合办学提升到实质性的联合办学的轨迹上；我国学生到俄罗斯学习或俄罗斯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对双方的办学体制、学校的教学方式能否适应；两国学生如何适应两国的教育思想理念；学生心理因素问题；中俄联合办学发展前景、教学理念及政策、学制及课程衔接、课程设置、大纲设计、教材编撰与评估、教学方法和手段、语言水平测试、常

---

① 万秀兰：《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战略与建设目标》，《全球教育展望》，2008年第4期。

② <http://www.polit.ru/science/2007/12/18/ratings.html>

③ 如果 2005 年在莫斯科的一些优秀的经济专业大学中（附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国民经济大学、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全俄外贸大学、高等经济学院(ГУ-ВШЭ)，经济专业的平均价格每年为 3500~8000 美元，那么，在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中（Гарвард, Йейль, 斯坦福）、英国（剑桥）、法国（Сорбонна）、东京大学，每年就需要 23000 美元。参见朱小蔓主编：《20-21 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46 页。

④ Арэфьев.А.Л тенденция в обучении граждан КНР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ах.москва.2006.

规教学管理问题等等。”<sup>①</sup>

当前，教育与科学的一体化成为中俄两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在中俄合作办学过程中，对于俄罗斯科技教育中的优势领域缺乏足够的重视。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发展十分不平衡，军事技术、航天技术、重工业技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发展较快，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已跃升到世界先进行列。双方没有做到优势互补，满足对方的需求。

#### 4、构建长效保障机制的问题

一直以来，中俄教育交流合作更多地来自政府的推动，缺乏民间组织和研究人员的参与。近年来，NGO在俄罗斯对外合作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重要，特别是各种教育基金会为吸引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从事科研活动，提高俄罗斯的科技潜力，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资助和奖励措施：提供各项研究基金资助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在竞争的基础上从事科研活动；支持主要科学流派的发展；支持大学生和研究生出国留学、进修、参与国际科研项目；支持大学生、研究生和高校教师参与考察和田野研究；保证年轻研究人员参加国际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问题的学术会议；恢复大学生科学学派和学术研讨会等等。目前，我国尚缺少这一性质的组织，因此，应尽快建立中俄教育交流的非官方机构，保障交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 三、拓展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空间

在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意义深远，如何在现有的发展态势下，加强中俄教育交流，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形成深入、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中俄教育交流的新命题。

#### （一）注重比较研究的适切性，提升两国对彼此教育及其文化的认知水平。

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提高对俄罗斯教育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将会促进中俄教育交流向纵深发展，进而提高双方交流的层次和效益。目前为止，中俄两国教育比较研究最为重要的一次合作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启动的第一个合作研究项目——“21 世纪初期中俄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家级教育研究机构在教育领域内第一次涉及内容极其广泛的大型合作研究，两国学者分别就中俄两国转型时期教育的重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双方学者在展示各自国家的改革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分析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内部推动因素、跟踪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困难的基础上，力图透过两国文化和

---

<sup>①</sup> 赵晓彬：《中俄联合办学的相关问题与实践》，《继续教育研究》2007 年第 10 期。

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探索两国分别在自己认定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中，进行教育改革所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把握各自的民族文化和教育战略取向的国情特点。此项研究奠定了 21 世纪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础。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加强中俄教育基础科研合作，进一步设计规划合作项目，提高选题的时效性和適切性是未来中俄教育研究合作的着力点。中俄教育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寻找在中俄教育改革中两国共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合作研究，拟定重大攻关项目诸如“中俄创新型大学的比较研究”、“中俄师范教育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中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中俄高中理科教学的比较研究”等。此外，当前中俄联合办学特别需要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切实研究中俄联合办学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对当前中俄联合办学，甚至整个对外教育交流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意义。

### **（二）提高留学生质量，侧重“专家型”人才的定向培养。**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应纳入到国家人才储备战略之中，针对中俄合作的优先领域，培养高层次的有质量的人才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围绕国家急需和俄罗斯的强势学科，调整留学生派遣结构，进一步提高留学生的培养层次和质量。

中国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联合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在加强留学生教育的同时，我们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注重高层次人才培养，注重硕士以上阶段人才的培养，增加中俄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数量，从选派对象的语言水平、专业水平等方面进行严格考察，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同时，在专业选择上，注重俄罗斯的强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二是加强“专家型”人才的定向培养。目前，我国与俄罗斯合作密切的中石油、中海油等企业成功实施了定向的“专家型”人才培养模式。留学生的职业目标定位明确，人才培养质量较高，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和质量，在国家公派留学方面，应积极吸收其成功经验。着重对我国急需的人才，实施定向培养，同时还要完善用人机制，为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在中俄留学生交流过程中，我国还应提高教育服务市场竞争意识，挖掘教育服务市场潜力，提高教育竞争力。目前，俄罗斯在华留学生数量 2000 年为 703 人，2001 年为 1056 人，2002 年为 1492 人，2004 年为 2288 人<sup>①</sup>。两国留学生人数比较表明，我国应加强吸引俄罗斯留学生来中国就读的数量，加强我国教育的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开拓真正符合我国教育发展根本利益的合作项目，在合作中学俄之所长，为我所用。

### **（三）拓展合作办学空间，联手参与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

---

<sup>①</sup> 参见：中国教育部.2002-2004 年俄罗斯来华留学生统计表。

由于中俄两国的教育有着众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中俄联合办学日益受到两国政府和高校的重视。在原有的合作办学模式、层次基础上，应进一步拓展合作办学空间。加快创建中俄联合大学的步伐，为中俄全方位合作培养和储备优质人才。同时，双方还应联合向国际、特别是中亚地区教育服务市场延伸，培养国际化的多边合作人才。2008年10月23日，上合组织秘书长宣布将于2009-2010年创办“上合组织网络大学”，旨在培养不仅具有高职业水准的人才，更是多边经济发展合作的复合型人才。<sup>①</sup>俄罗斯教育科学部部长安德列·富尔先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必须加快签署上合组织关于教育文凭互认的政府间协议。俄教育部强调，“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教育合作与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同样重要。”<sup>②</sup>这将成为拓展中俄教育合作空间的重要机遇。

#### （四）联动两国的企业与高校，开展大科学领域中的合作。

目前中俄两国高校的交流合作多停留在互访层面，实质性合作不多。随着两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科技研发职能日益凸显，企业与高校成为实现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中俄两国高校应利用俄方的技术优势和中方的市场及技术转化优势，将高新技术转化并实现产业化和商品化，从而为双方的经济建设服务。中俄两国的企业与高校应加强实质性合作，共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科技园，从而实现两国科研与教育、经营一体化发展网络。

在两国企业与高校的联动过程中，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注重向大科学领域倾斜，诸如物理、化学、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俄罗斯在上述相关领域仍处在世界一流的水平。中俄两国应从各自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创建企业与高校一体化组织，联合攻关，共同参与国际大科学领域的前沿合作，分享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在双方产学研合作中，加快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达到互利双赢。

#### （五）强调 NGO 合作，推动中俄教育交流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10月17日，中俄大学校长圆桌会上提出了创建两国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设想。组建由政府、高校、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多元主体构成的教育交流平台，实现多样化合作是未来中俄教育合作空间拓展的重要思路，也是双方交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007年，中央教科所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俄罗斯教育研究中心，中心整合了国内有关俄罗斯教育研究的专家队伍，积极开展中俄教育科研和实践领域的合作，并与俄罗斯的“新欧亚基金会”开展了“中俄职业教育比较”等合作研究。建议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创建中俄教育交流中心，重点突出其教育科研与交流的功能。目前，用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科研经费匮乏，高层次研究成果更为少

① <http://www.gazeta.kz/art.asp?aid=120542>

② <http://www.mon.gov.ru/press/smi/4980/>

见。科研资金的短缺严重制约了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同时，鉴于对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战略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有关部门应积极推动两国 NGO 的合作，建立合作基金，为双方交流合作创建一个新的积极务实的空间。

---

**【Abstract】** Bologna proces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structural change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for centuries. In 2003, based on a wide range of considerations, Russia also joined in this pla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 Russia does not go on well in spite of some positive results, mainly due to the inactiveness of Russian education circle. Looking into Russia's Bologna process will help improve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Sino-Russian education exchanges.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Sino-Russian educational exchanges cooperation.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etc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difficulties in mutual cognition and the qual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training, which requires focused solutions.

**【Key Words】** Bologna process, Sino-Russian Educational Exchanges, Cooperation

---

(责任编辑 李敏焘)

## 更正启事

谨对本刊 2008 年第 6 期作如下更正：

1、《经济危机初期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观点》一文的译者为谭璐，校阅者为刘军梅；

2、第 30 页注释\*，括弧内应为“项目批准号：07JJDGJW251”；

3、《中亚公共行政管理经济作用：分权与混合政体》一文作者的名字应译为“利布曼”。

在此，谨向广大读者和有关人士致以诚挚的歉意。

本刊编辑部

# 俄罗斯大事记

(2008年11月—12月)

## 11月

- 2日 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决议就纳卡地区问题展开持久、直接对话。俄罗斯将原油出口税降至\$287/吨。
- 4日 Paveletskaya 火车站爆炸事件三名嫌犯被捕，该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约 500 名在俄罗斯“人民团结日”当天于莫斯科举行非法集会的民族主义分子被捕。
- 5日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表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俄罗斯有利。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建议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六年，议员任期延长至五年；他同时向与美国新政府表达了开展更紧密合作的期望，并声称若美国继续其中欧反导部署，俄罗斯将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导弹。
- 6日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伊戈尔·丘季诺夫 (Igor Chudinov) 表示，国家经济发展前景 1/3 倚仗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 7日 越南与俄罗斯在河内开展首次战略对话，重点讨论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问题。梅德韦杰夫领导政府组织内部合作，以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同时加强对经济支持基金的控制。
- 8日 俄外交部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台湾海峡问题上达成的一致表示欢迎。
- 9日 俄潜艇灭火系统氟利昂气体的意外泄露导致 20 人死亡、22 人受伤。俄外交部表示，不会轻易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导弹，除非美国决定在波、捷克部署反导系统。
- 10日 俄取消对波兰农产品的进口禁令。乌克兰乌克兰国家油气公司 (Naftohaz) 计划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签署天然气供应与运输协议。
- 11日 俄外交部明确表示不会参与格鲁吉亚问题的斡旋。
- 12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负责人米勒 (Alexei Miller) 宣布，自 2009 年起削减对欧天然气供应价格。俄总理普京敦促欧洲下决心修筑北欧天然气管道。
- 13日 俄军总参谋长马卡罗夫表示，未来三年将裁员 160000 人。
- 14日 俄总理普京到访基希讷乌，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对俄罗斯为涅斯特地区维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总理普京呼吁独联体国家合作对抗危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抵达华盛顿出席 G-20 峰会。
- 16日 名为 The Right Cause 的新自由党派在俄罗斯成立。
- 17日 莫斯科军事法院决定向媒体公开安娜 (Anna Politkovskaya) 谋杀案的审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在格鲁吉亚切断天然气供应后宣布，至 2009 年中期将建成直接连接南奥塞梯的天然气管道。
- 19日 俄罗斯政府向白俄提供首批十亿稳定贷款。有关南奥塞梯问题的首轮六方 (联合国、欧安组织、欧盟、美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安全会谈在日内瓦结束，此次会谈未商讨难民问题。
- 20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要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首席执行官米勒 (Alexei Miller) 收回乌克兰 24 亿美元天然气欠款。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成员就保护工人抵御



金融危机问题进行磋商。

- 21 日 俄杜马通过宪法修正案，延长总统和议员任期。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出访葡萄牙。俄 Tekhnopromesport 与利比亚在非洲投资基金合资组建 Laptechno-Power，以开发非洲能源市场。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要求副总理季莫申科五天内组织还清对俄天然气欠债。
- 24 日 秘鲁召开的 APEC 峰会上，中俄承诺加强战略合作应对金融危机。
- 25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出访巴西。俄内务部成立专门机构打击腐败。
- 27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将配合 OPEC 行动。
- 28 日 拉脱维亚公民团结党呼吁采取措施限制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影响。
- 30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印度总理曼莫汉签署协议，加强反恐合作。乌克兰已着手归还对俄天然气欠款。久加诺夫连任俄罗斯共产党主席。参加欧盟乍得维和行动的首批 120 名俄军人从俄罗斯启程。

## 12 月

- 1 日 伊朗—亚美尼亚天然气管道竣工。  
俄英合资秋明英国石油公司 (TNK-BP) 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辞职。
- 2 日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邀请俄罗斯储蓄银行进驻白俄市场。  
俄外交部表示，欧盟和俄罗斯必须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邻近区域协调合作采取行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发布法令，决定成立处理乌克兰—俄罗斯关系的专门战略小组。
- 3 日 俄能源部长谢尔盖·什马特科 (Sergei Shmatko) 表示，鉴于国内外预期销售额的缩减，俄政府可能参与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2009 年投资项目的共同筹资。
- 4 日 出访印度的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称印度为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并敦促深化俄印关系。在名为“对话普京”的直播节目中，俄总理普京证实俄罗斯正在筹划建立多重外交经济政策，但同时也强调与欧盟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 5 日 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历克谢二世去世。  
俄总统结束对印度为期三天访问，此次访问俄印签署了核能、太空开发等方面合作协议。
- 6 日 俄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地区基里尔主教(Metropolitan Kirill)被选为俄东正教新牧首。
- 8 日 莫斯科地方法庭决定释放尤科斯前副总裁瓦西里·阿列克萨尼扬 (Vasili Alexanian)。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任命尼基塔·别雷赫 (Nikita Belykh) 为基洛夫州州长。
- 9 日 俄铁路公司有意参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项目。  
俄总理普京签署议会决议，该决议旨在“根据市场情况”削减移民劳动力份额。
- 10 日 俄总理普京委派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负责反危机措施实施。  
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宣布莫斯科市于 2009 年半数削减劳动力移民配额。
- 12 日 格鲁吉亚外交部长 Grigol Vashadze 将格正教会大主教艾利亚二世(Patriarch Ilia II)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的会面誉为两国“重启对话”的标志。  
俄经济部副部长安德烈克列帕奇(Andre Gavrilov)表示，俄罗斯经济处于萧条期。
- 13 日 俄罗斯从南奥塞梯附近的格鲁吉亚村庄撤军。俄罗斯反对党“团结运动”在莫斯科附近举行成立大会。俄罗斯军舰抵达 Bluefield 港口。
- 14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庆祝宪法颁布 15 周年发表演讲时受到一名记者“呛声”。  
警方遣散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异见者游行。

- 15 日 俄联邦议会发言人米罗诺夫 (Sergei Mironov) 呼吁采取措施促进俄汽车产业现代化。
- 16 日 俄副总理伊万诺夫表示, 俄 2008 年军事出口超过 80 亿美元, 军事订单已达 330 亿美元。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表示, 不会将乌克兰天然气传输系统转让给俄罗斯来抵押债务。
- 17 日 俄驻南奥塞梯大使 Elbrus Kargiev 表示, 使馆成员 30 名, 二月正式就职。黎巴嫩国防部长 Ilays al-Murr 宣布, 俄罗斯同意向黎巴嫩军方提供 10 架 MiG-29 喷气飞机。
- 19 日 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宣布加拨 1300 亿美元支持石油产业。  
欧委会能源委 Andris Piebalgs 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保证不中断对欧天然气供应表示欢迎。
- 21 日 俄罗斯远东地区数个城市爆发了抗议高额汽车进口税的游行。
- 22 日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总统举行非正式 CIS 峰会, 决定共同建立 100 亿美元的反危机基金; 同时协议组建 CSTO 领导的快速反应部队, 以维护成员国安全。
- 24 日 日本政府反对俄罗斯从 1 月起增收汽车进口税。俄总统助理 Arkadi Dvorkovich 表示俄罗斯 2009 年将出现 10 年来的首次预算赤字, 且不排除外部借款的可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两国领导人经过多轮会谈后最终达成协议, 允许俄罗斯参与塞尔维亚天然气行业。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接受采访时表示, 向格鲁吉亚派遣军队的决议是他亲自做出的, 且没有任何迟疑。
- 27 日 俄罗斯和阿塞拜疆国防部长签署 2009 年合作协议。
- 29 日 俄罗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协议合作缓解巴基斯坦—印度紧张局势。
- 30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宪法修正案, 将总统任期延长至 6 年。
- 31 日 尤科斯前副总裁被保释出狱。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新法令废除陪审团审判。普京和欧盟主席巴罗佐电话会议商讨乌克兰天然气危机。乌克兰使团出访莫斯科计划取消。